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 李达

## 学术思想评传

丁晓强 李立志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1354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丁晓强 李立志 著



\*20101864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丁晓强,李立志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戴逸主编)

ISBN 7-5013-1610-4

I.李… II.①丁…②李… III.李达—评传 IV.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25 号

**书 名**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著 者** 丁晓强 李立志著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187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

**书号** ISBN 7-5013-1610-4/B·88

**定价** 16.00元

#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

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

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



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

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洲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



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 导 言

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澎湃之势,渐成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给中国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并且,也给中国整个的学术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其影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思想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政治思想,又是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与变革社会的政治家密切相关,又与辛勤耕耘的学者直接相连,两者相得益彰。以往,我们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时候,往往更重视政治家们的贡献,对学者们的作用有所忽视。以下的研究表明,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过程中,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的。李达是一位笃志嗜学的学者,又是一名奋斗不息的战士。他的著述卷帙浩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大家,还直接涉及社会学、货币学、史学、法学等具体学科,且都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李达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治学切实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	戴 逸
导 言 .....	( 1 )
第一章 学术生涯 .....	( 1 )
一 求学(1890—1919) .....	( 1 )
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1922) .....	( 5 )
三 专注于理论研究(1922—1927) .....	(13)
四 十年治学(1927—1937) .....	(20)
五 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1949) .....	(30)
六 晚年的学术活动(1949—1966) .....	(36)
第二章 学术著述 .....	(48)
一 “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李达的主要译著 .....	(48)
二 《现代社会学》 .....	(55)
三 中国向何处去 ——李达 1929 年的三部著作 .....	(62)
四 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社会学大纲》 .....	(70)
五 经济学领域的艰辛探索 ——《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 .....	(78)
六 《法理学大纲》 .....	(84)

七	“犹上文坛作老军” ——李达建国后的著述 .....	(91)
<b>第三章</b>	<b>学术思想</b> .....	(100)
一	李达学术思想的四个时期 .....	(100)
二	李达的学术思想体系 .....	(105)
<b>第四章</b>	<b>学术渊源</b> .....	(139)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	(139)
二	日本、欧洲与前苏联学者的影响 .....	(146)
<b>第五章</b>	<b>学术交友</b> .....	(153)
一	李达与毛泽东 .....	(153)
二	李达与邓初民 .....	(168)
三	李达与吕振羽 .....	(177)
四	余论 .....	(187)
<b>第六章</b>	<b>学术地位</b> .....	(196)
一	各家对李达的评价 .....	(196)
二	关于李达评价的几个问题 .....	(201)
三	李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	(216)
<b>附 录</b>	.....	(231)
一	李达著述编年 .....	(231)
二	李达研究参考文献目录 .....	(260)
<b>后 记</b>	.....	(277)

# 第一章 学术生涯

## 一 求学

(1890—1919)

李达,曾取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蔡家埠灌塘口村一个贫穷的农家。祖父李光亮,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为摆脱困境,设法让次子李辅仁读了几年书。辅仁即李达之父,教过蒙馆,当过学徒,做过小生意,但依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地,只得回家租种地主的土地。李达回忆说:

我家佃种了一个姓王的地主家的二十多亩田。每年秋收以后,我父亲就把黄爽爽的谷子一担一担挑到王家庄上交租,我感到很心痛。父亲只希望我们长大成人,能够买些田自己种就好了。<sup>①</sup>

李达有两兄两弟和一个姐姐,父亲对他的期望最大,因此只有他得到读书的机会。

李达的启蒙教育自然是典型的传统教育。他刚满5岁,便跟父亲识字。7岁,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学《三字经》、《百家姓》等,以后又在唐家祠堂读《幼学》、《千字文》等启蒙书。他天资聪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慧,善于应对,记忆力奇强。据说,一次,他把祠堂的墙壁刻得乱七八糟,先生很生气,便用订书的锥子朝他的书上用力一插,钻穿多少页就背多少页,他没花很多时间,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李达不满足于先生指定的课文,还大量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他还特别喜好数学和自然知识。

1905年,李达15岁。这一年,永州府在当地蘋州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永州中学。永州中学是当时永州府所辖零陵、祁阳等八县的最高学府,在湖南也颇有名气。李达前往应试,数学成绩得了满分,八股文章不合章法,他以班上最末一名的资格考取了永州中学。当时考第一名的叫朱保善,长李达五六岁,古书读得多,善八股诗文。李达苦读古文,力求超之,国文成绩大幅提高。至第二学期以后,他的总平均成绩就跃居榜首,以后就一直保持第一。

永州中学是一所新式学堂,李达开始真正接触到数、理、化等新的知识,并逐渐了解国家大事,从而激发了爱国热情。有一次,他们接到长沙来信,里面有一张红色的通知,标题是“徐特立断指血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做反日救国运动”,这使他们大为感动,并进行了抵制日货和练军事操等活动。李达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爱国的办法就只懂得这么两条。这一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会、游行、喊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可是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以被压制而告终。<sup>①</sup>

1909年,李达19岁,中学毕业后,赴北京投考公费的京师优级师范,离开了偏僻的农村。赴京途中,目睹了汉口、上海、天津及北京租界的状况,痛感中国已成为列强统治的殖民地了。通过在京师优级师范的学习与思考,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到这种地步,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4卷,第730页。



是由于中国人知识不发达的缘故，于是就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使李达感到兴奋和鼓舞。但不久，辛亥革命就失败了。1912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家乡。次年，他曾到祁阳中学任教，继而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因缺乏食宿费，又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李达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怀着这一理想，他决心游学东瀛。

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在一年多的留日生活中，他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外语，先后掌握了日文、英文和德文。但因用功过度，得了肺病，他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这期间，他曾与人合伙开办“博记药店”，3年时间，肺病总算好了。

1917年，李达再渡东瀛，并考入日本最著名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并获得官费资助。为“实业救国”，李达刻苦攻读。但是，在日本学习期间，他饱受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而国内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李达“实业救国”的梦想再度破灭。他回忆说：

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找寻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sup>①</sup>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李达感到喜悦和兴奋。他“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辑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4卷，第732页。

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名称。”<sup>①</sup> 这样,他初步树立了对列宁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还是很零碎,而且还受到反动当局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和删削,李达努力地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思考救国的道路。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假道东三省进攻苏俄,实际上等于允许日本占领东三省。三千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集会,决定全体罢学归国,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李达是赴北京的领导人之一。经过奔走呼吁,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等校学生约二千余人,在5月21日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运动,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sup>②</sup>

通过这次运动,李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回忆说:

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sup>③</sup>

1918年6月,李达再次东渡日本,停止了物理数学的学习,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日本也逐渐多起来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刻苦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一批原

---

<sup>①</sup> 李达《十月革命和中国知识分子》,《武汉大学学习简报》1957年11月7日。

<sup>②</sup> 许德珩语,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sup>③</sup> 《李达文集》第四卷,第733—734页。

著,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大量书刊。虽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夕,李达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热忱的宣传者。

## 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192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达正在日本,他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并积极撰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参与这场伟大的运动。6月11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李达闻讯后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发表在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声援营救陈独秀的运动。这篇文章强调了新思想是不可战胜的,他指出:

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但是很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sup>①</sup>

他还指出:

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立足在20世纪!<sup>②</sup>

表达了用“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信念。

李达身体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6月18日和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他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8页。

主义的目的是》两篇文章。前文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后文则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 19 世纪文明的弊病”,“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李达的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一篇,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混杂、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具有启蒙意义。

为了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自 6 月 20 日至 7 月 3 日,李达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之情形》为题,在《觉悟》上连续发表了 9 篇短文,介绍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状况,表明了李达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热切愿望。

从 1918 年秋至 1920 年夏回国以前,李达还以辛勤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3 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国内极缺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许多人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这些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在 1920 年 3 月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社会问题总览》1921 年 4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 1932 年印行 11 版;《唯物史观解说》1921 年 5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 1932 年印行 14 版。

1920 年夏,李达离日返国,“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sup>①</sup>到上海后,李达立即投入建党工作。8 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翌年 2 月,由李达代理书记,全面主

---

<sup>①</sup> 《李达自传》,1956 年 3 月 10 日,《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 2 辑。

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此后,李达具体筹划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这次大会上被推为党的中央局宣传主任。

建党时期,李达担任了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sup>①</sup>中共正式成立后,1921年9月1日,李达主持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并任该社主编,主持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及《资本论入门》、《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李卜克内西纪念》等15种书籍,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都处于显著的地位。如果说在建党工作中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则是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的。

三李并称,又各有千秋。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直接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集中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叫社会主义?》在回国前所译的3本著作中,有《社会问题总览》,此书份量最重,共3册,21万字之多。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由宣传逐渐走向实践,李达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李达的主要论文是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辩中形成的。在论辩中,他十分注意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他关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的理论,也大多溶于这些文章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渐呈澎湃之势,反封建的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出现了几次著名的思想论

---

<sup>①</sup>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争。第一次论争发生在1919年下半年,该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该文从实验主义出发,以研究和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相标榜,把“主义”一概斥为纸上的空谈,持排斥态度。对此,李大钊在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坦然地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并明确指出胡适等观点是“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李大钊批评说: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的问题,应该……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

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随后,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sup>①</sup>尤其是后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攻击,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由于《每周评论》被查封,这场争论没有继续下去,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19年底出现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可以看作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反应。这场运动综合了主义和实验两个方面,因此,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分析,实际上就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一种总结。由于这场运动波及了整个思想界,虽然它很快就失败了,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这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或参与者如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和施存统等觉悟到在社会未改造以前没有试验新生活的余地,转向或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下半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着手在一些城

<sup>①</sup> 《每周评论》第36号、37号。



市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该年11月,研究系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于是,开始了第二次论争。该文提出在中国只有首先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反对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他在《答高践四书》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盖中国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梁启超支持张东荪的主张,他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还补充说,近代中国“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尚谈不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主张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以开发实业,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而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准备。梁启超该文发表于1921年2月出版的《改造》杂志第3卷第6号,该期杂志特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一栏,除梁启超、张东荪外,如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等也撰有长文,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张东荪都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的热心者的面貌出现的,虽然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只是些调和劳资关系的措施,如举办平民积资事业、组织消费合作社、提高工人红利、实行疾病保险等,因此,更具有蛊惑性。

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的改良社会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进行了论战。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以《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为题,辑录了当时讨论中的主要观点,推动这场讨论的深入。陈独秀、李大钊、何孟雄、陈望道等纷纷撰文进行反驳,李达也撰写了《张东荪现原形》(1920年11月7日)、《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年5月1日)等论文,积极参与这场论争。由于李达的文章份量最重,也最有深度,所以,事实上成为这场论争的主将。

对于张东荪的文章,李达写了《张东荪现原形》的短文,揭露其前后矛盾,并没有进行系统批判。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资本主义,引起了李达的重视。

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指出：

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章，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论又复周道，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章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章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sup>①</sup>

李达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对梁启超提出了批评。文章首先指出梁的所谓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李达认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也就是说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因为梁启超认为中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发展实业，解决失业问题、游民问题，产业劳动阶级才能形成，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然后，进行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使劳资协调，以救资本主义之弊。李达深刻地指出，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误解就是把社会主义看成了“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分配平均之运动”，<sup>②</sup>——李达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他指出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思维定势对社会主义的附会。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在于设法造出公有的生产机关，避去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弊害，使生产得到有秩序有政府地发展，“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57—58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63页。

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sup>①</sup> 李达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阐述,自然带有时代的局限,例如废除商品生产等观点具有空想成份,但还是基本上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原意,在人们的思想上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文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并阐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及其方式。这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如何才能发展中国的实业,减少失业及游民,也就是说是否必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不仅不能实现多数人的“人的生活”,反而会增加失业及游民,而且,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军阀和土匪实行抢掠主义,资本主义从何说起? 并且外国的资本主义布满了全国,本国的区区小资本家是不能想如何的有希望”,<sup>②</sup> “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sup>③</sup> 李达也重申了这一观点。<sup>④</sup> 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以,李达又直截了当地批评梁启超的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指出梁启超的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是“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既不了解欧洲社会进化的历程,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sup>⑤</sup> 李达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采取急进的“直接行动”,但是,中国是农业国,不能通过工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64页。

② 何孟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甚么方法?》,《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③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66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69页。

会运动的方式来积聚革命力量,也不能采取突发的总罢工手段实行革命,只能适用于“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sup>①</sup>李达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推测,虽然还很粗浅,却是有意义的。通过这场论战,李达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李达还撰文参与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优势。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活动的展开,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从反对政治革命到集中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正面批评;1921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辑录了他与区声白的论战,阐述了国家、政治、法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李达于1921年5月在《共产党》第4号上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对无政府主义各个流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他指出:

无政府党何以没有绝灭资本主义的手段,何以反不免姑息那资本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有许多矛盾的缘故。<sup>②</sup>

他批评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巴枯宁标榜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浓重的超越阶段的宗教色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同年6月,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论著,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此外,李达还写了《马克思还原》(1920年12月)和《评第四国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72—73页。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78页。



际》(1922年4月)等文章,批判了修正主义等观点。

由于李达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是最高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也最准确;由于他直接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积极地参与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辩证,在这类论战中,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将。所以李达在党的建立及其初期的社会运动中,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其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 三 专注于理论研究

(1922—1927)

1922年秋,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离开了中共中央,由沪返湘,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是年5月,李达就曾应毛泽东之邀赴湖南自修大学讲学。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苦心孤诣所创立的一所新型学校,其特点是集古代书院自由研究的形式和现代学校科学的内容两者之长,凝聚着毛泽东教育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理想。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反响,得到了蔡元培、胡适等的支持与好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后,原新民学会的骨干和湖南进步青年很快就聚集在这所学校周围。显然,李达对于这样一所学校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也更愿意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于是,是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表示不再继任中央宣传主任工作,要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

李达离开党的中央,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李达回忆说:

那时候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

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的)的头衔。<sup>①</sup>

陈独秀最重实行。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立即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与李达配合,进行社会主义问题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陈、李相得益彰;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从宣传转向革命实践,陈独秀功不可没。但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研究过于轻视。1922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说中说:马克思学说和行为的两大精神,一是运用了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证实归纳法来论证社会,一是“实际活动的精神”,甚至号召说:“我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sup>②</sup>这就过于偏颇了。正由于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不甚精通,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失误。

在建党初期,中共的理论建设是不足的,多数的党员只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就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了。这是历史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理论,革命实践又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这是个难题。在1920年,毛泽东曾经有过思考,他提出新民学会的工作要从两方面进行,一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以“求学储能为本位”;一部分人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从事于社会运动的”。<sup>③</sup>在当时的新民学会中,毛泽东曾有“实践家”之称,蔡和森曾有“理论家”之称。

①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1928年1月。

②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从本身的素质来看,李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

李达与陈独秀的第二个分歧也是更直接的分歧是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了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达自党的二大后离开了中央,没有参加西湖会议,觉得对这一决定难以接受。关于李达的观点,我们可以参看他所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其中谈到:“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同时他指出两点:

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的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

二,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sup>①</sup>

李达强调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要保持独立性、争取领导权,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会“模糊党的阶级性质”,<sup>②</sup> 则是不正确的。

陈独秀接受了采用“党内合作”形式进行国共合作,同时他又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的唯一工作,流露出一种消极的情绪。我们可以参见他所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sup>③</sup> 一文,其中谈到: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12页。

② 《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载《向导》第22期,1923年。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他还指出：

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循着这一逻辑，则有可能走向“二次革命论”和“取消主义”，历史已作了证明。

1922年11月，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策略问题上发生过争论。1923年夏，李、陈就此问题再次发生争论。李达所以退党，还直接因为陈独秀的粗暴态度。陈独秀在争论中“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认为李达在长沙不参加示威游行，没资格作主张，甚至说要开除李达。李达回忆说，他当时心里凉了半截，“心里想，像这样的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遂萌发了脱党的决心，并且，他“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sup>①</sup>这样，大约在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并为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他后来认为，这是他“生平所曾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sup>②</sup>

1922年秋李达离开党中央，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湖南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李达主持校政，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学员有

① 《李达自传》(节录)。

② 《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瓚、郭亮、易礼容等 20 余人。李达系统讲述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互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李达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讲授了《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印发学员参考。此外，李达还为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法文专修科、中学的学生讲学。湖南自修大学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1923 年 4 月，毛泽东和李达创办了《新时代》月刊，作为湖南自修大学的同人刊物，李达任主编。该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图谋社会改造为己任。《发刊词》指出：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主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藉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新时代》月刊一共出版了 4 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重要论文。李达相继发表了《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论文，此外，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的译文等也刊登在该刊上。上述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着重讨论和宣传了党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阐述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极强的理论性和针对性。

1923年8月,李达针对所谓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在湖南演讲“社会主义概论”,散布假社会主义的谬论,写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的长文,分5次连载于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上,批驳了江亢虎的观点,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联系中国现时经济的政治的实际,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据。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和教授,以后,法政专门学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担任教授,开始系统讲授唯物史观。1926年至1927年他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也讲唯物史观。也就是说自1923年底至1927年间,李达开始集中研究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说明社会发展问题,并力求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讲义的基础上,李达著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集中地体现了李达该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

所谓现代社会学,其实也就是唯物史观。他在该书序言中说:

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sup>①</sup>

他作此书,就是“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最早传播的就是唯物史观。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上发表了其所译的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启蒙意义。随后,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两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其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此后,唯物史观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热点,人们尝试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尤其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集中探讨。例如,蔡和森在1920年致毛泽东的信中就谈到:

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千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sup>①</sup>

所以,他主张明目张胆地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的还有瞿秋白和李汉俊。1923年秋,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也重点讲授了唯物史观,并写有《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等讲稿,较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讨论了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等重要问题。李汉俊于1922年离上海回武汉,也曾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主讲唯物史观,1926年春,应陈独秀之邀,也曾到上海大学主讲唯物史观。李汉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最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尤其是结合了当时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实际,论述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尖锐地指出了民主民族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因此可以看作是李达前一时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延伸和发展。而且,正因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回答了人们所迫切关心的革命的性质道路问题,所以,就系统性和深度而言,该书代表了当时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著作的最高水平。

该书于1926年出版,正合中国大革命发展的需要,而且该书

<sup>①</sup> 《蔡和森文集》第70—7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逻辑严密、文辞酣畅，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所以一经出版就十分流行，至1933年共印行了14次。正因为如此，反动当局在1928年通缉李达的罪名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sup>①</sup>

李达脱党以后，与党的组织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党的委托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26年10月，李达应邓演达之邀，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协助恽代英任政治教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李达应邀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春，李达还受毛泽东之托，做过唐生智的统战工作。是年3月底，又受党组织的委派，回湖南筹备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具体负责招生和教学工作，直至5月21日“马日事变”，李达离开了长沙回到了家乡。

## 四 十年治学

(1927—1937)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李达在家乡难以立足，接李汉俊信，李达于9月下旬离湘返汉，在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年底，桂系军阀攻入武汉，“厉行清党”，李汉俊、詹大悲等被枪杀，李达幸免于难，逃往上海。在李汉俊之前，李大钊也已死于奉系军阀的屠刀之下，这样，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李之中，仅李达幸存。

李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同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参加了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上海

<sup>①</sup> 《湖南清乡总报告》卷3，1928年。该件存湖南省博物馆。



地下党组织保持直接联系,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反“围剿”的带头人之一。

1928年底,李达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一起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重印了《现代社会学》的修订版。1930年在我国首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陈启修译)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李达译)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等著作。由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店的生存极为困难,到1932年,李达又以“王啸鸥”的名义创办了笔耕堂书店,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9年上半年至1932年2月,李达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李达的讲课受到了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外校和外系的学生也赶来听讲,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并且十分安静。李达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理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法国巡捕房还找借口抄了他的家。“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李达到暨南大学作时事讲演,在校门口遭到了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住院医治达7周之久。但他毫不畏惧,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到1932年2月,反动当局借“一·二八”迁校之机将他解聘,他离开了上海。

在上海的5年,李达以惊人的精力进行着著述和翻译。鉴于大革命失败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是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认识中国国情,李达介入了经济学领域,这也是唯物史观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趋势,由此才能更切实地把握中国社会,回答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又亟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李达开始集中地宣传和研究唯物辩证法,使其与唯物史观有机结合,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经济学领域,李达翻译了约6部著作,有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和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除翻译外,李达还撰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1929年1月由昆仑书店出版。该书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作者在“编辑例言”中开宗明义:

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sup>①</sup>

书中援引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及其趋势,从而指出:

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sup>②</sup>

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特点,书中通过对“农业和农业崩溃过程”的分析,根据近来农民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sup>③</sup> 这表明李达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方面又进了一步,并从理论上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88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5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3页。

在唯物史观方面,李达除了修订和多次重版《现代社会学》之外,还在该书基础上撰写了新著——《社会之基础知识》,于1929年4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是《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该书首先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认为“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sup>①</sup>作者以简洁的笔墨清晰地勾勒出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析了民族问题,最后以“中国的出路”为题作了总结,指出:

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sup>②</sup>

由于李达的结论是基于严密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在革命低潮中苦闷彷徨的青年人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李达把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看做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问题,中国革命既是民主革命又是民族革命,所以,他认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他将《社会之基础知识》的第四篇《民族问题》作了扩充,又单独成书,于1929年9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作者指出:

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sup>③</sup>

该书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着重分析了帝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8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558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0页。

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问题,认为: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是资本主义支配全部的问题,是与打倒帝国主义及被压迫阶级革命相关联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单独的问题。<sup>①</sup>

指明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

1929年以后,李达开始特别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宣传和研究,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非常薄弱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怎样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复杂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就显得越来越迫切。李达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积极的翻译介绍工作,这方面的有关译著有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又名《辩证唯物论入门》,1929年)、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上篇,1930年)、德国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年)、前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与雷仲坚合译)。上述四本书都是在问世后的次年就被译成中文出版,表明了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关注和重视。

上述译著的出版,对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前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李达在“译者例言”中指出: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

该书出版后影响极大。毛泽东读过该书1935年和1936年的版本,写了大量的眉批,为他的哲学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当时,毛在致易礼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信中道: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604页。

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sup>①</sup>

1941年,他还致信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推荐该书第六章作为理论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参考材料。<sup>②</sup>还有一份材料,也说明了该书在革命者中的影响。魏文伯在他所保存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封皮上曾写有“此书经历简记”:

此书曾于1935年在狱中绝食斗争结束后,第一次学习过。1939年9月,郭洪涛同志于去延安起程前,曾以此书赠我。不幸于1941年8月至11月,在日寇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扫荡”中,被日寇“剔抉”以去。1943年在日寇“扫荡”鲁中后的某村的大堆中再得此书。“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书于1978年无恙归来。<sup>③</sup>

成一段佳话。

李达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开阔了思路,提供了资料。所以,这几年也正是他对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深入地钻研、理解、思索、融会的时期,是李达哲学创造的重要的孕育时期。

1932年5月,李达受党组织的嘱托,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讲授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历时两个月,使冯玉祥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对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有重要的影响。

1932年8月,李达来到了北平。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他执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与李达是留日时的同学,于是李达任该院教授,随后兼任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的学生为聘李达执教,几乎闹成罢课,通过学生的努力,李达又被聘为中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③ 武达功《李达著作历险记》,1981年1月7日《湖北日报》。



国大学的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李达还兼任了朝阳大学的教授。李达来到北平后,国民党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严密地监视着这个危险人物。

李达来到北平,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青年学生尤其拥戴进步教授。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没有进步教授任教,学生会闹事,并且影响到生源。李达曾对吕振羽说:“我们不来,学校就会关门,我们就抓住这个矛盾进行斗争。”<sup>①</sup>他推荐马克思主义学者吕振羽、黄松龄等到中国大学任教,支持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并为吕的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进行校阅并作序,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他还鼓励友人侯外庐宣传马克思主义,说:“我的目标大,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你年轻,可以多做一些工作。”<sup>②</sup>李达联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学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宣传。当时李达和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被进步学生和进步报刊称为“红色教授”,并以李达为首。

李达在大学讲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货币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成为当时“最叫座的教授”,外校、外系学生都踊跃来听,影响极大,声誉很高。<sup>③</sup>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引导了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李达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左翼理论家。

李达还积极拥护党的抗日爱国主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1933年5月,李达又受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去张

---

①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② 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198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③ 参见尹进《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逸文:《〈学人访问记〉的回忆》,《新闻研究资料》,1979年第1辑。



家口给冯玉祥讲学。名义上是讲辩证逻辑,实际上是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经过李达的工作,冯玉祥愿意同共产党人联系。北平地下党又派了张慕陶与冯谈了三天三夜,推动冯玉祥树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1934年4月,在党的领导下,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建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1779位有影响的人士,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

李达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1937年,李达在课堂上讽刺蒋介石所谓“和平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口号,说:“照这样说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日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日了。”因此被扣上“侮辱领袖”的罪名,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下令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要解聘李达,因徐诵明、白鹏飞不同意,此事僵持了数月。6月,李达与白鹏飞上庐山找蒋介石交涉,随后,李达下山返湘,探视患病的老父。由于“七七事变”爆发,交通断绝,李达由零陵转赴上海。

在北平的5年,李达在授课的同时,勤奋地进行著述。30年代,北平《世界日报》记者茜莘访问了60多位著名学者,写了近百万字的《学人访问记》,第一篇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这位记者后来回忆说:

开始访问时,我为了第一个访问谁,很费了一番斟酌。论学术,这些学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第一个访问谁都行。可是要选择一位在学识、品质方面都是被人敬佩的学者,就不得不多所考虑。结果我第一个访问的是李达教授。<sup>①</sup>

《访问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李达形象:

单弱瘦小的身体外,时常套着一件蓝面大褂,生活的磨难

---

<sup>①</sup> 逸文《〈学者访问记〉的回忆》。

给他带来过早的衰老,头顶上“光处”总是那样显眼。除了打球、听听戏,并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爱好。一天中大部分时光是关在室内与书本为伍。<sup>①</sup>

这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形象。李达勤奋治学,硕果累累。在哲学方面,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两部专著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在经济学方面,他撰写了《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两部专著,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尤其是《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这两部著作是李达在北平5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正是这两部书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

47万字的《社会学大纲》堪称是李达的代表作。这是李达用了三四年的功夫逐渐写成的,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经补充修改后以上海笔耕堂书店的名义出版。该书严谨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论证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结性著作,同时,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突出地强调了科学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突出地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其他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显现形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此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在历史唯物论部分也更具系统性和深刻性。

《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其全面性、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说,在当时中国的理论界是首

---

<sup>①</sup> 茜莘《学者访问记》,1935年1月28日《世界日报》。

屈一指的。根据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李达还特别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独到的阐述,这对于毛泽东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社会学大纲》的印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年中印行了三次。1937年5月该书正式出版后,李达即寄赠毛泽东,毛泽东读了10遍,并作了详细的眉批,<sup>①</sup>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华书店重新出版此书。1961年8月,毛泽东还建议将此书修改出版,认为对当代学者仍有现实意义。

李达在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由于授课的需要,又将工作重心移到经济学货币学方面。《经济学大纲》是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结,也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行。李达在该书绪论中谈到:

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sup>②</sup>

他特别注重“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姿态、特殊的特征”,“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经济理论,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法则”。<sup>③</sup>李达在该书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考察“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指出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三个互相交错的过程”:

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

---

<sup>①</sup>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3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③</sup>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崩溃的过程。这三个过程中,第一过程占据统制的地位,这是不待多言的,第二过程它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虽然被第一第二过程所统制着,却仍然表现顽强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状态中挣扎着。……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况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该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sup>①</sup>

研读该书,不仅有助于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怎样推动中国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都具有启迪意义。李达将该书寄赠毛泽东,毛也向延安理论界作了推荐,他说,“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sup>②</sup>

## 五 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1949)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李达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可是,当他从上海辗转到达桂林时,却被解聘了。不得已,他又回到故乡零陵。这期间,他的父亲李辅仁因病去世。1938年2月,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才再次被聘为该校经济系教授兼主任。1938年冬,李达应冯玉祥之邀去了重庆,在冯玉祥研究室讲学。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返回桂林,但好友白鹏飞已离职,李达失去教席。迫于生计,他曾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1940年春,他流归故里。是年秋又应聘到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法学院教书,未及一年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1941年9月以后,他只能长期困居家乡。1944年8月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3卷,第23—24页。

<sup>②</sup>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

零陵陷落,李达携家人逃往道县的大瑶山避难,其间又遭匪抢劫,东躲西藏一年之久,受尽鼠蚊虫伤之苦,几乎冻饿而死,而他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以及毛泽东在延安给他的亲笔信也在这一次被匪人掠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达回到家乡,但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家境也很困难,“不得不靠卖酒谋生”。<sup>①</sup>

1939年在重庆的时候,李达与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都有联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延安给李寄来一信,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并欢迎他到延安去。周恩来派吕振羽看望李达,并问他意愿。李达当时表示愿意前往,但是又想继续出版自己的著作,加之年老多病,态度不甚坚决,只是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恰巧周恩来出国治病,董必武不在,未能成行。周恩来回国返渝后,得知此事,深为惋惜。李达自己也颇为后悔。<sup>②</sup>

李达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在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还曾应邀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在重庆,李达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还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and 经济学。临离开重庆前,李达还留有一封长信给冯玉祥,邓初民回忆说:

原稿他给我看过,写得很好,对冯将军有许多宝贵的建议。据说:冯将军读过这封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圈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真算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生不忘。”<sup>③</sup>

显然,李达的讲学,对冯玉祥晚年坚决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52页。

② 《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③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李达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不忘著述。即使在困居乡里衣食艰难的日子里,乡亲们还记得他躲避日机轰炸时带着一大堆手稿(可惜后来在瑶山遇抢遗失)。1941年9月,李达在桂林的《文化杂志》第2号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长篇论文。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中曾提到,原书计划写六篇,但第六篇来不及完成,付印的只是前五篇。他说:

关于第六篇中国社会的研究大纲及材料等项,都已有了准备,只是无暇整理。但研究所得的结论,也不妨在这里略提几句。本书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至于中国社会,却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sup>①</sup>

《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是熊得山遗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代序,但显然采用了原《社会学大纲》第六篇书稿的思路与材料,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社会特殊形相和固有特征的把握。

李达撰写这篇论文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1937年5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抛出了《东洋哲学史》,翌年又抛出了《支那社会构成》一书,在这两本书中,他蓄意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问题,说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由此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1940年,吕振羽撰写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吴泽撰写了《中国历史是停止倒退的么》等文章进行了批驳。李达的论文也是有针对性的,他首先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角度,论证了中国社会三千年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浅显的问题上过多的纠缠,而是着重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的原因,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自己的思路。

李达以渊博的知识,剖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从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的角度,归纳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八个方面的原因:战乱之频繁、封建的力役、封建的剥削、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封建的政治机构、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儒家学说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李达主张“把一切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及不能孕育新生产力的原因,都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sup>①</sup>论述了上述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共性,现在读来仍发人深思。这是李达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尝试。

该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普遍关注。探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问题。蒙达坦发表了《与李先生论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原因》,华岗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罗克汀发表了《论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原因》,王亚南发表了《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等论文,<sup>②</sup>这一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

抗战结束后,李达从避难的大瑶山区返回家乡,他毅然决定在故乡创办一所小学。为缅怀父亲,学校命名为“辅仁小学”。学校于1946年2月开学,李达亲任校长,学生70余人,大都家境贫困,一律免收学费。李达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进行教学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李达到湖南大学当教授后,仍兼任辅仁小学校长。学校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到1950年,李达将辅仁小学的全部校产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

1947年2月,李达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长沙。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李祖荫。李办学仿效蔡元培“兼容并蓄”的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706页。

② 分别载于《文化杂志》1942年第2卷第1号,《群众》1942年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3年第8卷第1、2期合刊,《时与文》1948年第2卷第19期。

风格,请李达在法学院任教。李达结束了“失业”生活。但是,湖南省当局向李达规定了“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而且,还把他列入黑名单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

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学校当局惧怕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许他讲授熟悉的社会学(即哲学)和经济学,而指聘他为法律系教授,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李达没有被难倒,反而又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他以顽强的毅力,不舍昼夜,不畏寒暑,不顾病痛折磨,发愤著述《法理学大纲》。盛夏酷热,臀部磨破,溃烂生疮,不能起坐,他便把两个凳子架起扁担,支撑腿部,坚持写作。<sup>①</sup>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法理学大纲》。

《法理学大纲》在当时没有出版,只是作为教材,由湖南大学石印了若干册。李达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这份讲义,可惜只有上册。这一部分已于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李达在这部著作中,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把卷帙浩繁的各派法学著作整理成一个系统,对各种法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历史和现实的法律现象给予了科学的解释。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期间,李达还重新整理出版了《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经济学大纲》第1分册,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和《新社会学大纲》(即《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论部分,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等著作,颇受读者欢迎。

李达在湖南大学,还冲破种种限制,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湖大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同学们去教授家访问,争取教授们支持学运。李达表态说:“国民党反动派不垮台,人民就要遭殃。”李达还几次在湖大形势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中国

---

<sup>①</sup>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非改革不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李达鲜明的政治态度,给进步学生以鼓舞,也使反动当局不安。湖大被称为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李达等人被认为是领导核心,并准备派兵拿办。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地下党组织学生,全力保护李达,晚上还为他站岗放哨,以保证他的安全。

从1948年11月起,李达还受地下党委托,努力做程潜的工作,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程潜于1948年7月来到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高级顾问、省府参议方叔章与李达很熟悉,李达首先通过方做程潜周围高级人士的工作。11月19日,李达与湖南地下党的余志宏在岳麓山桃子湖方宅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除方叔章外,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等都出席了会议。李达进行了政治形势分析,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大势和程潜应该采取的态度,并提出了如何集中力量对付桂系白崇禧的问题。肖作霖回忆说,这次座谈使大家都感到很愉快,尤其是李达的一席话说服力很大。<sup>①</sup>他们向程潜详谈了这次座谈的内容,程潜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并通过李达,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建立了联系。李达还直接参与了程潜争取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一些重要决策。例如,1947年3月间,程潜向白崇禧建议,调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来湖南,并兼长沙警备司令,这在事先是由程星龄与李达、余志宏商量并经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同意而实行的,后来余志宏又完成了争取陈明仁起义的任务。1949年4月,程潜得知李达决定前往北平,十分高兴,立即馈赠旅费并委托李达向毛泽东转告他和平起义的决心。后来程潜回忆说,毛主席给他写了信,谈到从李达那里得知他有起义之心,鼓励他下决心弃暗投明。

<sup>①</sup> 肖作霖《湖南起义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 六 晚年的学术活动

(1949—1966)

1949年5月16日,李达在党组织派人护送下,由长沙经香港到达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18日即应邀赴香山毛泽东住处叙谈。随后,他积极地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此外,还同沈钧儒、谢觉哉等筹备中央政法大学,任第一副校长;创办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任副院长;同艾思奇、冯友兰、汤用彤等筹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任主席;同郭沫若、陶孟和等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任副主席。9月,李达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委员。10月,李达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这时,李达表示了重新入党的愿望。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毛泽东指出,李达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损失。同时对他近30年的经历作了扼要评价,对他说:

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sup>①</sup>

这样,在12月,由刘少奇作介绍人,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李达先后担任了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

---

<sup>①</sup> 陈力新、李梅彬《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1978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作为教育家,他努力按教育规律办事,坚持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办成注重学术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作为学者,他仍然坚持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上耕耘,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释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崇高职责,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论著,为此,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达建国初期的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曾经给毛泽东的哲学创造以极大的帮助,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也使李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李达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着最深刻的理解。

1950年12月,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在半年时间里就撰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文章和《〈实践论〉解说》一书。李达在撰写《〈实践论〉解说》一书过程中,多次与毛泽东交换意见。1951年3月17日,毛在致李达的信中说:

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

并提出: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sup>①</sup>

1952年4月,毛泽东的另一部哲学著作《矛盾论》重新发表,

---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李达又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也寄毛泽东审阅,毛也再次致信李达,提供意见。李达同时还撰写了《〈矛盾论〉——中国革命的辩证法》,《〈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等论文。

作为哲学家,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为对自身哲学思想的整理、概括与探索。一方面,李达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旁征博引,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予以说明;在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又激活了李达的创造思维,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思想。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在《社会学大纲》中曾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非敌对社会中,不至发展为颞颥,但却是存在的。在《〈矛盾论〉解说》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发挥。他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

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sup>①</sup>

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sup>②</sup>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sup>③</sup>

上述思想,为1957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铺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4卷,第369页。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370页。

塾。所以,李达的这两部《解说》,也是当时重要的哲学著作。

1961年8月,李达遵医嘱到庐山休养,适遇毛泽东。毛泽东在与李达的交谈中,谈起了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又提到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认为此书现在还有意义,要李达修改出版。这时的李达,已是70有余高龄的人了,且患有多种严重的疾病,但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仍然壮心不已。1961年8月28日,他在给当时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的信中谈到:

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分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

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些轮廓。

三、修改《〈实践论〉解说》。

四、修改《〈矛盾论〉解说》。

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感。

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sup>①</sup>

在具体进行《社会学大纲》的修改工作后,李达的想法又不同了。他毅然决定大改,以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新的研究成果,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并决定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从此,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着病痛,带领助手,坚持写作近五个春秋,至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终于脱稿。但是,十年动乱不仅使他完成全书的心愿无法实现,且已脱稿的上卷亦未见正式出版,他就离开了人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定

---

<sup>①</sup> 《李达给余志宏的信》,《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名为《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是由他主编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这部著作贯彻了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理，建立了以唯物辩证法为中心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系统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突出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同时联系各种哲学思潮进行分析、比较、批判，概括了大量哲学史材料和自然科学成就，结合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这部著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范本。

李达晚年的学术活动，其核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李达在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过程中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并且以严谨的科学的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李达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有关论文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不仅仅是单纯的注释性读物。他解说《实践论》，把《实践论》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sup>①</sup> 他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标准”。<sup>②</sup> 他解说《矛盾论》，指出，“《矛盾论》主要地说明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辩证的关系”，它本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所以，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sup>③</sup> 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强调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

---

① 《李达文集》第4卷，第30页。

② 《李达文集》第4卷，第33页。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377页。

是李达阐释毛泽东思想的重点。

李达还全面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内容。李达不仅撰写了两论解说,而且对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论著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这些论著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这方面的论文有《读毛泽东同志 1926—1929 年的四篇文章》(1951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51 年武汉《新青年报》第 127、128 期)和《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章,他还写了《怎样学习党史?》(1951 年《新建设》第 4 卷第 6 期)一文,列举了在党的历史发展中,毛泽东主要的重要论著。李达概述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和中国革命论,前者见于李达主编的《社会发展史》(1951 年湖南大学印行),后者见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连载于湖北《理论战线》1958 年至 1959 年各期)。关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指的是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的认识和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途径的把握,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sup>①</sup>关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李达以毛泽东论著为依据,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经验,包括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内容。<sup>②</sup>李达主要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进行概括,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李达坚持认为对毛泽东思想要有科学的态度、正确的学风。他强烈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1956 年他在《谈“百家争鸣”》的讲话中,就社会科学研究中,报刊杂志中的某些论文,重在复述经典作家和伟大人物的论点,以“编成一篇在逻辑上语法上没有毛病的东西”为目的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

---

① 《李达文集》第 4 卷,第 12 页。

② 《李达文集》第 4 卷,第 654—711 页。



这种缺乏探索精神的、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sup>①</sup>

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争”,这是由科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科学,也和人类的一般认识一样,决不是个别伟大人物独建的奇勋,而是实践着和思考着的全人类的集体创作。所以,他说过,“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sup>②</sup>李达晚年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方面试图从学理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说明,同时也试图通过对新的科学与实践的总结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大纲》反映了李达的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年老体弱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李达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完成。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李达也反对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1959年,他在《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就不知道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在大量的实际材料面前就不会做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工作,不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性。<sup>③</sup>

---

① 《李达文集》第4卷,第519页。

② 《无任感慨话李达》,《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716页。

李达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呢?1962年,李达发表了《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篇论文。他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要有“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然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即学习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关于认识论,李达特别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由于实践是群众的实践,所以“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sup>①</sup>显然,李达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与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的观点是一致的。

李达以此为基点阐释毛泽东思想,并且,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有所批评。1958年以后,李达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这一年,他在武昌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的争论,他对陪同的湖北省委的同志说:

《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啊!主观、客观,主观要符合客观;实践理论,理论实践……讲得多好啊!现在连润之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sup>②</sup>

他公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精神,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人民空社”。他不同意1959年9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反“右倾”运动。1961年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4卷,第739—742页。

<sup>②</sup> 《毛泽东交往录》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月,他在庐山与毛泽东畅谈时,对“左”的错误提出了直率的批评。

李达还撰写了一些文章,在理论上进行了纠“左”的努力。这里先要提到的是1958年武汉《理论战线》第3、5期连续刊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文。文章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根源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结论。文章首先揭示了斯大林关于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观点,作者显然不赞成这一观点,他评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决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五个因素,进一步发挥了《社会学大纲》中的相关思想,其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力中的作用,他指出了“科学的本身是一般生产力”,在生产的过程中得到技术的应用就成为“新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sup>①</sup>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指出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具有优越性,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表现在它“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变革和发展”。<sup>②</sup>这篇文章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对当时日益滋长的越大越公越好的变革生产关系的热潮是个批评。1959年1月21日,李达在武汉大学作了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讲话,随后在29日以《正确认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上,3月15日又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在《长江日报》上,这些文章则是直接针对穷过渡、共产风等“左”倾思想的。李达认为,既要看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更要看到两者的差别。他指出,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社会消费品还不得不适应按劳分配的原则。他特别针对陈伯达等人鼓吹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谬论,指出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① 《李达文集》第4卷,第590—591页。

② 《李达文集》第4卷,第606页。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只有进到共产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取消”。这些思想是颇有见地的,对澄清当时的思想混乱有积极意义

李达坚持真理,绝不随风摇摆。这时候,李达与毛泽东在学术思想上已经出现了分歧。1960年,他为湖北省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写了认识论一章,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倾向,这一观点被错误地指责为“旧唯物论的感觉论”,李达表示要进行反批评。1964年至1965年,哲学界围绕着如何正确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但是,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滋长,这一表述极端地强调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合二而一”是哲学家杨献珍等人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用语,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主张既要重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也要重视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但是,这场争论在当时“左”的气氛下已经变成了政治批判。李达对这种政治批判是不赞成的。在多数哲学家卷入这场批判的时候,他没有介入。他致信给编书助手,主张“在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中不要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sup>①</sup> 1966年初,康生要李达接受唯物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的观点,李达没有同意,并说这是学术问题,同谁都可以争鸣。充分表现了一位严谨的学者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的品质。

李达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1959年,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他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1960年,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以后又扩展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

<sup>①</sup> 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书林》1979年第2期。

等。1963年以后,这些谬论充斥于报刊杂志。李达对此深恶痛绝。他反复地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不能割裂,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系统性,联系实际不能生搬硬套,要有科学性。<sup>①</sup> 1966年3月,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甚嚣尘上,李达极为反感。他质问道,“是顶峰,不发展了?”当有助手提醒说是林彪的观点,他明确地说,“我知道,我不同意!”他指出:“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sup>②</sup>他认为,“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sup>③</sup>

李达因此而遭致了大祸。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达就被打倒,宣称为武汉大学所谓“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还点名诬蔑他是“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这年7月,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李达坚持真理,奋力抗争,在批斗会上从不低头,据理驳斥。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匠,于1966年8月24日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李达去世之前,曾致信毛泽东,其中写道: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该信20天后辗转到了北京,毛泽东作了批示,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

① ② 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③ 于世杰《忆李达同志》,《新湘评论》1979年第5期。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扼要地回顾了党的历史,讲了党的“一大”代表的情况,提到了李达,说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前两年去世了。后来,毛泽东在长沙曾经说过,“现在看来,还是李达同志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sup>①</sup>1974年1月,举行“李达同志追悼会”,但没有彻底平反。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1996年9月,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

<sup>①</sup> 《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第19页。

## 第二章 学术著述

### 一 “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李达的主要译著

鲁迅先生把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理论,比作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李达正是这样一位“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的人。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家。据现有资料统计,李达自译或与他人合译的著述共 31 种,其中专著 21 部,总计字数在两百万字以上。这些译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达的著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法学、史学、妇女学乃至文学等多方面的内容。

李达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18 年到 1924 年,翻译文章 11 篇,专著 9 部。第二个时期从 1928 年到 1932 年,共翻译专著 12 部。

李达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问题,他最早翻译的三部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大体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时,像他这样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书籍的人,是少有的。

《唯物史观解说》的原作者是荷兰人郭泰,李达根据德文本并参照日文本将它译成,中文本 1921 年 5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 1936 年共出版 14 次。全书共 14 章,6 万字,书前有柯祖基(即考茨基)的序,书末附有《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和译者附言。这本书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附录《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中,李达翻译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的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和发现唯物史观经过的那段说明,以及恩格斯在为 188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马克思对发现唯物史观的贡献的两段话。这有利于人们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理解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于中国人民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直到 1935 年,报刊上仍有文章推荐该书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考茨基撰写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我国先后有陈溥贤,戴季陶等译的多种译本。李达的译本 192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 1925 年共印行 4 版。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它列为阅读文献。

《社会问题总览》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思想家高畠素之,原著出版于 1920 年 1 月,李达很快将它译成中文本,1921 年 4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 1932 年,共印行 11 版。

《社会问题总览》约 21 万字,书前有原著者序和书的“总说”,余下共分四编,即“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和“妇人问题”。

在序中作者指出:“本书底目的,在希望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供给最好底研究资料。”

作者认为,所谓的社会问题,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社会问题,是产业制度下的劳动问题,广义的社会问题,是关系社会全体的问题。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其解决方法“不外社

会政策与社会主义”。<sup>①</sup>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是以“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为根底的,社会政策“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撤废自由竞争和财产私有两大原则的。”<sup>②</sup>因而它不可能根本地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唯有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撤废资本主义,才能有希望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是“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作为公有,使劳动者不至化为商品”。<sup>③</sup>“简单地说,就是以废止资本家的经济组织作主义的”。<sup>④</sup>

作者还阐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把理想社会“空想的发明出来”,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要件,现实的发现出来”。<sup>⑤</sup>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脱离了空想的境界,在学理上有了大的进步,在实际运动上,也开拓了新机轴,不仅在社会主义史上,而且在人类生活史上,也划了一个新纪元。作者指出:社会主义的发生,资本主义的倒坏,“都是必然的命运”。<sup>⑥</sup>

这一时期李达的译著还有安部矶雄的《产儿制限论》(1922年)、高抑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史》(1924年)等。1923年,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李译本是这本马克思名著的最早的两个中译本之一。

1928年至1932年,是李达译述活动的又一个盛期。5年中,

---

① 《社会问题总览》第1页,中华书局1921年4月版。

② 《社会问题总览》第9页

③ 《社会问题总览》第11页。

④ 《社会问题总览》第186页。

⑤ 《社会问题总览》第215页。

⑥ 《社会问题总览》第216页。

他自己或与他人合译的专著总计 12 部。包括哲学著作 3 部：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 年, 昆仑书店), 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 年, 上海心弦书社), 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 年, 笔耕堂书店); 经济学著作 6 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0 年, 昆仑书店), 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1930 年, 昆仑书店),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 年, 昆仑书店), 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1930 年,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 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1930 年, 商务印书馆), 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2 年, 笔耕堂书店)。此外还有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1928 年, 商务印书馆), 山川菊荣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1929 年, 上海远东图书公司) 和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1929 年, 昆仑书店)。

《政治经济学教程》是拉比托斯和渥斯特罗夫合著的, 李达与熊得山根据该书 1931 年第六版的日文本译成中文本。原著分上下两册, 上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 下册说明苏维埃经济的理论, 李、熊所译的是原著的上册。中译本分上下两册, 1932 年 6 月, 笔耕堂书店出版了上册, 1933 年 2 月出版了下册, 该书 1933 年 9 月再版, 1936 年 4 月出版第 3 版。

中译本《政治经济学教程》约 31 万字, 是李达译述中篇幅最长的一种。书前有译者例言, 绪论之后, 共分八篇, 依次阐述了价值论、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资本的再生产与积蓄、利润及生产价格论、商业资本及商业利润、放款资本与信用、信用币和纸币, 以及地租等问题。

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这部译著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批评了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舍弃生产力, 或者是仅把生产力的研究作为理解生产关系的一个手段的唯心论观点; 同时也批评了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外去研究生产力的机械论观点。它认为,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深



刻统一着的。“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则,因而又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sup>①</sup>

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问题上,这部译著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概念。它认为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学是狭义的经济学,广义经济学“是以研究不同的经济构造之固有性为任务的”。<sup>②</sup> 广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发展法则,也研究封建经济的、共产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发展法则。它没有否定狭义经济学的研究意义,指出研究清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死亡的诸法则,“普罗列达里亚在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上,就握着有力的武器”,<sup>③</sup> 而且对于指导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至于广义经济学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意义,作者认为:“只有在我们的经济运动法则的深刻研究的基础上,普罗列达里亚才能把社会主义推到成功的道路上”,<sup>④</sup> “这就是我们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锐利武器”。<sup>⑤</sup>

对这部著作,李达作了较高的评价。在“译者例言”中,他说:这部著作依据“严格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正确地考察了经济学的诸问题,正确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本书实可以说是现阶段的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这本译著出版以后,1935年李达写成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大纲》,把两部著作进行比较,不难看出译著对《经济学大纲》的影响。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基本问题上,李达都吸收了译著的观点。当然,李达并非是照搬照抄,而是

---

①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8—9页,笔耕堂书店1932年6月版。

②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2页。

③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5页。

④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页。

⑤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8页。

在译著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比如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李达明确提出经济学以研究各社会经济构造为对象的观点;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上,李达认为不仅要研究各种形态的社会经济构造,而且要研究现今中国的经济。

李达这一时期的哲学译著,最具代表性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也是李达的最后一部译著。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6位前苏联“少壮的实践的哲学家”合著的,李达、雷仲坚根据日译本译成中文本。李达翻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并且负责全书的校对和统稿。中译本1932年9月由笔耕堂书店出版,1935年6月发行第3版,1936年12月出版了第4版。

《教程》共6章,27万字,包括绪论,全书共7个部分。

绪论强调了哲学的党派性问题。它认为哲学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两个变种——机械论和观念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形而上学又反对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含义。《教程》进而指出:“在哲学上也和政治上一样,两个党派互相斗争着,特定的阶级在政治斗争上,成为一定世界观担负者而出现”。<sup>①</sup> 这样就把哲学上的党派性问题与政治上的党派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教程》没有也难以划清哲学上“党性原则”与政治上党性原则之间的界限。

第一章“唯物论与观念论”,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上基本派别的对立和根源。它批判了唯心论的巴克列学说及马赫主义、康德主义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批判了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与现代机械唯物论,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它指出:列宁不仅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复活了

<sup>①</sup>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11页,笔耕堂书店1932年9月版。

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创建了列宁主义,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sup>①</sup>

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阐述了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同一性,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过程与动因等认识论原理。

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按照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次序说明了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教程》提出了部分质变和阶段质变的观点,多方面探讨了对立统一法则的内容,说明了这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指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sup>②</sup>《教程》认为否定之否定法则,“是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更加具体化了的的东西”,是“普遍的法则”,它决定了一切事物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sup>③</sup>

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第五章“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四对基本范畴,构建了一个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这是30年代初前苏联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虽然这一体系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但对以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对形式逻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教程》的中译本,对中国系统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我国30年代前苏联三部哲学名著的头一部。1939年5月,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出版,其中就收录了该书的绪论“哲学之党派性”。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研究组和

---

①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182页。

②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82页。

③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50页。

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信中开列了四本书，其中之一就是“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sup>①</sup>

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可以看出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式。毛泽东自己曾两次细读过这本译著。第一次是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了该书的第3版。第二次在1941年3月以后，阅读了该书的第4版。第一次阅读时，毛泽东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教程》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该书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影响到我国5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而有关哲学党派性的论述，则影响到以后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的政治化倾向。

## 二 《现代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的第一部专著。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离上海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后，他又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一时期，李达主要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讲义的基础上，李达整理写成了《现代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1928年1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修订版。该书的出版，适应了当时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求，因而一版再版，至1933年共重版14次。这本书在当时的革命者手中流传极广，“差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不多人手一册。”<sup>①</sup>

书以“现代社会学”行名,但它并非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社会学,更不是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它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学的这种理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前苏联的影响,20年代,前苏联的大多数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李达力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造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的一种尝试。李达认为,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sup>②</sup>因此,运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书的序言中,李达说:

细察现代社会学之趋势,实已由唯物论而进至唯心论,盖采取所谓社会心理学之方向者也。反因为果,倒果为因,推其极致,殆将愈使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也。予为此惧,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sup>③</sup>

这段话同样也说明李达改造社会学、著《现代社会学》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现代社会学》全书18章约17万字。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是全书的概论,以下17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第二部分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八章,主要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

---

①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

②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方面,李达准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之后对家庭、氏族、国家、阶级、社会意识和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方面,李达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穿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sup>①</sup> 以此,李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李达进一步阐述了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任务,过渡步骤和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探讨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现代社会学》在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李达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严格地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既坚持唯物论,反对了唯意志论,又坚持辩证法,反对了机械论。

在书的第二章,李达力避“契约社会说”、“物质社会说”、“心理的社会说”等三种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提出了“历史的唯物论社会说”。依据历史的唯物论社会说,“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sup>②</sup> 这样,就在社会本质问题上,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70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1页。

以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社会的本质,这是正确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李达阐述了社会构造、社会发展动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诸问题。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李达反复说明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作用。

在论述社会构造时,李达说:

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sup>①</sup>

这段话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构成社会之基础的生产关系,对社会构造之另一部分的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又起到决定作用,并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在以后的论述中,李达反复阐明了这一思想:

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sup>②</sup>

唯吾人应当注意者,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化所规定。<sup>③</sup>

李达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他说:“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他意识形态亦随之继续进化。”<sup>④</sup>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sup>⑤</sup>

李达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保证了唯物的一元史观的贯彻,防止了出现二元论或折衷主义的倾向。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4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5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9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44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3页。

李达同时也提醒人们,不应机械地理解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应该注意到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到的反作用:

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sup>①</sup>

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sup>②</sup>

在论述社会革命时,李达强调了“个人之努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社会变革完全依赖于经济条件,可以坐待社会之自然变化,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提醒人们注意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力时,又特别强调,这种反作用是有限的,有前提的,李达指出:

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而人类必欲以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sup>③</sup>

联系到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和建国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可以看出,李达的上述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李达在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进而论述了中国革命问题。

早在1923年李达就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9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5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2页。

的时期而进行到实行的时期了。”<sup>①</sup>《现代社会学》正是李达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达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性。他认为,帝国主义以变相分割的方法侵略中国,“金铁奴我以物质,宗教奴我以文明,教育奴我以服从,勾结我国贼,制造我内乱,涂炭我人民,”<sup>②</sup>中国已成为“国际的半殖民地”。<sup>③</sup>

李达具体论述了民族革命诸问题,这些论述,对中国革命同样是适用的。

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李达认为,“夫既称民族革命,则顾名思义,当然为全民革命之性质”,其对象“虽在颠覆帝国主义,而弱小民族内为虎作倀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亦在推翻之列。”<sup>④</sup>

关于民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李达指出,一旦民族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即发挥其自私自利之本能,对无产阶级实行剥削支配,历史上不乏其例也。”在弱小民族、买办阶级“不惟不革命,且多有反对革命者”,在弱小民族中,“最感帝国主义压迫之苦而觉知有革命之必要者,莫如工农无产分子。”<sup>⑤</sup>因此,无产阶级才是民族革命的中坚。<sup>⑥</sup>

关于民族革命的前途,李达认为,民族革命成功以后,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sup>⑦</sup>因此,一旦无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02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2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0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8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9页。

⑥ 《李达文集》第1卷,第360页。

⑦ 《李达文集》第1卷,第361页。

产阶级掌握了民族革命的领导权,民族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关于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李达指出,弱小民族必须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不与国际无产阶级相联络的“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较不革命尤为有害,不可不察也”。<sup>①</sup>

李达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和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正确而有力的论证。

《现代社会学》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分析现代各阶级时,提出知识分子“恃赤手以营业,绝无恒产”,属于“准无产阶级”。<sup>②</sup>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出路,李达指出:“有产阶级非得准无产者智力之援助无以谋事业之维持,无产阶级非得准无产者策略之指导,无以谋团结运动之发达。故准无产者谋生之方法不出两途,不供资本家驱策,即与劳动者为友。”<sup>③</sup>又如,对于社会意识,李达以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关系为线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切个人的共通意识”就是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经济上强有力阶级之要求包含于社会意识之中”,而其他阶级的要求都要受到“社会意识之压迫”,到阶级彻底消灭时,社会意识和个人的欲求相一致,“是谓社会意识之完成”。<sup>④</sup>上述观点,有些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它们的提出,体现了李达在理论研究中的独到精神,对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富有启示的。

《现代社会学》代表了我国当时对唯物史观理解和运用的最高水平,但它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它的不足在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书中只讲到了唯物史观,没有对唯物史观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63页。

② ③ 李达《现代社会学》,上海昆仑书店1928年版,第203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7—294页。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作出应有的论述,这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辩证唯物论的理解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时,虽也联系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但从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还是作得不够的。

### 三 中国向何处去 ——李达 1929 年的三部著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研究和回答的最迫切的问题。1929年1~9月,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著作,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 (一)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曾被译为日文和俄文。全书共7章,约7万字。关于写作该书的目的,李达在“编辑例言”中指出:

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

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sup>①</sup>

显然,作者的目的在于探求“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和“革命的理论”“建设的计划”等问题。李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他选择了产业革命这个角度。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388页。

李达论述了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说:

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sup>①</sup>

中国“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的重要表现,是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李达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研究。

首先,分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破产趋势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李达指出,在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农业开始出现了破产的趋势,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进口粮食的增加。手工业方面,破产更趋明显,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

其次,考察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和中国近代工业的现状。李达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这个过程来看,中国近代工业是有发展的,但从中国近代工业的现状来看,它依然是弱小的,基本上为帝国主义所支配。李达认为:“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很辽远的。”<sup>②</sup>

再次,考察了中国金融界的状况。指出,中国自办银行虽多,但资本过少,仍然受到外国银行的支配,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sup>③</sup>

最后,分析了中国资本构成情况。李达认为,从投资主体来看,中国资本可以分为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外国资本超过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又超过了私人资本。而“官僚资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92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28—429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469页。

本的特征,和外国资本是不可分离的”。<sup>①</sup>从资本的流向看,中国资本又可以分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中国资本的构成状况是,商业资本畸型发展,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发展不足。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sup>②</sup>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是在外力压迫下而发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在变革的过程中,越来越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从而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李达明确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sup>③</sup>

在书中,李达还着重论述了产业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李达认为:“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惟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在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基础上,李达分析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

首先,从产业革命的必然性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经济根源。李达指出,进入产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以下五种倾向:

第一,新式的工业的确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还只是刚到粗工业的阶段,而且已经出现了停滞的征象;

第二,农业呈现破产的倾向,原料和食粮,大受限制;

第三,手工业逐渐破产;

第四,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

第五,贫困程度增加,劳动问题和农民问题,日形严重。<sup>④</sup>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466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93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2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94页。

李达认为,上述中国经济混乱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的混乱,而正是由于这些混乱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中国革命的经济概源,“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去求得新的出路的”。<sup>①</sup>

其次,李达提出,要发展中国的产业,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在论述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时,李达指出,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sup>②</sup> 因此,“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sup>③</sup>

结合对中国产业发展条件的分析,李达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sup>④</sup> 这一结论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明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真知灼见,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 (二) 《社会之基础知识》

《社会之基础知识》作为“社会科学常识丛书”之一,1928年4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1932年10月再版。该书是1928年李达修订出版《现代社会学》以后,又一部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与《现代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94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78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488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3页。

社会学》相比,这本书在结构上更加简洁,层次更清楚。第一篇“社会进化之原理”,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第二篇“现代社会解剖”,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第三、四篇分别讨论了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第五篇“世界之将来”论述了民族革命诸问题,全书以“中国之出路”收结。

《社会之基础知识》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比《现代社会学》更集中,更扼要,也补充了一些作者新的研究心得。在“社会的政治制度与观念体系”一节中,作者专门论述了哲学问题,特别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虽然这些论述远不及《社会学大纲》丰富深刻,但比《现代社会学》对这一问题没有论及是有进步的,反映了李达的学术思想在不断地发展。该书在论述唯物史观时,还着重阐述了社会系统观,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是有创新意义的。

李达首先阐明了社会系统的概念,他说:

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sup>①</sup>

关于这个概念,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人类间的相互关系是“经常不间断的”,这是“社会的存在也是经常不间断的”原因;<sup>②</sup>其二,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是人类一切相互关系的基础,这是我们分析李达社会系统观时不可忽视的。

李达指出,社会的系统包括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系统,这三个系统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又是互相调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sup>③</sup>

但是李达并不否认社会系统的变化,他说:“社会是不断进化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8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04页。



着。所以社会的构成,也是不断地变化着。”<sup>①</sup> 因此,我们不妨把李达所说的社会各系统“互相调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看成是社会变化过程中一定时期的稳定状态,他所说的“均势”,即是社会三大系统之间达到的一种平衡,平衡出现时,社会相对稳定。

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李达认为,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sup>②</sup> 由于“劳动过程,构成社会与自然间相互关系中的根本关系”,<sup>③</sup> 因此,要进一步探求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的劳动的领域”。<sup>④</sup> 李达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手段是能动的部分,“是决定社会和自然间相互关系的精神的物质的标准”,<sup>⑤</sup> 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动力是生产力。

接下来,李达具体论述了生产力变化是如何引发社会系统其他要素变化的。李达认为,当生产力变动时,社会的技术和经济之间,就必然发生矛盾,经济构造随之失却均势,经济构造的变化,又必然引发政治构造中人员的改编,而法律的道德的及其他一切规范也必然随着变化,李达把社会系统的这种变化概括为“社会的均势之不断地扰乱和恢复的过程。”<sup>⑥</sup>

不难看出,李达的社会系统观,对生产力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纵深的探讨,这为我们分析复杂的社会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指向。

李达在这本书中,还专门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在书的最后

---

① ⑥ 《李达文集》第1卷,第516页。

②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9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00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501页。

一章“中国的出路”中,他指出:

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sup>①</sup>

李达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说明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肯定了中国未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重申了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的观点: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遗物,树立民众政权,建设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sup>②</sup>

### (三) 《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由《社会之基础知识》第四篇“民族问题”扩充而成,作为“新社会科学丛书”第二编,1929年9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在书前的“小引”中,李达提出了研究民族问题的目的:

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sup>③</sup>

这本书只是就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但作者强调,“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了。”<sup>④</sup>

全书共五章,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558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558—559页。

③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0页。

第一,说明了有关民族的基本问题。

李达阐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指出:“所谓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sup>①</sup>

李达依据经济基础的不同,对民族和氏族、种族作了区分。他特别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是民族发展的过程,因而“民族不仅是一般历史的范畴,而且是某一定时代之历史的范畴,即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范畴”。<sup>②</sup>

第二,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

李达认为,在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对民族政策,亦完全丧失其进步的革命的态度”。<sup>③</sup>一方面,利用民族政策,在本民族内压迫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压迫其他民族,实行“殖民政策”,导致“东方落后于西方”。这些表明,资产阶级在其内外政策上开始利用民族问题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李达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到了被压迫阶级的世界革命,已经上了世界史日程的时代,民族问题由国内的问题,变为国际的问题,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重要的枢纽”。<sup>④</sup>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具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质。其一,全世界日益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个阵营,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日益发展;其二,被压迫阶级以被压迫民族为其斗争的同盟军,“民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4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5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74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589页。

族解放运动由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问题变成为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而斗争之重要的要素”，<sup>①</sup>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已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第三，论述了民族问题几个根本原理。

李达一共归纳了七条，如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成共同战线的必要与必然，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等，<sup>②</sup>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

李达 1929 年的三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诸问题的正确主张，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三部著作在大革命低潮时发表，对国统区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李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代表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 四 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sup>③</sup> 是李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名著。

《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1935 年铅印的

---

① 《李达文集》第 1 卷，第 591 页。

② 《李达文集》第 1 卷，第 605 页。

③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讲义,全书5篇10章30万字。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修订本。修订本主要对第一篇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增写了一章“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论”(第一章),对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人类意识的生理机制和认识的逻辑方法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37年修订本共5篇12章42万字。1937年以后,该书还一再出版,1939年4月印行了第4版。1948年2月,生活书店将该书的第二至五篇(即历史唯物论部分)以《新社会学大纲》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48年新华书店决定翻印出版书的全部,1949年5月,新华书店分5册翻印出版了该书。

关于《社会学大纲》的写作,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的历史背景。

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纵深发展,其主要表现是研究传播唯物辩证法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社会学大纲》的问世,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纵深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唯物辩证法的“风行国内”,以张东荪、叶青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唯物辩证法,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正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反击。

进入3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抗日民族运动不断发展,革命需要理论,人民需要理论,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他在此书的四版序言中说:

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



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sup>①</sup>

第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译著的关系。

1928年到1932年,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时间上看,这些译著在《社会学大纲》完稿之前,因此,对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产生了影响,其中尤以李达自己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影响为最大。李达也吸收了其他人翻译的新成果,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时,李达敏锐地注意到了1932年才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sup>②</sup>其中最根本的契机,“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实践概念之批判的展开”。<sup>③</sup>李达正是以这部手稿为基本契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往中国哲学著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都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跳到《神圣家族》,留下了1844年这个空白,李达注意到《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以便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逻辑过程的全貌。

《社会学大纲》分两大部分,第一篇为辩证唯物论,第二篇至第五篇为历史唯物论。

《社会学大纲》的辩证唯物论部分包括四章:

第一章“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李达指出,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当作遗产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58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

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李达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列宁阶段,指出列宁的“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新的阶段”。<sup>①</sup>

第二章“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特征,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以及世界的发展与世界认识史的概观等问题。李达指出,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解决,是唯物辩证法的出发点。李达在这一章里还特别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发展,人类认识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科学世界的发展过程。

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全面地系统地考察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

李达重点阐述了对立统一法则,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sup>②</sup>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和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等问题。他把矛盾分为拮抗的矛盾和不带拮抗性的矛盾两种,认为“一切拮抗(或敌对)都是矛盾的发展阶段,而一切矛盾,不必都发展至拮抗的阶段”。<sup>③</sup>

李达还系统地介绍了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而对这两个法则的论述,都是紧紧围绕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个唯物辩证法核心而展开的。

第四章“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辩证法、论理学(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同一性问题。从三者的同一性出发,李达提出,唯物辩证法不仅要概括认识的历史,而且要研究认识本身,研究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第二,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65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2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0页。

李达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明确指出,“认识是实践的契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sup>①</sup> 第三,李达概括了认识的圆运动公式,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sup>②</sup> 认为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

《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论部分包括四篇:

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论述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关系,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论纲、研究对象,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

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概述了科学的阶级观和国家观。

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阐述了社会意识形态范畴,考察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特性、历史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内容,虽没有新的创见,但基于数年的研究,自信还有一些新的收获”。<sup>③</sup> 这些“新的收获”,体现了《社会学大纲》的独立见解和风格,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大纲》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材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逻辑范畴的体系。前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后,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作为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46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6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6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地阐述。这样处理,显然不同于前苏联《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大块的处理方法。李达指出:

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sup>①</sup>

这句话表明,如果不借助唯物辩证的方法,要想在社会历史观中贯彻唯物论,即创立“历史唯物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形成“统一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唯物辩证法部分,李达论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继而在历史唯物论部分,他又论证了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的统一、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统一。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不仅如此,李达还非常重视从各个基本原理的逻辑关联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比如,对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他从三者的对象和形成的角度,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在论述唯物辩证法诸法则时,紧紧抓住了对立统一法则这一核心,其他两个法则的论述则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由于作者的上述努力,因而《社会学大纲》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多方面的、内容丰富、体系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在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是仅见的,甚至也超过了当时已翻译出版的前苏联等国学者撰写的同类著作。这一体系的构建,对我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

第二,全书始终强调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李达认为,马克思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sup>①</sup>这样就使“从来的哲学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sup>②</sup>

首先,李达指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才能对人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深刻的解释,从而彻底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唯心论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变成自我意识,使意识脱离了自然和人的实践;旧唯物论把自然从人类中分离出来,把意识归结为纯自然的、被动的产物;实践的唯物论,正确地理解劳动、实践的作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人,和自然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一认识把劳动、实践理解为人和自然结合的媒介,当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论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能够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唯物论就从自然的领域扩张到社会历史领域。另一方面,实践的唯物论也克服了旧唯物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

其次,李达阐述了实践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意义。李达认为,唯物辩证法要实现科学历史观与科学自然观的统一,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他说:“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的实践”。<sup>③</sup>

再次,李达在论述认识论时,始终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除上述两点之外,《社会学大纲》的创新之处还有不少。比如,它专节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论述了生产力和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60—61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6页。



生产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又如,李达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分为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上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sup>①</sup>“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sup>②</sup>这样就避免了提一般上层建筑的缺陷。在分析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时,李达提出:“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是从敌对的社会经济构造中分化出来而建立于经济构造之上的东西,所以它仍然隶属于社会的存在”。<sup>③</sup>这种提法是富有新意的。《社会学大纲》的一些“新的收获”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它们对于启迪人们去发现问题、研究和探索问题是有意义的。

前面提到,前苏联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比如,对形式逻辑,书中几乎是完全否定的,这显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关键在于,李达没有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这个问题当时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搞清楚,李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当然,这些不足并不能抹杀《社会学大纲》的巨大成功。

有学者指出:“李达以自己精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这部大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将进入生根、开花和结果的新时期”。<sup>④</sup>结合我们以上的评述,可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90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290—291页。

④ 李其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290页,1991年11月版。

## 五 经济学领域的艰辛探索 ——《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较多,而对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重视不够,李达是少数涉足经济学领域并取得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 (一) 《经济学大纲》

1932年,李达到达北平,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大纲》就是他讲课时编撰的讲义,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行,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1948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将书的“绪论”和第一部分以《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书名出版发行。80年代编辑《李达文集》时,收入文集第3卷,1985年9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

李达原计划写四部分,最后只完成了两部分,即“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剖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构造。第二部分,作者严谨地依据马克思《资本论》前三卷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直到1936年,我国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全译本,其他卷次的出版更在其后,因此可以说,《经济学大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面系统阐述《资本论》原理的最早著作。尽管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早于1934年出版,但在体系的全面性和对《资本论》理论体系与原理的理解方面,是不及李著《经济学大纲》的。

针对当时经济学研究范围狭窄的状况,《经济学大纲》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概念。广义经济学把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不仅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而且还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对于构建广义经济学的理由,李达如是说:

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sup>①</sup>

这段话还表明,李达研究经济学有极明确的目的性,即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他指出,研究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sup>②</sup>理解先资本主义形态“如何被改造,被推进于社会主义的过程”。<sup>③</sup>而对现代中国经济的研究更具重大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sup>④</sup>

《经济学大纲》非常重视对中国各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其成果大致如下:

1. 从经济构造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
2. 论述了周代至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经济,概括了封建经济结构的九个基本特征。李达还特别分析了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他认为,“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

---

① 《李达文集》第3卷,第15页。

② 《李达文集》第3卷,第20页。

③ 《李达文集》第3卷,第21页。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sup>①</sup> 在其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sup>②</sup> 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sup>③</sup>

3. 李达指出，中国现代经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的烙上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sup>④</sup> 这一结论基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考察之上，李达认为，近现代中国经济存在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即“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sup>⑤</sup> 第一过程占居统治的地位，第二过程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被第一、第二过程统治着。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态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该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sup>⑥</sup> 这就是李达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4. 李达强调，达于社会主义并非循着同一条路线，“因为各个国民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特性，就会刻印着各自的特色”。<sup>⑦</sup> 中国自然不例外。

书的第二部分是遵循《资本论》前三卷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体系的，但从内容上看，又不乏创新之处。

《资本论》前三卷各以一卷的篇幅先后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问题，《经济学大纲》采用了这一体系，但在内容的取舍上，又体现了作者的意趣。它以较大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

---

① 《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

② 《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

③ 《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22页。

⑤ 《李达文集》第3卷，第23页。

⑥⑦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各占了五章,而只以一章的篇幅论述流通问题。这样处理,就突出了剩余价值由谁生产和怎样分配的问题,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个提示,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对此,李达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李达明确提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社会的经济构造”。<sup>②</sup> 那么,社会的经济构造指的又是什么呢?李达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适应于生产力的各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之总体,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sup>③</sup> 正因为如此,李达指出,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sup>④</sup> 李达的这个观点,对中国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50年代末,平心提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力。<sup>⑤</sup> 张闻天则在60年代末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脱离生产力而单纯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研究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sup>⑥</sup> 70年代末,熊映梧更明确地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把生产力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版。

② 《李达文集》第3卷,第4页。

③ 《李达文集》第3卷,第10页。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11页。

⑤ 平心《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新建设》1959年第7期。

⑥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的研究放在首位”。<sup>①</sup> 分析这些观点,不难看出李达在 30 年代提出的观点的深远影响。

## (二) 《货币学概论》

李达 1934 年起开始着手撰写《货币学概论》,书稿到 1937 年基本完成。《李达文集》第 3 卷确认它“是李达同志三十年代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sup>②</sup> 但书稿的最后完成则是在 1949 年 5 月李达重返北平以后。<sup>③</sup> 由书稿基本写成到最后定稿,跨时 12 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达这一时期的坎坷经历。

1949 年 7 月,《货币学概论》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50 年 2 月再版,1984 年收入《李达文集》第 3 卷。

据李达的学生尹进回忆,李达在谈及写《货币学概论》的动因时,说到:

世界金本位制崩溃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本位货币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当前资本主义恐慌第三期的必然现象,……为了有力地批判各种错误看法,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正确观点,必须学习《资本论》,发扬《资本论》中的经济和货币理论。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书,需要这样的书。<sup>④</sup>

李达所说的资本主义本位货币的恐慌,即指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

---

① 熊映梧《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经济科学》1980 年第 2 期。

② 《李达文集》第 3 卷,“编者的话”。

③ ④ 尹进《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及出版的伟大意义》,《经济评论》1991 年第 5 期。

后引发的货币信用危机,这一危机波及到资本主义各国,到二次大战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宣布放弃金本位制”。<sup>①</sup> 危机爆发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货币信用危机的战场。1931年,危机开始冲击中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产品,白银大量外流。仅1934年下半年,白银外流就达二亿三千万元以上,造成中国市面银根奇紧,中国银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国民政府多方谋求挽救危机,结果反而使法币成为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的附属。国际国内货币制度这样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李达写《货币学概论》,向世人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货币学概论》体系严谨,内容完备。依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3章商品与货币理论,《概论》先写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机能和对各派货币学的批判;然后,《概论》运用《资本论》第3卷第29至35章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有关货币、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理论,阐述了信用与信用货币及资本主义的货币体制;最后,运用并发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斯大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一系列论述,写了资本主义金融恐慌和金本位体制崩溃等内容。从内容的全面性和体系的严谨性来说,《货币学概论》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学者撰写的有关著作中是仅见的,即使放在当时世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上衡量,也是高水平的。

《货币学概论》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论断。比如在第2章“货币的机能”的最后,李达指出:“货币这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时也还存在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货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货币,其性质全不相同,并且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3卷,第675页。

义”。<sup>①</sup>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尹进把《货币学概论》与当时国内外的—些货币学著作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著作有王怡柯编译的《货币学》、刘觉民的《货币学》、美国学者甘米尔的《货币论》和前苏联经济学家科兹洛夫主编的《货币与信用》,经过比较分析,他对《货币学概论》作出了如下评介:

《货币学概论》乃是早在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部著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角度来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部门经济专业渗透的开端,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新的里程碑。<sup>②</sup>

## 六 《法理学大纲》

1947年2月,李达在历经五年多的失业生活后,第二次到湖南大学任教。学校当局害怕他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强令他讲授不熟悉的法理学。对此,李达决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子。经过艰辛的创作,在1947年暑期,终于写成了《法理学大纲》。

作为教材,《法理学大纲》1947年由湖南大学分上、下两册石印,但一直未能公开出版。李达去世以后,人们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这份讲义,可惜只剩下一部分。残剩的部分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为书写了序言。

---

① 《李达文集》第3卷,第614页。

② 尹进《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及出版的伟大意义》。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法理学大纲》共三篇十二章(其中第十二章不完全)。第一篇“绪论”和第三篇“法律之论理的考察”,论述了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法理学与世界观及社会观的关系、法理学的对象、任务与范围,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第二篇“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对西方法学中的古代哲学派、中世纪神学派、自然法学派、玄学派、历史学派、分析学派、社会哲学派、比较法学派等流派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判。

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同样可以贯彻到法理学中去。的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去阐述法理学的基本原理,这是《法理学大纲》最鲜明的特色。

首先,李达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法理学的哲学基础。

《法理学大纲》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书所采用的哲学,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的根本论纲是:‘存在决定意识’”。<sup>①</sup> 李达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在法律学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张,就构成为科学的法律观——这就是他所要构建的法理学。

李达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把法律制度当作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去理解,明确指出,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并受经济基础的规定,同时对于经济基础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特定的法律制度适应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由一种形态走到次—高级形态”。<sup>②</sup> 运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原理,李达对中国当时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现行法律体系,决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sup>③</sup> 同样,李达对西方各派法理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各

① 李达《法理学大纲》第1页,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法理学大纲》,第17页。

③ 《法理学大纲》,第13页。

派法理学的哲学基础,都是观念论”,<sup>①</sup>“从主观的构思中,假设一个标准作为考察法律的根据,而使现实的法律生活与头脑中的假想相符合”,<sup>②</sup>它们都是主张思维规定存在,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

李达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主张“在全体的关联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在发展过程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sup>③</sup>他把这一原理引入法理学研究的领域,指出法律现象内部的各部分是彼此相关联的,同时它又与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社会现象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同时,法律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李达说:

法律的发展法则,是法律现象由本身中所固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诸现象间复杂错综中本质的关联之反映。这本质的关联,即是法律现象中内在的根本的矛盾。这内在的根本的矛盾,是法律的自己发展的源泉。由于这内在的根本的矛盾,法律就由低级形态推移于高级形态,由旧形态转变为新形态。特定历史阶段上法律的体系,由于它内在的矛盾之发展而发展,而又趋于消灭,转变为它种高级的体系。这便是法律的发展法则。<sup>④</sup>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阐明了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及其发展的法则,“使法律的理论从神秘的玄学见解中解放出来,而构成为科学的法律观”。<sup>⑤</sup>这种科学的法律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这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方向。

基于对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分析,李达认为,必须对中国的法律进行一番改造。这种改造,要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发展法则的正

① ② 《法理学大纲》,第 85 页。

③ 《法理学大纲》第 5 页。

④ 《法理学大纲》第 7—8 页。

⑤ 《法理学大纲》第 6 页。



确认识基础之上,必须与中国社会的基础相适应,与中国社会的前途相配合。李达指出,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改造,“虽是艰巨的,却是可能的。这样的工作,是法理学的最高任务”。<sup>①</sup>这也正是李达撰写《法理学大纲》的目的。

其次,李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了法律的本质问题。

李达认为,“法律的本质,即是法律现象的各种形态中所潜藏的根本关系”,<sup>②</sup>要发现法律的本质,必先考察法律的现象。

法律的现象,表现为自由的保障和平等的实现,但深入地考察,法律的现象中又潜藏着不自由与不平等的规定,“法律是实现不自由基础上的自由,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而是实现不公道基础上的公道”。<sup>③</sup>它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对此,李达从更深层次上进行了分析。

从更深层次上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公权上的关系和私权上的关系,前者是政治关系,后者是财产关系。李达指出,公权关系的体系,即是国家形态,“公权上的关系,是基于私权上的关系而成立,并且保障私权上的关系的”。<sup>④</sup>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而私权关系的体系即财产关系体系,在法律上只不过是“特定阶级的经济结构在法律术语上的别名”。<sup>⑤</sup>因此,“法律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即是阶级关系”。<sup>⑥</sup>法律是国家的统治者用以保障特定阶级的经济结构的许多规则的总和,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法律的本质,即是阶级关系,即是阶级性”。<sup>⑦</sup>在书中,李达具体研究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进一步论证了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这一结论。

---

① 《法理学大纲》第 14 页。

② 《法理学大纲》第 99 页。

③ 《法理学大纲》第 101 页。

④ ⑤⑥⑦ 《法理学大纲》第 102 页。

从李达对法律本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法律价值属性问题的见解。法理学的价值论,指的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法律现实的评价和价值选择。李达先从法律的功用上分析了法律的价值问题。他认为,法律“是统治者为保障阶级经济结构而拟订的种种规则”,<sup>①</sup>“法律的功用,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实现国家的目的”。<sup>②</sup> 法律的功用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律本体的价值属性。对法律价值属性的分析,还体现在李达对自由问题的论述上。李达认为,“从表面这个角度看去,法律是实现个人自由的”,“一切法律行为,都以意志自由为基础”。<sup>③</sup> 也就是说,不与自由相联系的法律,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意义。李达提出,自由作为衡量法律的社会价值尺度之一,必须从所有权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自由有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两种,宪法上所赋予人民的自由都是形式的自由,而只有财产自由,才是实质的自由,“形式的自由,要有实质的自由,才有内容,才有意义”。<sup>④</sup> 而一切的自由,都“要以所有权的自由做基础。人们如果没有所有权的自由,其他一切的自由,都只是形式的”,<sup>⑤</sup> 因此,在私有制社会里,自由只是有财产者的自由,无产者是不可能真正自由的。不难看出,李达对法律价值属性的论述,同样有力地论证了阶级性为法律的本质这一结论。

李达还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法律本质问题。李达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只是国家规范中非道德部分的法律

---

① 《法理学大纲》第 96 页。

② 《法理学大纲》第 93 页。

③ 《法理学大纲》第 100 页。

④ 《法理学大纲》第 101 页。

⑤ 《法理学大纲》第 104 页。

与道德规范中未经法律化的部分的道德的区别”。<sup>①</sup> 当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普遍的全面的道德，就变为偏颇的阶级的道德了”。<sup>②</sup> 因此，已被确定为法律的道德，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的部分，至于道德中妨害统治阶级经济结构的部分，就制订为禁止或命令的法规；与经济结构不相抵触或无关重要的部分，统治者认为无统治实行的必要，或因其性质不适于强制禁行的必要，就放任人们自由遵守。李达的分析，攻破了“法律的本质是抽象的道德观念”的错误观念，他说：“可知各派法理学者所强调的‘法律是道德’的传统见解，确有片面的真理，不过所说的‘道德’二字之上，省略有‘特殊阶级的’这个形容词罢了”。<sup>③</sup>

再次，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各派法理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

《法理学大纲》的第二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上各法理学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该篇的结尾，李达写了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他说：

各派法理学对各该时代的法律都有相当的贡献，后起的各派对于先起的各派，都有其补偏救弊的功能，但同时又各自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暴露其所主张的学说都不是科学的。<sup>④</sup>

可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法理学派进行分析，是李达的观点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根本前提。对各法理学派的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作者不是孤立地分析，而是把它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这就使其所论述的问题能植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

① 《法理学大纲》第 109 页。

② 《法理学大纲》第 108 页。

③ 《法理学大纲》第 112 页。

④ 《法理学大纲》第 84 页。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要旨在于,将法律观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的现象,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法律现象在社会现象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承认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李达指出,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不可能做这些,因而它们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法律观,相反,它们却有四个共同的缺陷。

1.“各派法理学的哲学基础,都是观念论”。<sup>①</sup> 观念论即唯心论,它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就是从主观的意念中,假设一个标准作为考察法律的依据,使现实中的法律与头脑中的法律相符合,因而不是科学的。

2.“各派法理学都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sup>②</sup> 它们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不懂得国家是社会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因而不懂得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法律与国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因而也不可能具有科学的性质。

3.“各派法理学都缺乏社会现象互相联系的观点,不懂得法律在社会诸现象中所处的地位”。<sup>③</sup> 它们不愿意理解现实社会的真相,而与社会的现实相隔离。

4.“各派法理学都是站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去追求公平的”。<sup>④</sup> 它们所寻求的法律公平或正义,是不公平中的公平,不正义中的正义。

《法理学大纲》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崭新的哲学思考,为我国法理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韩德培评论说:李达“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sup>⑤</sup> 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

① ② 《法理学大纲》第 85 页。

③ ④ 《法理学大纲》第 86 页。

⑤ 韩德培《〈法理学大纲〉序》。

是的。

## 七 “犹上文坛作老军” ——李达建国后的著述

建国以后,李达迎来了他学术创作的又一个盛期。在人生的晚年,他撰写了大量著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唯物辩证法大纲》是其中的代表作。

### (一) 《〈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

50年代初,《人民日报》单篇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了促进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李达决定对“两论”进行解说。

《〈实践论〉解说》写于1951年上半年,先由《新建设》杂志1951年3—6月号分四期连载,1951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以《新建设》刊载的内容为主干,同时收入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和“怎样学习《实践论》”两部分内容,共7.6万字,1952年出版了重排第4版,至1958年4月,共出版6版。1979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力甫·马夏和库巴尼德义合译的《〈实践论〉解说》哈萨克文本。

《〈矛盾论〉解说》写于1952年下半年,先在《新建设》杂志1952年7—12月号 and 1953年1月号分七次连载。1953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矛盾论〉解说》的单行本,1978年4月出版了第2版。全书约14.5万字。

“两论”解说,采取逐段解释的方法,运用历史、哲学史、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实际斗争的经验材料,对原著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是逐句解说。对原著中概括性、理论性较强或涉及到其



他领域内容读者不易理解的部分,李达多采取这种方式,这也是“两论”解说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

比如,《实践论》在开头提出了新旧唯物论的界限问题: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sup>①</sup>

原著只有 60 多字,但涉及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特征是什么?什么是人的社会性?什么是社会实践?为什么认识必须依赖于实践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是都很清楚的,因此,李达在解说时,以 1800 多字的篇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逐个说明。

第二是摘要解说。对于原著中论证较为充分的段落,多采用这种方法,即先提取原著的主要观点,然后对其进行解释,这种方式有利于读者准确地抓住原著的要点。比如,《矛盾论》中有一段是批判研究问题时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sup>②</sup>原著者用墨较多,李达在解说时,紧紧抓住了原著关于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定义,运用中国革命史上的具体事实,揭示了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表现及其危害,并进行了分析。

第三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李达解说“两论”,严格地忠实于原著。但他尊重原著,却又不拘泥于原著,在解说时,非常注意发挥和深化他本人的观点和思想。

比如,《矛盾论》中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李达在解说这句话时,就进一步发挥了他在《社会学大纲》中提出过的未来新社会仍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他说: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2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2—314 页。

既然矛盾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般法则，那就没有例外，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所以无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sup>①</sup>

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因而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不能采取解决对抗矛盾的方法。

李达的上述观点，表明“他超出了同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水平，从理论上超前领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sup>②</sup>在两论解说中，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渗透”、关于党内思想斗争是党的生命发展的动力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对“两论”进行解说，就必然涉及到对“两论”的评价问题。

李达认为，《实践论》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观点最初是由前苏联《真理报》提出来的，李达对这一评价深表赞同，针对后人对这一评价的疑问，李达特别阐说了“发展”一词的涵义：

所谓发展，是意味着它的延长、继续和补充，而这种延长、继续和补充，又必定符合于实践。<sup>③</sup>

《实践论》发展了马列主义认识论这一观点，贯穿于《〈实践论〉解说》的始终，对这一观点，李达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实践论》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

---

① 李达《〈矛盾论〉解说》第219页，三联书店1978年4月版。

② 《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上卷第29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李达《〈实践论〉解说》第107页。

革命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冒险主义的偏向,并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做了系统的严密的分析和独立的光辉的补充。<sup>①</sup>

李达强调了《实践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意义,指出《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是“革命行动的理论”,<sup>②</sup>它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方针”。<sup>③</sup>

李达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sup>④</sup>

李达对“两论”的评价,虽有个别拔高的提法,但从总体上说,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即使到了个人崇拜日益严重的60年代,李达对“两论”的评价仍基本保持着他著两论解说时的基调,没有随波逐流,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贵品质。

李达解说“两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许。在看了刊载在《新建设》上的《〈实践论〉解说》前两部分后,毛泽东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出并发表后,应当出一个单行本,以广流传”。<sup>⑤</sup>“两论”公开发表后,解说的文章和著作不少,但就系统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而言,李达的“两论”解说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

① 《〈实践论〉解说》第107页。

② 《〈实践论〉解说》第1页。

③ 《〈实践论〉解说》第10页。

④ 李达《怎样学习〈实践论〉》,《李达文集》第4卷,第395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 (二)《唯物辩证法大纲》

李达生前编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唯物辩证法大纲》。

1961年,在庐山,毛泽东建议李达重新修订出版《社会学大纲》。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李达决心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并率助手立即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作。到1965年下半年,《大纲》的上册脱稿,当时印行了少量稿本,送毛泽东等同志征求意见。“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大纲》的编撰工作被迫中断,《大纲》的后半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提纲和初稿被抄走。直到1978年6月,书稿的上半部才得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唯物辩证法大纲》。1980年7月,新疆出版社出版了卡哈尔译的哈萨克文本。

《唯物辩证法大纲》共5篇37万余字。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及其一般特征。作者批判了“二元论和折衷论”,区分了旧唯物论的可知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可知论,探讨了发展观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认为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特征在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及其创立和发展。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过程中,吸收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和当时各门学科的成就;它产生的历史根据是19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它的产生适应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篇还具体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第三篇“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系统分析了物质、运动、空间与时间，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等问题。作者认为唯物辩证法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根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原理，即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和世界无限发展的原理。

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作者认为，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源泉，显示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根本分歧的焦点”。<sup>①</sup>其次，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态，只有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理解。在量变质变规律一章中，作者把《社会学大纲》中的“质量范畴”改为“度”，提出了“在量变的过程中有部分的质变，在质变的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的观点，指出，所谓部分质变，既有“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又有“局部性的部分质变”；<sup>②</sup>而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则是指新质在旧质的范围内首先突破一点或几点，然后不断扩张，直至完成质变过程。在肯定否定一章中，作者把事物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概括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sup>③</sup>在本篇最后，作者按照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与现实的顺序，分析了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

第五篇“当作认识论和逻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该篇还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认识

---

① 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

②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303页。

③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325页。



的检验和发展,以及真理论等问题,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是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sup>①</sup>

《唯物辩证法大纲》完成于 60 年代,它表明了当时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所达到的水平,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对此,我们作以下简单的说明:

第一,《唯物辩证法大纲》系统性强,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它继承了《社会学大纲》的优点,不再赘述。

第二,《唯物辩证法大纲》概括了新的科学成果,这方面的内容比较集中表现在书的第三篇。在说明“物质结构”时,作者以 18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从原子说进入基本粒子说的历史过程,说明“比较不完美的观点为比较完善的观点所补充或修正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sup>②</sup>在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时空观时,作者以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微观客体的“测不准关系”,说明没有离开时空的物质;以欧几里得几何学,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和黎曼几何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自然科学成果,说明也没有离开物质的空间和时间,从而论证了物质和时间、空间是不可分的这一观点。

第三,《唯物辩证法大纲》概括了最新的历史经验。作者不仅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且对概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行了尝试。

第四,《唯物辩证法大纲》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在书的第二篇,作者从哲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毛泽东继列宁之后,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sup>③</sup>作者指出毛泽东对马

①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413 页。

②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169 页。

③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149 页。

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表现为四个方面：

1. 毛泽东把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提高到哲学高度，为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和可靠的保证，《实践论》和《矛盾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2. 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简要地、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使它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能够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

3. 毛泽东在指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力量，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独特条件之下，创建了一整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学说，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4.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学说，从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在其他各篇，作者对毛泽东的哲学贡献也作了具体的阐发。比如在第五篇，就突出说明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融为一体的理论贡献。作者指出，作为群众路线内涵之一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为，一方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与‘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认识论公式，是完全一致的”。<sup>①</sup> 另一方面，“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领导方式，同“‘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论公式，也是完全一致的”。<sup>②</sup>

第四，《唯物辩证法大纲》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左”倾思想的痕迹。

《大纲》成书的60年代，“左”倾思潮在不断发展，《大纲》的写

---

①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483页。

②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484页。

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比如,《大纲》指出前苏联学者关于“对立面的同一”的理解,是修正主义的根据,而我国“‘合二而一’论的炮制者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沆瀣一气”,其论点是“十分荒谬的”。<sup>①</sup>又如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评价,有些措词,如“第一次”、“光辉的新境界”等等并不恰当。

需要指出的是,《大纲》是由多人合作写成的,书中有些错误提法并不能代表李达个人的思想,如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李达是不赞成的,并写信给其他的编写者:“在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中不要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sup>②</sup>这一点,作为编写者之一的陶德麟曾撰文作了说明。

《唯物辩证法大纲》虽难以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提法,但从总的来说,它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建国以后,在我国哲学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它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大,它的理论特色和学术成就,为其后的许多哲学教材所吸取。

---

①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269 页。

② 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 第三章 学术思想

### 一 李达学术思想的四个时期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李达是一位思想鲜明的人物。他不似一些历史人物思想的复杂多变,自年轻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始,到晚年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献身止,就一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主要是凭一枝笔进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李达学术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1918—1922年,1922—1935年,1935—1949年,1949—1966年。

李达学术思想的第一个时期,虽短暂仅五、六年时间,却是李达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先后主编了《共产党》月刊,主持了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进行了尖锐的思想斗争,所起到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的成就,奠定了李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的地位。

1918年秋至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解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译著大体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表明

李达在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就比较注重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非常突出的。李达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侧重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哲学上,他接受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它于当时的理论斗争中,但与他以后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相比,显然还只是零散的、初步的。

这一时期,李达担任了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角色。这一双重角色,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即是李达非常重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在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李达是中共方面的主将,他所撰写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是两次论战中的重头文章,对战胜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谬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参与了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左”倾思潮与江亢虎的假社会主义的批判,写了《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评第四国际》和《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运用批判的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得李达这一时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斗争色彩。

李达这一时期的双重角色,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即是既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把握,又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1923年5月,李达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理论、历史、现状等方面论证了两者结合的必然性。该文实际上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努力,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但理论工作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具有庞大体系和丰富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更需要能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中深入地研究,对于一个职业革命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在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李达的兴趣更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正是这种



个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李达人生道路的转变。若干年后,他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茜萍的采访时,表露了他退党时的心迹,茜萍转述道:

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个性并不适于政治活动,便决心跳出政治活动的实际,而改为研究理论的途径。<sup>①</sup>

1922年秋离开中共中央,直至1923年秋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李达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在当时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担任了一个理论家、宣传家的角色。这一角色的转变,在政治上,李达自认是他“生平所曾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但客观地分析,李达从此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他的转变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李达学术思想的第二个时期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基本定型和成熟的阶段,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时期。

第二时期的前阶段是1922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现代社会学》是他这一阶段研究的结晶,是我国系统地论述唯物史观一系列原理的最早著作之一。《现代社会学》和稍后写成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无疑都是李达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但它们又很难说是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都用了相当的篇幅去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种方式与第一时期是相似的,只不过这时对唯物史观的论述较前期系统、全面罢了。在这一阶段,李达并无专文专著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成熟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严整的体系,在第二时期的后段,李达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一阶段他翻译了一大批哲学著作,如《现代世界观》、《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马克

<sup>①</sup> 茜萍《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1935年1月29日《世界日报》。

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篇)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这些译著,对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达力图综合融会这些著作,在自己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是集李达这一时期哲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明李达的哲学体系已走向了成熟。

这一时期,除哲学之外,李达还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以此作为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在这方面,他翻译了《农业问题之理论》、《土地经济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著作,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重视经济学的研究,是李达能够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因。

李达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了具体的文化学术领域,是他的学术思想多方面扩展与深入的时期。

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言中,李达说:“我的研究工作重心,已移到了经济学货币学方面”。<sup>①</sup>我们把1935年《社会学大纲》的脱稿,作为李达思想第三时期开始的标志。这一时期,除了继续经济学研究以外,李达还致力于历史学、法理学等学术领域。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这些领域,写出了《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和《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一系列著作。

这一时期,李达频受战乱、失业之苦,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如以前,甚至有一段时间被社会所淡忘。但他仍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文化学术领域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使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除哲学以外,在历史学、法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他这一时期的著作,在当时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却日益显示出它们应有的光彩。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5页。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含冤去世,是李达思想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李达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为是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两论解说”为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晚年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这一时期,“左”倾思潮不断发展,李达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但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他基本保持了一贯的科学的态度。在林彪的“顶峰论”甚嚣尘上时,他敢于站出来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批评,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巨大理论勇气。

建国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胡适和梁漱溟,再到对“右派”的反击,李达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李达对胡适和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与梁漱溟“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学说的界限,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李达的批判,表现了独断主义和政治化倾向。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他全盘否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和他的学术成就;在反右运动中,他发表了《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和《徐懋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等论著。这些论著不仅在学术上做了不恰当的批判,而且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所有这些,在社会上和学术领域里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李达从 1958 年开始,看出了“左”的路线、政策的危害。之后,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他也都采取了郑重的态度,很少参与了。这种思想上的清醒,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色。

以上我们大致分析了李达思想的四个时期。李达始终强调全

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分期绝对化。我们只能说,某个时期,李达在思想上侧重于某一方面,而不能否定他在其他方面的思想成就。大体说来,李达的第一个时期,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和宣传,第二时期侧重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第三时期是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阶段,第四时期则着重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我们这一节所论述的,还只是李达思想的一个大概,至于李达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下节才能谈到。

## 二 李达的学术思想体系

大致说来,李达的研究,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方面,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哲学是李达思想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分析李达思想的程序,应该从哲学开始。

### (一) 哲学

李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受到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影响。以旧唯物论的基础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道路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有典型意义的。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之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以自己的研究,并综合融会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构建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只有李达一人。

#### 1. 实践的唯物论

李达指出,唯物论的根本论纲,简括起来,就是“存在规定意识,意识不规定存在”。<sup>①</sup> 在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唯物论与观念论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之说明,究竟那一方面是正确的?真理在唯物论方面,这是不待言的”。<sup>②</sup>

李达批判了观念论即唯心论的谬误,并注意到对二元论和折衷论的批判。折衷论和二元论主张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30年代时,李达认为“这种折衷论或二元论的哲学,不属于唯物论,便属于观念论,不能成为一贯的哲学”。<sup>③</sup> 60年代,他改变了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说法,更尖锐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一切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企图,其矛头都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它们“不过是改头换面了的老朽不堪的唯心论”。<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李达认为,在世界本原问题,辩证唯物论当作唯物论看,与从来一切形态的唯物论相一致。然而,辩证唯物论又不可能等同于旧的唯物论。为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唯物论,李达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的概念: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sup>⑤</sup>

实践的唯物论根本之处在于将实践的概念引入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去理解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类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72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75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74页。

④ 《唯物辩证法大纲》第17页。

⑤ 《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



与自然的结合”，是“当作社会的人类看的人类的本质”。<sup>①</sup> 这一全新的认识，使实践的唯物论不同于一切旧的唯物论。

第一，实践的唯物论，不但适用于自然的领域，并且适用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从而成为彻底的唯物论。对此，李达做了如下的解释：

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由于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握，就能够理解人类社会所依以树立的物质的基础，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sup>②</sup>

第二，实践的唯物论在承认人的思维有受动性一面的前提下，承认人及其思维又有能动性。这是因为，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sup>③</sup> 实践不仅“能够指导自然的认识”，<sup>④</sup> 而且“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sup>⑤</sup>

李达强调了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指出它不仅把自己同一切旧的唯物论区别开来；而且由于它正确地解决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现了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因而使得认识论成为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辩证法成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

## 2. 矛盾的辩证法

正如在论述唯物论时强调“实践”一样，李达在阐发辩证法时，突出了“矛盾”的地位，把对立统一规律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构建了矛盾的辩证法。

首先，李达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多

---

① ④《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57—58页。

③ ⑤《李达文集》第2卷，第61页。

方面多层次地分析矛盾问题,构造了关于矛盾学说大体结构。其要旨分述如下:

(1)承认和否定矛盾的分歧,是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分歧

李达论述辩证法的诸法则,先从两种发展观讲起。《社会学大纲》从是否承认运动、变化、联系的角度比较了两种发展观。《唯物辩证法大纲》则进一步系统化,归纳了两种发展观三个原则性的分歧,即联系观点和孤立观点的分歧,发展观点和静止观点的分歧,承认矛盾和否定矛盾的分歧,第三个分歧是根本的,其他两个分歧由它所决定。

(2)事物内在的矛盾性,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李达批判了唯心论者把一切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归着于超自然力的绝对精神,和机械论者在运动的事物之外探求运动原因的做法,指出一切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都是内的矛盾”,<sup>①</sup>并论证了内的矛盾(内因)和外的矛盾(外因)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研究客体的自己运动时,当然不否认外的条件的作用。但外的矛盾与内的矛盾之间,有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外的矛盾的作用,通过特定事物的内部矛盾,并由它而受曲折。<sup>②</sup>

也就是说,外因是运动的条件,它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他强调说:

只有暴露客观实在性的内的矛盾——自己运动的源泉,才能理解自然及社会诸现象的发展的本质。<sup>③</sup>

(3)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学大纲》提出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各有其内在的矛盾”,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5页。

②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7页。

“都是包含着对立的部分、方面、倾向等的复杂的全体”。<sup>①</sup>《唯物辩证法大纲》依照《矛盾论》关于矛盾普遍性两方面含义的观点进行论述,比早期的见解要全面得多,充分得多。

#### (4)关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

李达着重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和关联。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永久的、绝对的。斗争存在于统一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他说:

唯物辩证法要在相对的东西中认识绝对的东西,即是要在对立物的互相渗透之中,认识对立物的斗争,才能认识现象由一种形态到他种形态的转变。<sup>②</sup>

#### (5)矛盾可以分为拮抗的矛盾和非拮抗的矛盾

拮抗即对抗或敌对,是矛盾到达直接冲突的状态,是矛盾激化的阶段。李达认为,“一切拮抗(或敌对)都是矛盾发展的阶段,而一切矛盾,不必都发展到拮抗的阶段”。<sup>③</sup>由是,矛盾可以分为拮抗的矛盾和非拮抗的矛盾。两种矛盾的解决方法并不一样,拮抗性矛盾“必须通过总的解决阶段,”“由飞跃而解决”。<sup>④</sup>非拮抗性矛盾“只通过部分解决的阶段”,可以“不采取飞跃的发展的变化”。<sup>⑤</sup>李达特别指出,未来新社会仍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会发展为拮抗的矛盾,“正因为有这种矛盾,未来的新社会才不断的向上发展”。<sup>⑥</sup>

(6)关于研究矛盾规律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具体的矛盾”和“本质的矛盾”的概念

李达认为,研究矛盾规律,“要求研究自然,社会和思惟的过程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5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9页。

③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0页。

⑤ ⑥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1页。

中各种具体的矛盾”，<sup>①</sup> 应从具体的矛盾中去探求解决矛盾的特殊方法。在运用矛盾规律去认识任何对象时，应在“抓住了这个本质的矛盾之后，就开始探寻这个本质的矛盾自始至终的发展的全过程、对象发展的全生涯”。<sup>②</sup> 对“具体的矛盾”和“本质的矛盾”，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并没有进行太多的论述，但在当时对于人们理解矛盾规律是有启发的。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关于矛盾学说的论述，虽没有达到《矛盾论》那样完整和准确的程度，但它基本上建构了一个关于矛盾学说的框架，这在《矛盾论》之前的中国哲学著作中是非常突出的。他晚年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基本依照《矛盾论》的框架阐述矛盾学说，要系统得多，完整得多，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有意义的，但与他早期的著作相比，毕竟少了一点独创的精神。

其次，李达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向人们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严谨体系。李达说：

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sup>③</sup>

其他一切辩证法的法则，都是这个根本法则的显现形态。<sup>④</sup>

以上论述，是李达对唯物辩证法诸法则相互关系最基本的观点。李达从这些论述出发，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对辩证法的其他规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1页。

②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3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2页。

律和范畴作了解释,又在阐述其他规律和范畴时,将对立统一规律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他认为,质量是质与量的对立的统一,“所以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内的质量的对立物的互相渗透,发生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而事物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别种形态”。<sup>①</sup>显然,李达把质量互变法则看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显现形态。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李达把它看成是“对立统一法则的更进一层的具体的显现形态”。<sup>②</sup>否定之否定过程可以分解为“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设定”、“事物的矛盾的发展”和“矛盾之相对的解决”<sup>③</sup>三个阶段。至于唯物辩证法其他成对的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之类,也都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化的形态”,<sup>④</sup>它们之间同样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

可以看出,李达在阐发唯物辩证法时,既没有把诸法则并列起来,也没有把诸法则与诸范畴割裂开来,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去研究辩证法,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严谨体系。

### 3. 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

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前提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论的解决;辩证法的认识论则要求在认识论上作辩证法的考察。李达是信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下面的话体现了他这一思想:

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惟的认识的发展过程。<sup>⑤</sup>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44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152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59—160页。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⑤ 《李达文集》第2卷,第209页。



这种认识论显然是唯物论的认识论。他接着又说：

这认识的发展过程，具有其本身所固有的特殊发展法则。唯物辩证法，必须阐明这认识本身所固有的特殊发展法则，才能正确的理解反映历史的东西的论理的东西之历史的发展及其内的关联。<sup>①</sup>

也就是说，必须将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及其发展。李达还从辩证法、论理学(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角度，更深刻地指出：“认识论即是辩证法”。<sup>②</sup>

与论述唯物论类似，李达把实践的范畴引入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基础、认识过程的诸契机以及认识结果的检验，都离不开实践。他说：“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的实践的基础上考察认识过程，去理解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sup>③</sup>因此，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也是“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上实现的”。<sup>④</sup>当作认识源泉与出发点看的认识，是“由社会的人类之具体的实践所决定”，<sup>⑤</sup>因而，“社会历史的实践，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最深的源泉，决定的基础”。<sup>⑥</sup>不仅如此，而且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概念的发展，判断的实现，推理的进行，都是以实践为基础和前提的。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李达提出，“由推理过程中所得的结论的真理性，也只有由实践证明，并推移于实践”。<sup>⑦</sup>即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达强调实践在认识全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在认识论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方向。

李达把认识运动的过程，看成是辩证法的过程。认为感性认

---

① ② 《李达集集》第2卷，第209页。

③ ④ 《李达集集》第2卷，第211页。

⑤ 《李达集集》第2卷，第227页。

⑥ 《李达文集》第2卷，第236页。

⑦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0页。

识与理性认识是互相渗透的，“随着对于外物的感觉的发展，人类对于外物的理解就更趋于深刻，在另一方面，对于外物有了理解，就能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外物”，<sup>①</sup> 这里李达强调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矛盾双方的统一。同样，李达也充分认识到了矛盾双方的斗争，认为“认识过程的运动，是自己运动，是内的矛盾与对立物的斗争”。<sup>②</sup> 正是由于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才能推动认识由低级的形态转变为高级的形态。

李达以下面的话概括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见解：

所以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采取如下的过程，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惟→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由直接的具体到媒介的具体——这是出发点与到着点之间的辩证法的统一。媒介的具体，是在思惟上正确的反映出来的直接的具体。所以这个统一，是思惟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个统一，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换句话说，媒介的具体与直接的具体之结合点，就是实践。可以说，认识的运动是圆运动。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过程中，不断的暴露出客观世界的新矛盾、新关联、新属性和新侧面。这些新的矛盾、关联、属性和侧面，不断的闯进于人类的意识中，形成客观与主观的新矛盾，促进认识的新运动，使认识进到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更深刻的更完全的更具体的把握客观世界，因而社会的实践更进一步的积极的能动的变革客观世界。所以认识的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34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09页。

的发展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去的发展过程。<sup>①</sup>

李达的认识论,既坚持了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从理论上批驳了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在现实的斗争中,李达也是中国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中流砥柱,比如对1958年“大跃进”的反思和“文革”初期对“顶峰论”的反驳。

#### 4. 唯物史观

我们在前一节谈到,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在其思想的第一时期便已开始。《马克思还原》一文,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归纳为七条,其中前两条就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sup>②</sup>

李达在第一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还不是全面、系统的,其理论的着眼点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唯物史观的研究只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依据而进行的,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在第二时期的前段,李达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学》论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唯物史观的学说体系。然而,这一阶段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缺乏全面的把握。唯物史观是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没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便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同时也妨碍了唯物史观的应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6—267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用。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社会学大纲》的问世,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问题,代表了李达唯物史观研究的最高水平。

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李达指出:“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sup>①</sup>也就是说,倘若不借助既唯物又辩证的方法,要想在社会历史观中贯彻唯物论,创立历史唯物论是不可能的;同时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形成辩证唯物论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sup>②</sup>

辩证唯物论应用扩张于社会历史领域,首先表现于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论纲推及历史领域,而得出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论纲,即“社会的存在规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不规定社会存在”。<sup>③</sup>

立于历史唯物论根本论纲的基础之上,李达提出,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之统一”。<sup>④</sup>它不同于机械论者把历史唯物论当成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法则的一般学说的见解,而是在一般的大纲上,反映统一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反映出特殊的异质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转变的根本法则的理论。它也不同于形而上学论者把历史唯物论看成是一种抽象的社会认识的逻辑的观点,而是具体地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李达还提出,历史唯物论又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之统

①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72页。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298页。

”，<sup>⑤</sup>就是说，“社会的理论由社会的实践而获得；社会的实践由社会的理论而贯彻”。<sup>⑥</sup>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两对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李达的哲学著作，充分阐发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原理。

李达在分析社会构成时说：

吾人假定社会为一建筑物。研究建筑物之构造时，可分建筑物为基础及上层建筑两部，先研究其基础之构成方法，次研究其立于此基础上之上层建筑，最后研究其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惟建筑物之基础为地面，其上层建筑为木材砖瓦等项，地内之地力苟有变动，地壳即不免有塌陷之虞，则建筑物之基础势必改造，因而其上层建筑亦必改造。研究社会之构造亦犹是也。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sup>⑦</sup>

上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形象生动而又准确深刻，尤其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几乎贯穿于李达关于唯物史观所有问题的论述中。如“社会组织随生产力变动”，<sup>⑧</sup>“社会发达为生产力之发达”，<sup>⑨</sup>“社会之所以变革，由于社会组织阻碍生产力之

---

<sup>⑤</sup> 《李达文集》第2卷，304页。

<sup>⑥</sup> 《李达文集》第2卷，305页。

<sup>⑦</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4页。

<sup>⑧</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277页。

<sup>⑨</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258页。



发达”，<sup>①</sup>“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sup>②</sup>等等。

那么，决定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李达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发挥了马克思的见解。马克思说：

劳动的生产力，取决于多种事情，其中，有劳动者熟练的平均程度，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范围及作用能力，和各种自然条件。<sup>③</sup>

李达在分析马克思所列举的五种对生产力发展起作用的因素时，并不排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多角度全面地分析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它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比斯大林所谓的“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是新的生产关系”<sup>④</sup>的论断要科学得多。

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的历史观的贯彻。在3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往往更多地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研究不够，李大钊、陈独秀也不例外。这固然与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理论上的需要。但从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它最终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李达独具眼光，充分论证了生产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简单地下个结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其唯物论部分、认识论部分，重视实践的观点，在辩证法部分，重视对立统一规律，而在历史唯物论部分，则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的作用。实践的观点、矛盾的观点、生产力的观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69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44页。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590页。

④ 《李达文集》第4卷，第588页。

点,构成了李达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的战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另一就是并不直接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宣传。第一条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第二条战线则以李达为代表。李达的哲学思想,裹挟着中国现代革命风云而形成,对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革命领袖的思想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人文社会思想

李达的人文社会思想,以社会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为最要,民族观、教育观次之,道德观更次之。除政治观将在下节专门论述外,本节分别讨论李达的上述思想。

李达谈道德,从道德的起源说起。他批评了道德生物起源论把道德说成是动物本能直接继续的观点,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认为“道德之根源在人类生活”,<sup>①</sup>人若不营社会的共同生活,便不能存在于自然界,而社会生活的存续,必然要求道德规范的形成。李达说:

道德即人类之社会的本能,社会之所以存在,实由此社会的本能所维持。<sup>②</sup>

关于社会的本能,李达有一番解释:

所谓社会的本能,即是为社会献身的牺牲心,拥护社会的勇敢心,遵从全体意志的服从心,以及感知毁誉褒贬的名誉心。<sup>③</sup>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8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08—509页。

这可以说是李达对道德本质特征的概括,是通用的道德准则。但它在各个社会的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社会变化,道德也随着变化”。<sup>①</sup>

李达认为,“一切道德原则都不能离开人类的本性去考察”。<sup>②</sup>所谓人的本性,“乃是人类之内在的、永久的自求保持并改进其物质生存形态的倾向”。<sup>③</sup>人们维持并改进其物质形态的实践客观要求内化为人的道德良心,而道德良心又成为人们维持并改进物质生存形态的精神力量、内心倾向。因此,不同的社会形态,道德规范虽然不同,但它维护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功用却是一致的。

李达的民族观,以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第一要务。他早期思想的演变,由“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是始终不变的东西。由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必然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但李达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反映在对民族解放运动途径的探索上,他强调必须实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盟;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之后对各民族的态度上,他主张承认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李达自早年创办上海平民女学、主持湖南自修大学起,从事教育事业达40年之久,对于教育,他有特别的看法。

李达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体现在教育思想上,就是主张实行平民教育。他创办的平民女学,被人誉为“平民求学的地方”、“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sup>④</sup>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明确宣传“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sup>⑤</sup>1946年李达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乡里儿童不论出身贫富均可来上学。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509页。

②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734页。

④ 沈泽民《这不是慈善事业》,《妇女声》第6期,1922年3月5日。

⑤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李达主张实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强调：

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

这里已孕育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建国后他任湖南大学校长，提出了“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办学方针，他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已达到了成熟。

李达主张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在早期的教育实践中，李达把学校直接作为走向新社会的第一步，因此，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和实用性。以后，经过建国以来的教育实践，尤其是经过1958年“教育革命”的经验总结，李达在大学教育中特别指出综合性大学与专科学校等不同，重点不在于培养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性人才，而是理论与基础科学的高级人才。因此，李达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结合”的思想，即以教学为中心，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不能冲击教学秩序；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特别强调教学的内容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sup>①</sup>

李达主张教学相长，以教师为主导。李达早年的教育思想中，十分强调反对机械的注入式的教育，主张启发式教育，主张师生平等，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一思想在建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同时，他也反对“教育革命”中发动学生与教授“打擂台”的极端做法，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师资水平代表了学校的水平。

李达的史学思想，基于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史学理论，实际上也是他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因而，从《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史学理论的大端。

<sup>①</sup> 李达《在武汉大学第二届党代会开幕词》，1959年11月。

《现代社会学》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李达说:

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而改造此生产关系之人工的发动力则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结果,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改造,如此产生之新社会遂超出旧社会之上,是谓社会之进化。<sup>①</sup>

这段论述,可谓体会到了唯物史观的精髓。其一,它从物质与精神的两个方面,既分析了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又分析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阶级斗争称之为“人工的发动力”,指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两种历史发展的动力中,李达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分析,从根本上划清了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历史观的界限。其二,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描述一定社会形态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把社会作为客观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去理解,阐明了人类历史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规律。

在 30 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大多数人还缺乏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 1 卷,第 344 页。



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整体性把握。李达《社会学大纲》的问世,正好弥补了这一理论缺陷。《大纲》指出,历史唯物论是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清算当时我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实验主义,机械论等的理论根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30、4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起了启导的作用。

李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者,也是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历史的实践者。

其一,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进行了分期。在《经济学大纲》中,他从经济构造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在20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周秦至满清末,中国为封建制社会,《经济学大纲》更明确了这一看法:“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sup>①</sup>他还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个阶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sup>②</sup>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等著作中,他又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

其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李达从生产关系入手,“把一切障碍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不能孕育新生产力的原因都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一研究的路径是正确的。

其三,在历史研究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李达认为它“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sup>③</sup>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尚且不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③ 《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论,它的意义在于批驳了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又如对李季、陶希圣等人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李达同样进行了反驳,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sup>①</sup> 上述二例,对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普遍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李达专门的史学著作不多,而在他的各类著述中几乎都有历史方面的论述,这既说明他注重从多种角度研究历史问题,也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价值的重视。

李达的史学研究,既忠实于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形而上学历史观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又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辨。因而其史学研究既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又具较高的学术价值。

李达论法,同样基于哲学的基础之上。按他对社会构造的分析,法律被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上层建筑在社会构造中的作用,他说:

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而造成……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sup>②</sup>

把这一原理推及法律的领域,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其一,法律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某一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怎样,这一社会的法律、法律观点和法律制度也就怎样;其二,法律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法律一旦制定,便成为保护统治阶级经济结构的工具。

以上可以说是李达法律观的理论基础,他关于法律的种种理解,都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推论得出的。

关于法律与国家的关联,李达指出:

---

① 《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

② 《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49页。

法律制度与国家形态,是一体的两面。国家是法律的形体,法律是国家的灵魂。法律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是发挥国家机能的手段,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有国家必有法律,有法律必有国家。历史上没有无国家的法律,也没有无法律的国家。世界上有什么样国家的形态,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sup>①</sup>

由此,李达展开了其法律的本质论。他说:

法律的本质,即是阶级关系,即是阶级性。<sup>②</sup>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规定,是近代以来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的本质既然是阶级性的,因而,对这些内容的规定,也必然具有阶级性。李达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法律所规定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虚伪性,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法律才是彻底民主的、真正自由和平等的。

李达重视法制建设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前后,李达连续撰写了《谈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7篇(部)论著,对宪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李达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以往奴隶主国家和封建国家所没有的,是近代资产阶级所首创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也必须用新的宪法来保护政权、巩固政权;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能真正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保证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李达阐述了新宪法的性质和内容,同时也揭示了宪法及其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的意义。

李达重视对社会的分析和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的社会学说建立在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又与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史学思

---

① 李达《法理学大纲》第3篇第1章。

② 李达《法理学大纲》第3篇第2章。

想相通相关。

对社会的基本分析,是李达社会学说的基础,它主要包括对社会的本质、起源和发达等问题的看法。

李达批判了三种旧的社会说,即契约的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心理的社会说,指出它们分别为“初期资本阶级树立民治主义之政治的论据”,“资本阶级树立自由主义之经济的论据”,“资本阶级树立温情主义之社会政策的论据”。<sup>①</sup> 以上三说,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以唯心史观为其哲学基础,不足以阐明社会的本质。因此,李达提出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

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而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的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sup>②</sup>

这是李达对于社会的最基本的看法。基于这种认识,李达认为,“人类间立于生产关系之结合,谓之社会”。<sup>③</sup> 李达对社会起源和进化的分析,也基于这一认识之上。

人类社会的起源,与人类所以能脱离动物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脱离动物社会,是相同的概念。其中的原因,李达说:“一言以蔽之曰:器具之制造是也”。<sup>④</sup> 他又说:“器械发明以后更足以促进人类之进步者,言语与思想之功用亦复不少”,<sup>⑤</sup> 并不否认言语思想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器具之制造,即生产力的发展。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0页。

②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1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252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255页。

李达所谓社会的发达,即指社会生活复杂、社会范围扩大。他关于社会发达的论述,呼应了他的社会本质说:

社会生活之复杂,由于生产关系之复杂;社会范围之扩大,由于生产及交换范围之扩大。而促成生产关系之复杂与生产及交换范围之扩大者,实由于生产力之发达有以致之,即谓社会之发达为生产之发达可也。

社会说推论到最后,必须研究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解释,李达认为,“一种是广义的解释,就是关系于社会制度全体的问题,叫做社会问题。一种是狭义的解释,就是由产业制度发生出来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就是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产生出来的东西”。<sup>①</sup> 这种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显然受到高崑素之《社会问题总览》的影响。这时李达并未注意到中国社会问题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的差异。认识到这一问题,是其思想第二时期的事情,《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提出: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sup>②</sup>

接着,李达列举了当时中国的五大社会问题:一、产业劳动者问题;二、农民问题;三、手工工人问题;四、商业店伙问题;五、失业者问题。他指出,后述三项都与欧美各国的社会问题不同,既有封建社会的色彩,又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

在第一时期,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sup>③</sup>并未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第二时期,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问题“显出了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因而“也只有根据这种特

①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40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489页。



殊性去理解它”。<sup>①</sup>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达的社会观,与其经济观相通相关。他说:“要晓得现代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sup>②</sup> 李达的社会学说,最后推论到中国革命问题,与此相似,他的经济学研究,也重视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sup>③</sup> 他又说:

但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sup>④</sup>

因此,李达强调进行广义的经济学研究,尤其强调对中国现代经济的研究。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著作中,他分析了中国现代经济结构的演变,得出了关于当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结论:手工业的破产和农业经济的破产趋势,近代工业已基本为帝国主义所支配,中国金融已基本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在资本结构上,民族资本、工业资本薄弱和外国资本、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李达关于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

基于中国的经济现状,李达认为,社会革命除了政治革命之外,还必须有经济的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新的社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492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88页。

③ 《李达文集》第3卷,第15页。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会。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李达驳斥了改良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阐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就经济方面而言,李达说;

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sup>①</sup>

这不仅是李达,而且也是当时所有共产党人的经济理想。这在当时,是共产党人发动民众革命的战斗理论,在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尚不了解,还停留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般描述上。

### (三)政治思想

李达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面临的是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所以政治思想成为他早期思想的主干。脱党以后,虽然渐渐远离了政治实践活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问题的关怀,而是从哲学、经济学等角度继续阐发他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使其政治思想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考察李达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重点是在基础理论和统治型式与工具上面,同时也论及社会革命的理论。

首先从李达政治思想的基础理论说起。

李达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归纳为七条: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61—62页。

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借政治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sup>①</sup>

上述七条是李达所说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同时又涵盖了李达政治思想的基础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唯物史观的内容只包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低于这个层次的理论,都是由此派生的。李达的七条,前两条

○ 《李达文集》第1卷,第30—31页。

属于唯物史观的内容,其他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派生出来的。这些派生出来的理论,构成了唯物史观与李达政治思想之间的理论中介,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他们都非常强调阶级斗争的意义,比如李汉俊在《怎么进化》一文中就指出,阶级斗争是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sup>①</sup>

我们上面谈到,阶级斗争学说是由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派生出来的,李达是中国较早能准确理解这一论点的少数理论家之一。在其思想的第一个时期,他就注意到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阐述阶级斗争学说。李达说:

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资本阶级收集掠夺劳动者的血汗的剩余生产,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劳动者仅依工钱谋生。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了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sup>②</sup>

李达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揭示阶级斗争的根源,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他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基于生产关系矛盾基础之上的,由阶级的觉悟、阶级的心理而引发的阶级的运动,因而能对阶级斗争的作用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现代社会学》中,他指出社会发展之原动力为生产力,而阶级斗争为变革生产关系的“人工的发动动力”。这种判断与唯物史观是相符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

① 李汉俊《怎么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36页。

不同于他前期的思想。他说：

社会发展的自己运动的源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因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表现为敌对的矛盾的阶段上，社会是有阶级的。所以，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为敌对的矛盾时，社会就分裂为阶级，而阶级的矛盾或对立，就成为社会自己发展的特别的内的矛盾，因而分裂为阶级以后的社会，就成为阶级矛盾的历史了。从分裂为阶级之时开始，社会就运动于阶级的矛盾之中；特定的生产方法，由于内的矛盾而转变为进步的新的生产方法，而这种转变，是通过阶级的拮抗而实现的。所以阶级拮抗，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sup>①</sup>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探求阶级斗争的根源，无疑比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探求阶级斗争的根源更为深刻。然而，如果由此认定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的矛盾之中，显然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简单化了，而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违背，也不同于李达以前的观点。

李达的国家观，同样基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他在《社会学大纲》中，提出科学的国家观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国家是从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东西”。<sup>②</sup>

其二，国家是阶级社会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构造”。<sup>③</sup>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463—464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492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493—494页。



其三,国家是阶级的统治机关,“决不是超阶级的东西”。<sup>①</sup>

其四,国家是公权力的组织,“公权力的本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sup>②</sup>

李达对国家的理解,可谓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它与资产阶级国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

第一,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都是超阶级的,“即是把国家看作是超出阶级之上的无偏无党的全民的国家”。<sup>③</sup>

第二,资产阶级国家观基本上不能辨别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把国家看做社会,并与社会同是万古长存的东西”。<sup>④</sup>

第三,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都是以观念论为基础,“在主观的假想上说明国家的构成,并没有客观的科学的根据”。<sup>⑤</sup>

在国家观上,李达还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抓住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sup>⑥</sup>以个人主义为起点,进而否定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甚至否定社会。这是一切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共同之处。这种观念,虽是对封建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离心,但由于它认为“一切国家都是祸害”,因此,无政府主义理论,“若不是谬误,便是含有谬误根据发生出来的缺点的思想”。<sup>⑦</sup>

李达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无疑是唯物史观,但他政治思想最直接的理论起点,则是立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

在统治型式方面,李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497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499页。

③ ④ ⑤ 《李达文集》第2卷,第504页。

⑥ 《李达文集》第1卷,第90页。

⑦ 《李达文集》第1卷,第89页。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不集中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理论家自不必说,无政府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是如此。李达正是在对这些派别思想的批判中,鲜明地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李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引证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名言:

由资本主义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动专政。<sup>①</sup>

基于这一论点,李达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议会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说:

多数主义何以反对现代的民主主义,反对议会政策,而必欲实行劳动专政呢?这是因为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思想绝对不相容的。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前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sup>②</sup>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成立的东西”,<sup>③</sup>因而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罢了。

李达认为,现代国家除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他批判了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

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间,没有第三者的存在。……江君的新民主主义,窃取苏维埃制度的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101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31页。

形式,却加上了地主资本家两个要素在内,既不是第三阶级(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真是“不三不四”的民主主义。<sup>①</sup>

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颇占市场,李达的批判,明确说明了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时,李达指出,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敏锐地注意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统一的观点。以后他又多次阐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论点:

所谓劳工专政,其实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sup>②</sup>

普罗列达里亚专政,实际上就是普罗列达里亚的民主主义。这是社会上勤劳的多数者的民主主义,是对于少数者的专政,是对于旧榨取者的专政,这是普罗列达里亚民主主义与布尔乔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过渡期国家的主要特征。<sup>③</sup>

这些论述,既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对立,又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专政与民主的统一,它一方面“假借武力实行强制”,<sup>④</sup>另一方面又高举民主的旗帜,而且所实行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在30年代,李达能全面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是非常难得的,直到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李达否定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应该是苏维埃。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25—226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25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47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87页。

立,“只是一种拟制,事实上却是相反”,<sup>①</sup>议会已成为一个饶舌的场所,权力的重心在行政权上,与此相反,苏维埃是立法与行政两种机关的统一,是“真正代表劳动者社会利益而与社会相符合的权力机构”。<sup>②</sup>他又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是超乎社会之上而与社会脱离的少数人把持的压迫力量,所以必然形成与民众脱离甚至与民众对立的官僚体系;而苏维埃的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可以任意罢免,他们代表大众真实的根本的利益,对于自己的行动完全向自己的选举者负责,“这样的普罗列达里亚民主主义的组织,彻底破坏了官僚主义的基础”。<sup>③</sup>对苏维埃的充分肯定,反映了李达的政治理想,即建立真正自由、平等,能代表大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权。

在统治工具方面,李达涉及较多的是政党。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对创建共产党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思想战线上,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扫除了思想障碍。李达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

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sup>④</sup>

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对共产党在革命后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普罗列达里亚专政之重要的根本的旗帜,就是共产党的指导。如果没有党的指导,普罗列达里亚就不能解决自己负担的任何任务,并且普罗列达里亚专政本身便不能保全,不能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532页。

②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558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134页。

巩固。<sup>①</sup>

同时他又强调,党的作用是有限度和前提的:

普罗列达里亚专政决不是党的专政,党的指导是完全基于普罗列达里亚与其前卫之间的相互信赖,是通过普罗列达里亚专政下的大众组织的全体制的媒介而实现的。<sup>②</sup>

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的专政,应该说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最后,我们讨论李达的社会革命理论。

民主革命时期,社会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李达以理论家兼革命家的角色,关注中国革命,尤其重视对革命理论的探讨。

李达重视系统完整地研究问题,反映在革命理论的思考上,他提出要进行社会整体的革命。他说:

社会革命者何,即社会全体超升一进化阶级之谓,换言之,即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其上层建筑之全部者是也。<sup>③</sup>

因此,他把社会革命分为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两个方面。按他对“变革其上层建筑之全部”的说法,社会革命又不仅仅包括以上两个方面,还有意识形态的革命,道德观念的革命、法制革命等等,他自己也说:

新阶级战胜旧阶级之后,……必根据其新思想,确立新政治法制以改造经济组织;同时另创新意识形态以变更旧社会上层建筑之全部。<sup>④</sup>

在各类革命之中,李达又特别强调政治革命的意义。他所谓的政治革命是指“能诱致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sup>⑤</sup>而社会主义政治革

---

①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546页。

③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268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1页。



命“就是劳动阶级夺取政权的意思”。<sup>①</sup> 因此,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必经的途径,经济革命有待政治革命才能实现。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李达指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步骤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他以俄国为例指出,如果只是完成了第一、第二个时期的任务,那么还只是“达到了社会主义的门墙,还没有走进社会主义的门里去”。<sup>②</sup> 可见,李达非常强调发展产业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

李达研究社会革命,同样重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首先,他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做了思考。在社会主义讨论中,他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武人政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同时他又指出,中国革命需要“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sup>③</sup> 大量的游民是失业的劳动者,经过训练也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中坚,<sup>④</sup> 至于知识分子,可以区分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所有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三大类,他们是为各自所属的阶级服务的。<sup>⑤</sup>

其次,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思考。《社会革命底商榷》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及以后的著作,都对道路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大致可以分为议会主义、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他对议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于工会运动,认为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3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3—234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60页。

⑤ 《李达文集》第2卷,第485页。

在产业不甚发达的中国是不易进行的，“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专恃劳动运动恐怕不甚容易”；他认为“直接行动”是有效方式，但是以总同盟罢工为方式的“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也不适于中国，中国应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即工人农民兵士等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增加作战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sup>①</sup> 这种思考，并没有提出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但李达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要采用“劳农主义”，强调了联合农民，这是很有意义的。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72—73页。

## 第四章 学术渊源

###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李达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之中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的形式和特点,这一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因此,研究李达的学术思想渊源,就与其他的学者很不一样,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与学派源流,从而也就具有相当的难度。

当然,作为一种学术及其思想,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李达学术思想的渊源。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又过于宽泛。李达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所建树,这一切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有关、与新思潮的刺激有关、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有关。以下我们主要从中国传统哲学对李达的影响和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更进一步把握李达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李大钊。李大钊早年思想具有明显的阳明心学的痕迹,其核心概念是“悔改”和“良知”。如1915年,他曾

说过：“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其时。”<sup>①</sup>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求实经世的奋斗精神。在宇宙观上受周易思想影响，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观念。如他认为，“大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sup>②</sup>显然，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1919年以后，李大钊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同时也提出了“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主张，并提出要由此来救正马克思学说之不足。<sup>③</sup>这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尚不全面，同时也反映出他重视人的精神力量的传统思维的痕迹。

毛泽东早年思想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1917年前后他所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体育之研究》（发表于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和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可以认为，毛泽东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毛泽东主张探求“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之心、为天下之事，由心及身，重视感观经验及实践，强调“动”与奋斗，把古代的辩证变易说与近代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这是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条件之一。<sup>④</sup>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钻研，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毛泽东思想创造者的一个因素，这方面论者颇多，不赘述。

可是，李达与李大钊、毛泽东等有所不同。在他成为马克思主

---

①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55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8页。

④ 见丁晓强《毛泽东早年思想与阳明心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

义者以前,是主张“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时期他关于传统哲学或者在社会改造方面涉及到传统哲学的文字和论述。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大量翻译、介绍日本与欧洲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最高的,在其文字中很少引用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术语。因此,研究李达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就有了一定的难度。

但是,李达具有较深的古文基础,则是无可疑义的。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的偏僻村庄,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然而,自他懂事以后,所受的启蒙教育,仍不外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他幼年的塾师胡燮卿与唐花圃对他博闻强记的能力颇为欣赏,并且他又以善于对对子而获得好评。在永州中学,苦学古文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治学是有意义的。他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就是用文言写成的,以后,他关于中国史学的论文,还是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sup>①</sup>

李达出生于湖南。湖南学者历来“尤多经济之学”<sup>②</sup>,即重视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道。南宋时,被后人称为“开湖湘学统”的胡宏也认为,“窃惟古圣人之言,无不入时事者。”<sup>③</sup>至清初王夫之亦十分重视经邦治国之道,著有《读通鉴论》和《宋论》,以后为湘军首领曾国藩等所推崇,魏源、谭嗣同等也赞赏有加,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显然,穷究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点。李达早年爱国热情的激发,符合湖湘士人的气质。所以,在永州中学时,他就积极参加了一些爱国活动;1918年,他还作为中华留日救国团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和发动了回国请愿运动。

---

<sup>①</sup> 例如,1941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就是如此,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684—706页。

<sup>②</sup> 黄宗羲《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

<sup>③</sup> 《胡宏集》第12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李达以后的哲学著述,绝少抽象的思辩,总是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体现了湖湘学派的学风。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李达的大量译、著,对中国哲学很少评论,但是,李达的哲学创造,仍具有极鲜明的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传统哲学整体上的最大特点是从人的主体立场出发,将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整合考虑。一方面,思维与认识以人的主体实践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对世界变化与运动的理解是被充分置于谋求天道与人道之相互和谐的基础上的。所以,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重知行、重实践;在方法论方面注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注重主体实践的哲学。“实践”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是由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提出的,在此之前,很早就有“践形”或“践履”的概念,内涵亦相近。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实践的主体性。实践精神与主体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色。这种实践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以主体的亲身践履为基础的知行观,强调认识的实践性、实用性和实效性。如孔子如此强调道德践履的重要性: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sup>①</sup>

主体“仁”的践履是礼乐的唯一标准。孟子谈“践形”,他说: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sup>②</sup>

这里“形”指身体,又衍作“行”,指行为。孔孟这些注重人的主体道德践履的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几乎所有的哲学家。这种道德践履具有极强的主体性,正如孔子所言,离开人这一主体,礼乐就毫无意义。由此他强调认识与实践应从主体自身开始,而后“推己及人”、“修己治人”。孟子对此作了发挥,提出了著名的“良知”、“良

① 《论语·八佾》

② 《孟子·尽心上》。

能”说,为这种主体性哲学确立了心性论的基础。以后至《大学》,就出现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较完整的主体实践哲学的认识路线。明代王阳明更主张简易工夫,强调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创“知行合一”之说,将南宋以来事功学的实践精神与心学的主体精神充分地加以融合。明清以后哲学家大多受其影响。如王夫之提出了“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强调不能“离行以为知”,“知必以行为功”,<sup>①</sup>又使心学的主体精神,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

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构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主体实践的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认识论,都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讲起,马克思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列宁对此曾作过评论。他说:

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sup>②</sup>

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一样,他们在《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主要在谈到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时,才将实践作为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李达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为主线,构筑了认识论的体系,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过程中的诸契机以及认识结果的检验,是认识的前提与目的,是意识的能动性 with 认识的能动性的反映。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的特色,从而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做了学理上的准备。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直截了当地在副标题上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知与行的关系来表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sup>①</sup> 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中关于变易与和谐的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世界事物间差异与同一、变化与发展乃至整个宇宙对立统一运动及其过程的独特看法。这些思想最早见于《易经》中的阴阳说。“阴阳”是来自生活中关于事物正负面对立性质的认识的概念,反映了先民们关于世界事物差异与同一关系的最初的抽象理解。《易经》通过阴阳两种符号从八卦至六十四卦的不同排列组合,来说明世界永恒的对立统一运动,表明了传统哲学很早就认识到差异与对立是世界变易的重要条件。然而传统哲学强调和谐,阴阳对立面之间存在和谐的相关性,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sup>①</sup>老子特别重视事物矛盾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他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sup>②</sup>主张于差异中见同一,事物对立面因同一性而相互依存。老子还提出了事物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指出了“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孔子则从人道的角度,提出“中庸”理论,发挥了变易与和谐的观念。“中庸”理论进一步注意到了事物发展及对立依存而转化的“度”,也就是所谓的“节”。《中庸·天命》中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节”也就是要求行为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注意其关节或度,“过犹不及”都是偏面、走极端。这一思想,以后逐步形成关于宇宙人生、身心物我一体论的学说。孟子提出了“执中无权犹执一”的观点,这是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对孔子的“执中”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中叶王阳明对这一思想做了具体发挥,《传习录》上记述有:

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

<sup>①</sup> 《易经·泰九三爻辞》

<sup>②</sup> 《老子》第58章。

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说得一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故“中庸”、“中和”、“执中”都是“时中”的意思,要求注意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上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十分注重把握变易与和谐的关系,并由此构筑了辩证法,其最大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其形成来自于对天人一体的深邃理解,主张在世界的变化过程中寻求宇宙人生、身心物我的整体合谐有序。

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构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影响。因此,他在阐述辩证法时,突出了“矛盾”的地位,构建了矛盾的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法则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列宁曾经指出: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sup>①</sup>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sup>②</sup>

但是,列宁的论述是纲领性的,并未展开。李达根据列宁的提示,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著作,构筑了矛盾学说的框架体系,较全面地论述了两种发展观、内因与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具体的矛盾与本质的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拮抗矛盾与非拮抗矛盾等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整体性思维的发达的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做了重要的学理上的准备。

---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2页。

## 二 日本、欧洲与前苏联学者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甚大。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李大钊、李汉俊、陈溥贤、陈启修等,几乎都曾是留日学生。李达也是留日学生。

李达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于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学习的。在东京学习一年,因患肺病辍学回国。1917年再赴日本,并考入著名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获得官费学习的资格。直至1918年6月,前后约有两年多时间,李达主要学习理科,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这对于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是有意义的。他不仅在哲学研究中大量地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也为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河上肇。河上肇,1879年生,卒于1946年,日本经济学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驱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他有志于解决贫困与社会问题,从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阐述者,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著作有《贫乏故事》、《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陈溥贤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首先在1919年5月5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译自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也深受河上肇及其所编的《社会问题研究》的影响,他所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范本的,他对马恩原著的大量引文都转自该文。河上肇在该文中指出:

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



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sup>①</sup>

这一观点，体现了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李大钊接受了河上肇的观点，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谈到：马氏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别为三部，分别是历史论、经济论与政策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sup>②</sup> 李汉俊更是直接师承于河上肇，他也认为：

马克思学说，可以分作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底方面，又可以分作“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底方面，则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阶级斗争说”是像一条金线一般把上述三大部分的根本缝起来，以成就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组织的部分。<sup>③</sup>

很显然，李大钊、李汉俊受河上肇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与经济学为基础，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意义。

李达也是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在日本，他目睹了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也饱尝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留学生的欺凌侮辱，使他“实业救国”的梦幻破灭。正在此际，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希望，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1918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的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运动失败以后，促使他返日后放弃了理科的学习，专攻马克思主义。无疑，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与刊物，对李达的思想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李达后来也曾

---

① 《周恩来传》第3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50页。

③ 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926年6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经说过，“河上肇是我的老师，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sup>①</sup>

河上肇对李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在《现代社会学》中也认为：

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之成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学说。<sup>②</sup>

但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不依赖于日本学者的介绍，他还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李达通晓四种文字，除了日文外，英文、德文和俄文都有相当水平，这为他多途径、更直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李达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并且他还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三本著作，分别是《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李达并没有选择日本学者的著作，而是更直接地选择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唯物史观解说》为荷兰人郭泰所作，书前有考茨基的序，书末附有《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和译者附言。《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概要地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划时代的意义，还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于人们完整地掌握唯物史观是很有意义的。该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

<sup>①</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辑。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370页。

文本两书对照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作者是考茨基,这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著作。只有《社会问题总览》为日本学者高畠素之所作,内容包括“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和“妇人问题”等。这以后,李达还翻译过几部日本学者的著作,主要也是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如安部矶雄的《产儿制限论》(1922年)、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史》(1924年)等。在1923年,李达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

这里所以要谈到李达的著译工作,这对于了解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是重要的。显而易见,正因为他重视原著的研究,不仅通过日本学者,更重要的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发源地欧洲学者的学习,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在当时的中国是最高的,所以在建党前后,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战线上的主将。

以河上肇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述中,一方面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金线,过高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李大钊根据河上肇的思路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对此感到了困惑。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谈到: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

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sup>①</sup>

困惑的来源就是河上肇将阶级斗争学说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也是把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来认识的。例如毛泽东,他在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sup>②</sup>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处在社会革命的时期,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有其合理性。但是,对社会经济的忽视,仍然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问题。例如瞿秋白,他在回顾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候,也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没有兴趣。”<sup>③</sup>这是一个缺陷。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的推移,这一缺陷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李达曾经主张实业救国,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十分重视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意义。在建党前后,他参加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论战,紧扣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来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并指出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固然受河上肇的影响,突出了阶级斗争的意义,但该书仍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更本原的动力。他在记述阶级斗争问题时曾认为:

---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3—6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



生产力之发达为撼动生产关系之根本条件,同时阶级斗争又为变革社会之唯一动力。<sup>①</sup>

这里,生产力的发达是决定阶级斗争程度的基础,在1928年的修订版中,又特意删去了“阶级斗争又为变革社会之唯一动力”的“唯一”二字。作为哲学家,针对中国革命中的种种困惑,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中国的经济现状,撰写了《中国产业革命之概观》,指出了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源与方向,以后,又写了《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名教授。李达对经济学研究的着力,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的把握,形成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强烈信念,并且,对科学与技术在生产方中的地位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这一思想,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过于重视政治、伦理的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其深刻性日益显现。

1928年至1932年间,李达又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计有12部。这一时期的译著,除日本学者和欧洲学者外,还有大量的前苏联学者的著作,其中有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拉比托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尤其在哲学方面,当时除他自己所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外,还有艾思奇、郑易里译的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译的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是当时最著名的三本哲学教科书。前苏联学者的著作,对李达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予以了特别重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前苏联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产生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突出了列宁哲学。李达及时翻译了该书,并在“译者例言”中指出: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277页。



并认为：

我们的哲学的研究，不能不努力追随于新时代的新实践与新理论的统一的发展，依据马——伊的哲学而不断的被扬弃，不断的被清算。

在前苏联学者的影响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他认为，列宁在哲学上的最伟大的功绩，是他所发挥的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指出了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并具体展开了辩证法的十六条要素，打破了物理学上的危机，扫除了自然科学上的形而上学的谬论，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新的阶段。他表示，只有沿着列宁的方向前进，哲学研究才能有所成就。

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也就突出了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意义。而中国革命，正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李达宣传列宁哲学，介绍唯物辩证法，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提供了学理上工具；李达撰写《社会学大纲》，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对列宁哲学进行了说明与发挥，构筑了辩证法的体系，为毛泽东哲学的创造做了学理上的准备。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条件。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的结晶。与西欧相比，相对而言，俄国国情及其文化传统与中国较为接近。1918年，当时李大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曾提出要创造第三种文明，并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sup>①</sup>这一观点，似乎在此得到了印证。列宁哲学，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介的作用。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60页。

## 第五章 学术交友

### 一 李达与毛泽东

李达实则是个孤独寂寞的人物,除早年从事学运和参与共产党的创建外,他一生很少有太热闹的局面。他不是那种广交天下友的人。与人交际则追求志同道合。如在北平任教时,他就从不与胡适、蒋梦麟等名流来往。他交友不多,交谊历久、往来密切、相知甚深的更少,而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他早年的初交,又多为湖广人。从李达的交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志趣、他的感情生活,以及他学术思想的演进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李达比他大三岁,1890年10月2日生。两人都出身于湖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相比而言,李达的家境更为窘迫。但李达的学术之路却比毛泽东要通坦得多。1910年,当毛泽东冲破重重困难走出韶山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时,李达已是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大前身)二年级的学生。1913—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李达却已两度考入日本留学。早期求学的不同经历,对他们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18年,对李、毛二氏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这年5月,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日方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

暴行,李达作为“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的领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爱国学生领袖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斗争最后失败,这给李达以很大的震动,李达再回东京,放弃了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秋,他开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这是李达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开始。

1918年夏,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8月抵达北京。经杨昌济推荐,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阅读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书报杂志,结识了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新文化运动中的名流学者。新知识、新思想推动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在湖南一师时,他还言必称孔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楷模;而在第一次到北京后,他已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

可以看出,在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李达比毛泽东先行了一步。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李达,在当时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社会地位,均为思想界所瞩目,他对新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920年冬到1921年春,是毛泽东的思想急速转变的一个阶段,李、毛二氏的交往也开始于这段时间,这是李达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时期。

这段时间,毛泽东受李达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阅读《共产党》月刊,另一就是关注理论界的辩论与批判。

1920年8月,李达怀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热望,从东京回到上海。他与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他还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并主编《共产党》月刊。李达向毛泽东寄去了该刊,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同志学习,并把其中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湖南《大公报》发表,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称赞月刊“颇不愧‘旗帜鲜

明’四字”。<sup>①</sup>另一方面,李达还积极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主将。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李达在《共产党》月刊和论战中的文章,主要阐发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能提倡社会主义,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存在的田主阶级、田户阶级、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有阶级就有对抗。

第三,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依据及其消亡的前景。他说:

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sup>②</sup>

以上论述,显然,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曾信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把阶级斗争现象看成是思想的迷误和不幸,主张“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这样“不至张起大的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sup>③</sup>那时,毛泽东主张实行议会政治,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他说:

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② 李达《〈共产党〉第一号短言》(1920年),《李达文集》第1卷,第742页。

③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sup>①</sup>

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了明确、坚定的信念。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萧子升和蔡和森的复信中,申述了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sup>②</sup>

信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毛泽东的这一转变,既是在行动碰壁后的一种觉悟,同时又是受到李达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启迪的结果。

虽神交已久,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毛二氏最早见面还是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上。初次见面给李达很深的印象,他以后回忆说:“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sup>③</sup>

1922年5月,毛请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11月,又函请李达任自修大学学长。湖南自修大学是新的教育实践的产物,学习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民学会的延续。当时学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罗学瓚等24人,由李达任学长,表明毛泽东等对李达马克思列宁主义水

①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页。

③ 宋镜明《李达传记》第6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平的钦佩,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师长事之。李达在长沙,与毛泽东同住清水塘,那时,“毛泽东一想起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常常是深更半夜敲门,把李达叫起来商谈。”<sup>①</sup>从那时起,他们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开始结成了生死之缘。

在自修大学的基础上,他们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发刊词,揭示了他们共同的志趣,在于“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具体而言:

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被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sup>②</sup>

正如刊名所表示的,他们立志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们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行社会改造”,以及为“实行社会改造”进行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显然,他们还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不仅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而且要把这一研究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为如何改造社会贡献出“具体的主张”来。他们已然认识到了,在今后的革命历程上,有三大问题必须做出回应:

第一,如何从哲学层次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分解开来,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历史观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社会发展的路向和动力;其二,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第二,要正确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的斗争中去;其二,在理论形态上,确立民族形式的马克思

---

<sup>①</sup> 宋镜明《李达传记》第62页。

<sup>②</sup> 《发刊词》,《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5日。

主义。

上述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艰深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复杂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一个人两方面都兼顾是难以做到的,有所侧重是必然的选择。1923年以后,李达专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毛泽东则主要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忽视理论的研究。

李达是理论家,毛泽东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因而他们理论研究的风格自然也不相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前苏联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进行了深刻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的逻辑思路则是在实际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构建其理论体系。前者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后者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由于两者所关注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致性,因而,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影响是双向的。李达在理论研究中,要结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同样,毛泽东的理论研究,也汲取了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创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方面是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更主要的,还是以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为中介,这些成果,包括李达等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包括他们翻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

李达思想的第二个时期,是其理论研究的盛期,也是他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个时期。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著作,毛泽东都认真地阅读过,并作了批注。1936年8月,毛泽东在给易礼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谈到他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李达的译著,尤其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过该书的第三版,并作有一万二千多字的批

注,“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sup>①</sup>

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有着更重要的影响。1939年李达在重庆时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说该著“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并欢迎他去延安。建国后还多次提到该著的价值。

《社会学大纲》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铅印,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毛泽东有关本书的批注是1938年2月至3月16日写的。那么,在此之前,准确地说,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毛泽东是否读过此书呢?

郭化若在回忆中说到:

到延安不久,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毛主席向我们讲:“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看看”。<sup>②</sup>

郭化若所指的到延安,可能是指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在1937年1月,也有可能是1937年8月他正式从庆阳调到延安。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到延安不久”不会超出1937年下半年这段时间。

郭化若在《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一文中,也谈到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一事,他把文中的抗战初期界定为1937年至1938年或稍后一段时间,他在文中说:

对李达同志寄来的《社会学大纲》,毛主席很高兴地读了十遍,并去信要李达同志再寄十本来,又叫武汉办事处派人和

<sup>①</sup>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sup>②</sup>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第128页。

他联系,劝他仍留武汉工作。<sup>①</sup>

从这段话,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毛读《社会学大纲》十遍的时间。1937年6月,因国民党当局解聘北平大学进步教授,李达与白鹏飞去南京交涉,后到庐山,因父病危,回老家零陵探望。7月,“七七”事变爆发,南北交通断绝,李达从零陵到上海暂住。后得到广西大学聘书,但未到桂林又被解聘,回家暂住。后其父病故,留家办理丧事。1938年春,李达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年底与冯玉祥离开桂林。1939年1月至9月,在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9月至年底回桂林。从毛泽东命武汉办事处派人和李达联系一事可以推断,当时李达在湖南,因为李达若在桂林或重庆,可由桂林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与他联系。而1937年至1939年三年中,只有1937年下半年李达在湖南。因此可以说,毛泽东说读了十遍《社会学大纲》的时间在1937年下半年,最迟在1938年初。因此也可以说,在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毛泽东肯定读过《社会学大纲》,而且不止一遍。那么,《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撰写“两论”乃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社会学大纲》为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李达在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特别强调实践的意义,并以实践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这一体系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为主线,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指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考察认识过程,去理解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统一,是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上实现的。”<sup>②</sup>

2. 实践不只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认识过程中的诸契机以及认识结果的检验,都离不开实践。

---

① 《中国哲学》1979年第1辑。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11页。

3.“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 ”<sup>①</sup> 人类认识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的发展。”<sup>②</sup>

4. 人类的认识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意识上的能动的反映,指出“人类之实践的物质能动性,在观念的形式上反映出来,就成为意识的能动性或认识的能动性。”<sup>③</sup>

未读过李达著作的人,可能对李达的以上论述并不陌生,这是因为我们熟悉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的原因。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构建的认识论体系,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的雏形,《实践论》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李达还构建了关于矛盾学说的框架体系。他关于两种发展观、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具体的矛盾和本质的矛盾、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拮抗矛盾和非拮抗矛盾的论述,虽还粗糙,但已初具规模。毛泽东的《矛盾论》,论及六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诸方面的同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把李、毛二氏矛盾学说的框架进行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和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社会学大纲》的矛盾学说,还比较粗浅,中间缺乏一个核心。这些在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中得到了克服,《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多层面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结构严谨,论述深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09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6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235页。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撰写的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该提纲1937年9月曾印过油印本,1940年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单行本。李达应该有可能读过这部著作以及其他军事哲学著作,他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推崇有加。1939年冬至1940年春,李达多次应邀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sup>①</sup>

毛、李二氏的理论创造与交流,大大促进了他们的友情。毛泽东对李达十分关切。1939年邀李赴延安,未能成行,感到很遗憾。1947年10月,毛泽东通过地下组织带信给李达,信中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请李达去解放区。因李达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能成行。1948年,毛泽东又三次电示华南局找到并护送李达到解放区。1949年4月,李达在华南局的安排下离开长沙,经香港,于5月14日抵北平。李达被作为毛泽东的客人单独接到北京饭店,两天后,应邀去毛泽东在香山的住处叙谈。两位老友在分别了20多年以后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见证人。1949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建国初,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这样,他在教育岗位上度过了最后17年春秋。毛泽东与李达的友情非同一般。据说,50年代末,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时,曾对当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sup>②</sup>

① 曹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198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交往录》,第70页。

建国以后,李达进行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述。先后对《实践论》《矛盾论》作了解说,为毛泽东的其他一些著作写了阅读指导。晚年还准备修改“两论”解说,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读后记。李达为毛泽东的著作撰写解说,是建国后毛、李二氏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赞赏李达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工作。他在看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后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在写《〈实践论〉解说》时,李达每写完一部分,就寄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修改。《解说》的原稿,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的那段话,没有对排外主义的认识做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客观上所起的反帝作用进行评价,毛泽东对此做了修改:

1. 在《解说》中谈到中国的排外主义地方,加写了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sup>②</sup>

2. 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未提起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sup>③</sup>

另外,毛泽东还把《解说》中的“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成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sup>②</sup> <sup>③</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8页。

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sup>①</sup>

李达在解说《实践论》时也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如认为《实践论》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之中不妥，毛泽东接受了李达的意见，复信说，“出选集时拟加修改”。<sup>②</sup>

毛泽东尊重李达的意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之前，毛泽东将书稿寄给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反复阅读，以极认真的态度写了学习心得。李达也能以平等的心境对待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他曾说：“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和毛主席争论。”

毛泽东对李著《社会学大纲》一直评价很高，1961年夏天，李达到庐山休养，8月25日他与毛泽东畅谈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再次提及该书，建议李达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在去世之前，修改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了上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李达的影响。该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部分，显然采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体系，比《社会学大纲》的论述更完整、更准确。关于形式逻辑问题，《社会学大纲》主张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这显然受到30年代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当时，毛泽东也没有摆脱这一影响。在8月25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表明了他新的看法，他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如果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对形式逻辑的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上述观点是他长期研究得出的，李达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改变了以前的看法，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也有体现。

1958年以后，党在经济建设上的“左”的倾向已日益严重，李

<sup>①</sup> <sup>②</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8页。

达与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出现了分歧。那一年,李、毛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口号,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当时,李达得悉有这条口号感到很生气,立即去见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他第一句话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毛泽东不知由来,愣了一下,随后诙谐地问:“噢,是不是鸿门宴呀?”李达颇认真地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问清来由后,便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听了并不高兴。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便接着问李达:“新疆大不大?内蒙古大不大?西藏大不大?你看,浙江人多地少,但能够卖余粮,而新疆、内蒙古和西藏这些地方地大人少,却要吃供应,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嘛!这样的事多得很。三大战役、直罗镇战斗的胜利,都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李达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问:“润之,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泽东也不转弯子了:“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当时在场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见两位巨人快吵起来了,便插话说:“口号由省委取消。”可是,李达仍执著地说:“口号取消,思想上不取消是不解决问题的。”这时候,毛泽东再也不说了。李达要走了,毛泽东站起来同他抱了抱肩膀,要梅白送送。在返回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达对梅白说:

《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啊!主观、客观,主观要符合客观;实践理论,理论实践……讲得多好啊!现在润之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sup>①</sup>

争论由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引起,涉及到的是哲学问题,李达把它概括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指出,毛泽东已违背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所表达的哲学思

<sup>①</sup> 见《毛泽东交往录》,第72页。



想。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包涵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阶级斗争、群众路线为特征的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应该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这也是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的观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会变成背离客观规律盲目行动的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毛泽东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显然是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李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他尖锐地指出:

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sup>①</sup>

李达和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产生分歧,与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有关。无疑,李、毛二氏的哲学体系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二者强调的方面并不一致。李达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每部分都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实践的唯物论是整个体系的根本论纲,贯穿到各个部分,如在历史唯物论部分,强调生产力观点的核心地位。与此有所区别,毛泽东的哲学体系,居突出地位的是认识论和辩证法,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有很多关于唯物论的论述,但他的确没有写出像《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的专门系统论述唯物论的专著。在历史唯物论部分,他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些都为他晚年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对于党内“左”的倾向,李达进行了一些批评。如1959年发表了《正确认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等文章及其讲话,着重论述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以及在社会主义阶段

---

<sup>①</sup> 《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1961年8月,在庐山与毛泽东畅谈时,直言不讳地讲了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看法。1962年9月,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家乡调查“共产风”等造成的严重后果,并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去信,指出了问题,还给中央写了报告。在日益“左”倾的形势下,李达坚持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不参加“左”的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1966年3月,他明确表示反对林彪、康生等炮制的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遭致了大祸。

李达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拉开了两人的感情距离。1966年2月,李达为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从北京回到武汉。从5月份开始,遭到了政治迫害,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当时李达自信地说:“等运动结束了,我们回北京去,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到了7月份,迫害加剧。7月16日,毛泽东正在武汉畅游长江,18日,有人问李达是否想见毛泽东,李达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显然,李达与毛泽东之间,再也不是以前那样可以“随来随见”的关系了,从李达的话语中,已透露出对毛泽东的失望情绪。过了一天,李达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不再以“润之”相称,而第一次改称“主席”,请主席救他一命。但是,20天后,这封信才辗转到了北京,一切都晚了。风烛残年的李达没能捱得过这场政治迫害,于8月24日辞世。

对于李达的去世,毛泽东感到难过。但是,由于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李达在政治上被打倒,固然因为林彪、康生的迫害,但是,毛泽东也是有责任的,而且,对于李达“开除党籍”等处分也是中央批准的。“左”的政治需要、对个人崇拜的欣赏,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抛弃了李达。到了1969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到了李达,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感情。随着林彪阴谋的逐渐暴露,毛泽东在与湖南同志的谈话中深情地谈到:“现在看来还是李

达同志正确,他是反对林彪顶峰论的。”并在毛泽东在世的1974年1月,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会”。

以上我们分析了李达、毛泽东一生的交往,大致分四个时期:1920年冬至1921年春;湖南自修大学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国以后。在前三个时间段里,李达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李达多受毛泽东的影响。晚年,他们在哲学上出现了分歧,李达敢于在毛泽东面前直陈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多见的。

《论语》上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从李达与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来看,李达可谓是毛泽东的多闻之友、直谅之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李达的一生以悲剧告终,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左”的错误,对于我们民族的灾难。

## 二 李达与邓初民

邓初民,字昌权,1889年10月20日生于湖北石首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乳名叫“经喜”,读书后仰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改名“希禹”;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宣传后,向往初民的生活,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人,复改名“初民”。“希禹”、“初民”,反映了邓初民青少年时代的理想追求。

邓初民5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入石首县立高级小学和荆南中学读书,开始接触到维新思想。1912年,他考入宋教仁担任校长的江汉大学,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宋教仁被刺后,江汉大学停办,邓初民于1913年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的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学。在东京,邓初民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积极参与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评议会会长,与李大钊等编辑《民彝》杂志。

邓初民与李达初识在1927年,武昌。当时邓初民任湖北政府委员,还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课;李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务委员;应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授科学社会学概论。大革命失败后,李达、邓初民先后躲避到了上海,从这时起,到1932年5月李达离开上海去泰山为冯玉祥讲学时止的四年多时间里,是他们交往最多,思想学术上相互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1928年6月,邓、李二氏与朋友在上海创办《双十》月刊,月刊的发刊词反映了他们共同的追求:

反对帝国主义,超乎一切阶级而代表国民的独立要求,反对封建军阀及一切封建集团与封建关系,建立民主统一的政权,而一切都要以工农为主力联合小有产者,去作领导,准备走上非资本主义建设的道路。<sup>①</sup>

1928年冬,李、邓二氏又和熊得山等人一起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革命书籍。是年书店出版了李著《现代社会学》的修订版,第二年又出版了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该店还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1930年,书店在我国首次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等。

1929年,邓初民、李达又与许德珩、张庆孚、黄松龄、施复亮等人发起组织了“本社”,有20多人参加。所谓“本社”,就是“要保本,保持革命的本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忘记本,不能做损害共产党的事。”<sup>②</sup>本社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本社成员经常聚会在一起,谈论时尚,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民权,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30年,李达应聘到暨南大学任教,与邓初民同为暨大教授。

<sup>①</sup> 《双十》月刊创刊号,1928年6月3日。

<sup>②</sup> 宋镜明《李达传记》第79页。

1931年秋，暨大社会系主任许德珩解职，邓初民向其友文学院院长陈中凡推荐李达任社会系主任。

1932年2月和1933年暑假，李达、邓初民先后被暨南大学解聘，李达北上去了泰山、北平，邓初民南下到了广州。之后到建国以前，李、邓二氏还有几次交往。有两次在北平，那时李达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1934年、1936年邓初民两次去北平都专程拜访过李达。还有一次是在1939年夏，那时李达被冯玉祥聘为研究室主任，李达向冯玉祥推荐黄松龄讲经济学，邓初民讲政治学。这次李达与邓初民相处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给邓初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每天上午讲课，下午休息，冯将军率领他的卫士等若干人，每日听讲，李达先生亦在座侧耳倾听，我与黄教授各占一上午，亦互听、互讲，如此在陈家桥差不多住了一个月。

我们每日下午休息时间，上下古今，谈锋甚健，李先生尤诙谐百出，从抗战期间的腐败黑暗到个人私生活的苦乐滋味。

这一个月，是我同李先生在一起生活的一个月，也是我最愉快的一个月。从一切不经意的、随便的笑谈中，直捷的、真诚地认识了他的个性、学识、修养、见解，以及他做人处世的态度。<sup>①</sup>

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战斗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邓初民都是比较突出的。我们曾经谈到，李达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其研究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而邓初民则主要是以研究政治学而享有盛誉的，同时，他又认为，政治学的研究，离不开哲学的研究。他说：

我的政治科学的研究，是从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说起

<sup>①</sup>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的。<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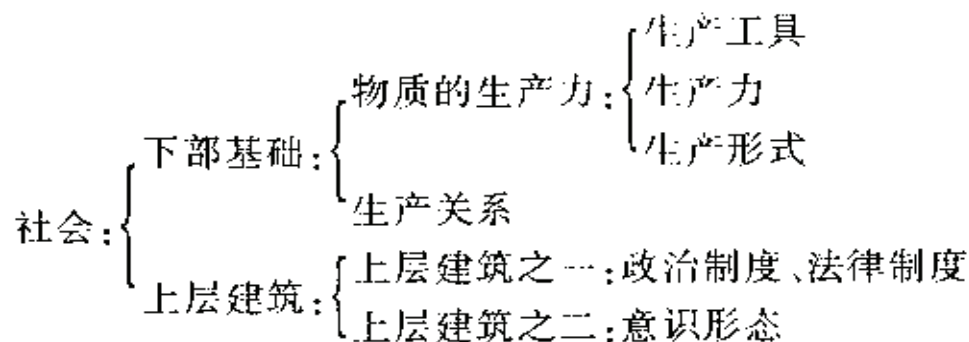
我们所说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建筑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的。<sup>②</sup>

显然,邓初民明确表示,他的政治学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

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兼及政治学,邓初民研究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有相近的地方,这是他们在学术上能相互影响的前提,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把他们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的前提。

邓初民研究政治学的代表作,是1929年由昆仑书店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1984年再版)和1932年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书的前面,他从研究政治学的角度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他先从社会的构造说起,依据他对社会构造的理解,我们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示:



根据李达在《现代社会学》的阐述,我们同样可以画一个图示:

①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第36页。



社会:	{	生产力
		社会基础: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 { 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两者的不同,可以归纳于下面二点:

其一,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不同。

李邓二氏分别使用了“社会基础”、“下部基础”或“社会的物质基础”等名称,这些名称与“经济基础”相当。他们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主要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即构成法制的政治的上层建筑所依以树立,并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真实基础。<sup>①</sup>

依据各自对这段话的理解,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的范畴之外,而邓初民所指的经济基础则包括生产力,他在谈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也说到:

就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构造部分来说,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经济构造,又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sup>②</sup>

在邓初民看来,“下部基础”与“社会的经济构造”是同义的,它们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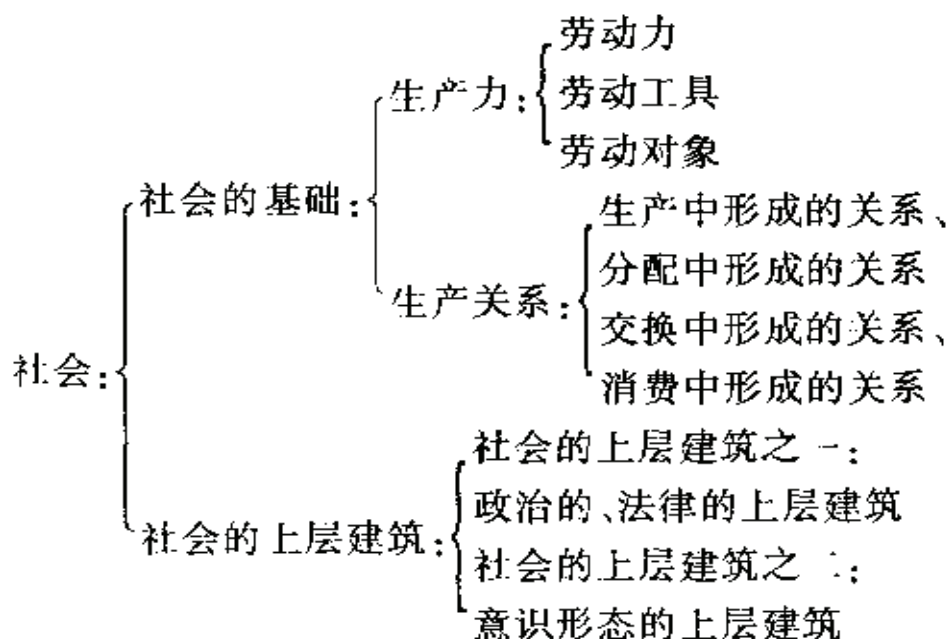
其二,李达把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划分开来,邓初民则明确把上层建筑划分为上层建筑之一和上层建筑之二,指出上层建筑之二的意识形态,不仅受社会基础的制约,而且也受到上

<sup>①</sup> 这段话现译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sup>②</sup>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第43页。

层建筑之一的政治法律所制约,同时对二者又有反作用。邓初民的这种划分,有助于人们理解上层建筑各部分的关系。

邓初民对社会构造的理解,受到《现代社会学》的启示,但又有自己新的见解。反过来,邓初民的观点,也影响了李达的进一步思考,在《社会学大纲》中,他对社会构造的理解不同于《现代社会学》,如下图所示:



《社会学大纲》明确地提出:“社会的经济构造,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的统一。”<sup>①</sup> 对此,李达做了如下解释:

所谓生产力,一般那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东西常是由特定生产关系赋以形式的生产力。同时,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也不能存在。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不可分离的结合着。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的内容。在形式与内容这个统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生产过程,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388页。

形成社会的经济构造。<sup>①</sup>

这种理解,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基础中的决定性地位,是李达构建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体系的主要体现。李达对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新认识,显然受到了邓初民观点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地准确和科学。

邓初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研究政治学的科学的方法,在《政治科学大纲》中,他概括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法则:

总之我们不能不把各种现象在它的全体性上,全联系上,及其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上去研究,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法则;矛盾及对立物的斗争,是它的第二个法则;质量转换的法则,是它的第三个法则。<sup>②</sup>

邓初民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还不准确,全面;但在中国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作出这种概括还是较好的。

在书的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李达的政治思想,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画出李达政治思想体系的图示,如下页图1所示。

邓初民在《政治科学大纲》中,建立了比较严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这一体系,也可以用图示来表示,见下页图2。

相同的是,他们都把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作为最基础的理论,在内容上,都论述到阶级、国家、政党、革命等问题。

不同的是,在方法论上,邓初民直接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他关于阶级、政党、民族、政治的统治和国家等方面的理论,而李达则以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为中介理论,他关于统治型式、统治工具等方面的论述,更多地是依据这一中介理论进行的。谈到研究方法时,邓初民说: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389页。

<sup>②</sup>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自序》,第17页。

图1 李达的政治思想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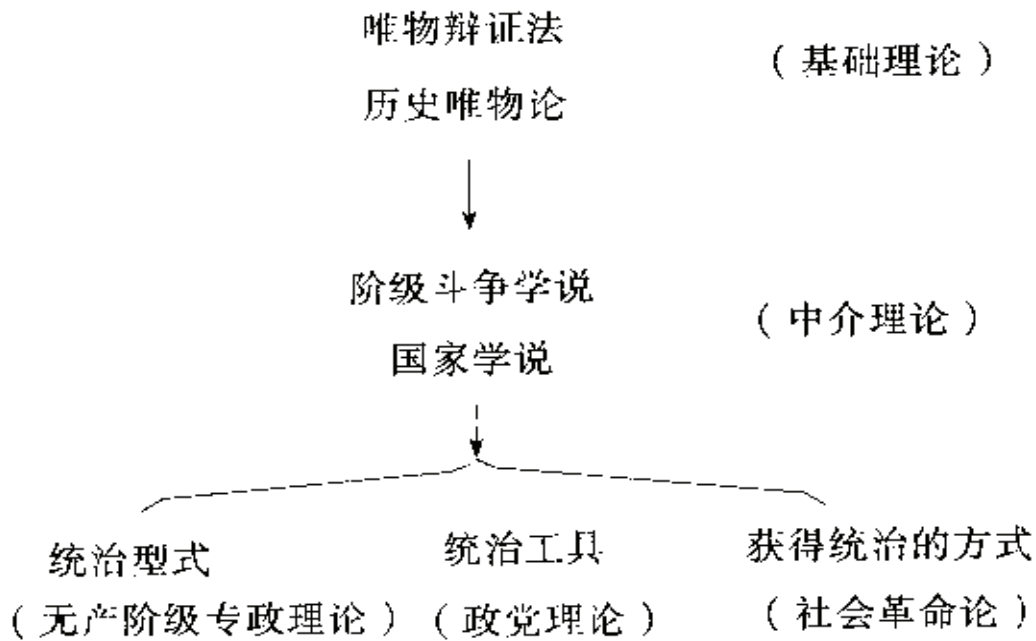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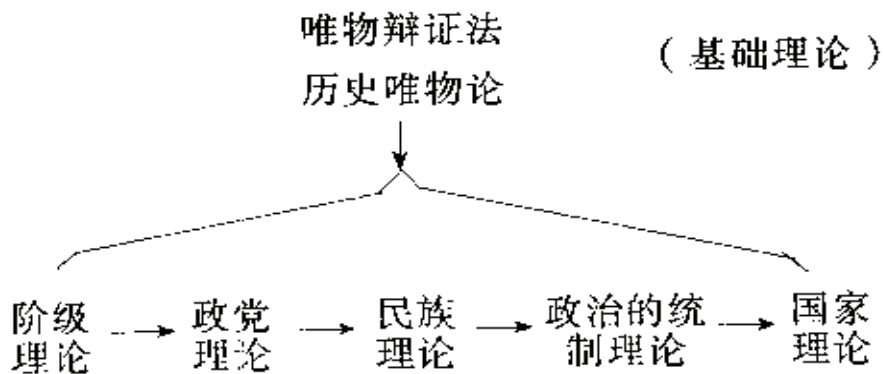


图2 邓初民的政治学体系



循着我们研究的方法,是要先从简单的范畴出发,慢慢地进到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去,最后把它综合起来,成为

一个多方面的统一体。<sup>①</sup>

邓初民以研究阶级着手,渐及于政党、民族、政治统治等,而要完成“把它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多方面的统一体”的任务,是对国家的研究。因此,在内容的编排上,邓初民着重论述“国家”,与此不同,李达更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邓初民对国家的研究,内容非常详尽,涉及到国家的概念、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发展阶段、国家论中的分派,以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经济、国家与革命等问题。他对民主主义与独裁、议会主义与苏维埃作了区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问题,作了确切的阐述。他把国家的死亡分成三个阶段:过渡时期——新社会之半熟期——新社会之完成期。他所谓的过渡期,即指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他对过渡时期的国家的论述,包括三个要点:<sup>②</sup>

1. 过渡时期国家权力更为广大,阶级支配更为强烈;

2. 过渡时期的国家是要以国家来消灭国家,以国家权力创造无国家的新社会;

3. 过渡时期的国家是大多数阶级抑压少数阶级之机关。

邓初民的上述论述,与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的分析是大致相近的,在其他问题的论述上,我们也能看出《现代社会学》对邓初民的影响,比如在“国家与社会”一节中,就引用了《现代社会学》的大段论述。

李达与邓初民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私交甚深,邓初民推崇李达的人品、学术,他说:

李先生学术湛深,践履笃实,蔼然学者。其说话,写文章,一如其人,简洁、明确、朴实、实际、澄澈,对于现时政治、经济、

<sup>①</sup>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第113页。

<sup>②</sup> 参见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第174页。



文化各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对于任何问题,抓得住中心环节;而且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摇撼,实有足多者。<sup>①</sup>

### 三 李达与吕振羽

吕振羽,字行仁,学名振羽,1901年生于湖南邵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吕氏8岁入私塾读书,15岁入武冈县立中学,深受其师萧不诚“务求踏实”的思想影响,有了“实业救国”的思想。1921年他考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2月,工业专门学校并入新成立的湖南大学,在湖南大学读书时,吕振羽结识了李达,从此师事李达。

当时吕振羽是湖南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李达在湖南大学法律科任教授,讲授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时任湖南省学联会长的夏明翰建议吕去听李达的课。李达联系中国实际讲授唯物史观,追求进步的吕振羽听了十分振奋,他经常主动地向李达求教,李达也耐心地给予指导,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李达的教诲,对吕振羽以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从他对李著《现代社会学》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吕振羽说:

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sup>②</sup>

<sup>①</sup>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sup>②</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吕振羽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先参加了北伐军,后弃武从文,1929年在北平主编《村治月刊》,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最初他研究乡村自治,继而研究东方问题。1930年下半年起,他对经济研究产生兴趣,由研究东方弱小民族,转向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研究乡村自治,转向对中国经济及其发展前途的研究。1933年,经李达的引荐,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在李达的影响下,吕振羽又由研究经济学转向研究历史学。

30年代,吕振羽学术总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检讨当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贡献在社会史和思想史方面。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王礼锡有一段评述:

当作世界的资本主义国际在依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恰恰与资本主义国际相对立的国际亦正在依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中国社会本身的变革亦正在这车轮中旋转,为着两个外力的加入,而这变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为要辩护自己阶级的前途,便对于中国社会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这一个战斗的后台指挥者,是存在于现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而为着各阶级的畸左畸右形成许多不同的意见。<sup>①</sup>

显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它是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场较量。然而,从学理上说,它又是关于社会史的学术论战,因而必然涉及到具体的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在论战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李达鼓励吕振羽转向研究历史学,他对吕振羽说:“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sup>②</sup>

---

<sup>①</sup> 《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辑,《读书杂志》1931年。

<sup>②</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在历史研究上,李达对吕振羽的最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的认识上。对历史研究,李达特别强调方法论和史料的重要性。他说: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的真相。<sup>①</sup>

李达认为,史料与方法论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必须连同去解决,而要有正确的方法论,要做到依靠历史真相去分析史料,都必须正确地掌握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对历史研究的基本看法,对吕振羽具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初版自序”中,发挥了李达的上述见解。他写道:

深深的感觉得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sup>②</sup>

就是从学术而言,中国社会史论战也不纯粹是一个史学问题,当时参战的何派何人,都声称自己站在新哲学的立场上。因而,李、吕二氏从方法论入手,切中了论战的急所。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一、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

李达对上述问题的见解,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已有论述,这里主要谈谈吕振羽的观点,兼及李达思想对吕振羽的影响。

<sup>①</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sup>②</sup>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6页,三联书店1961年重版。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吕振羽最初显然受到李达的启迪,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吕氏引用了“李达先生曾为我们介绍如次的一段话”:

关于封建主义的这个定义,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亚细亚的封建主义的问题,就要看那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中有无因这个表征而显出特征的关系以为断。<sup>①</sup>

这段话给吕氏两点启示:

其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有从生产力以及与之矛盾统一的生产诸关系上去考察,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

其二,具体来说,李达在这里倾向于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中国的封建制,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大纲》中有明确的表述。

因此,最初吕振羽也认为,李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中国的封建制。然而,当他按李达提示的方法对之作进一步研究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所谓“亚细亚的”社会内容,一面只有奴隶主和奴隶之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它们间特定的生产关系,这在本质上与古希腊罗马是相同的,但一面又具备着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公社形态、国家治水事业等特殊形态,这是古希腊罗马所不具备或不在其全部过程中都具备的诸特征。

由于古代东方各国有其独特的诸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为给予一个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明白概念,故又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sup>②</sup>

吕氏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当于奴隶制度的阶段的结论。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从方法论而言,他强调不仅要依

①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9页。

② 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

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而且要“从活的历史的具体内容与具体分析出发。”<sup>①</sup> 正因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冷静的和学理的。

李达认为,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了各式各样的奴隶制阶段,中国殷代即为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一系列著作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他批评了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说法,还指出古代印度、古代埃及以及古代西南亚各国,都经历了奴隶制阶段。对于中国,他得出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结论。

吕振羽从研究殷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他首先考察了殷代的生产工具,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他得出了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结论,依据“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恩格斯语),这一提示,论证了青铜器足以使社会摆脱氏族制度而进入奴隶制时代。继而,他又考察了殷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土地形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证明了殷代经济是一种奴隶制经济。接着,他分析了殷代社会的上层建筑诸形态。认为:“殷革夏命”说明了一场社会制度的变革;殷的婚姻制度已是一夫一妻制;在意识形态上,殷代已形成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两重世界观。

吕振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做的全面的具体分析,基本上揭示了殷代奴隶制社会的全貌,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放到了令人信服的基础上,有力驳斥了“新生命派”等流派不承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观点。

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认为商业资本存在于自奴隶社会以来的各社会形态中。李达的上述观点与吕振羽的见解是一致的。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明确提出,商业资本并不能代表一种独特的社会阶段,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托派和“新生命派”的“商业资本主义

---

<sup>①</sup> 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



社会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实质在于,从中国古代社会中寻找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的源远流长的发展期,从而论证中国近代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吕振羽抓住这一实质进行了批判,他说:

由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期间,并不曾有所谓第三种生产方式的存在,无论商业资本在那一过渡期间的作用如何,但绝不能也没有存在另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的生产方式。<sup>①</sup>

所谓“商业资本社会”,既没有与之相照应的独自的生产方式作基础,那么,在人间的世界内,便没有它独自存在的处所;如果有的话,那只有存在那班诡辩论者的脑子里。<sup>②</sup>

吕振羽的批判,对于论证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有意义的,而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史论战,实质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吕振羽除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以外,还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分期做了新的划分,有力地批判了托派和新生命派的错误历史观。李达把吕振羽的划分归纳为:

一、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

二、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

三、殷代为中国史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

四、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

五、由秦代到鸦片战前这一阶段,为变种的即专制主义的

<sup>①</sup>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7—18页。

<sup>②</sup>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8页。

封建社会时代；

六、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sup>①</sup>

吕振羽 1932 年秋到北平，之后到 1935 年底的时间里，是他和李达交往最多的一个时期，他至少每周去一次李达处，李达也经常去吕振羽处。他们论学议政，相互促进，尤其在吕振羽最初转入历史研究时，李达对他的影响很大，吕氏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中说：“在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当中，吾师李达先生，对一般理论上，曾给了我不少的指示；又承对本书详细的校阅了一遍”。<sup>②</sup> 吴泽也曾说到：“吕老的关于西周封建论等观点，有不少都是受李达先生的影响”。<sup>③</sup> 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也不难看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上李达对吕振羽的影响。当然，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有些问题，他们的见解并不一致。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当时更多地属于方法论问题，因此，只要方法论大体正确和一致，得出不同的结论，是不足为怪的。

当中国社会史论战扩展到哲学史的领域时，李达又支持吕振羽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当时哲学史领域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流行的有胡适派、托派和新生命派，其中以陶希圣的影响为最大。陶希圣，1899 年生，原名江曾，湖北黄冈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食货》杂志主编，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著有四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陶氏在该书的绪论中称：

思想不能决定存在，反之，存在乃决定思想。社会之经济构造变迁，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相随变止。

---

①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 4—5 页。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 6 页。

③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 4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社会的变化与自然界一切现象一样是辩证法的。<sup>①</sup>

陶氏极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面目出现,颇具欺骗性。然而,正如吕振羽所说,他“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sup>②</sup>为揭示陶希圣的真面目,李达支持吕振羽对陶氏的观点进行系统地批判,他对吕氏说:

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不过,你对他一面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一面又不要侮辱他的人格,作人身攻击。……你可以到政治系教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他唱对台戏。<sup>③</sup>

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吸引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的学生前来听讲,沉重打击了在上述三校授课的陶希圣。陶氏请黄松龄向吕振羽提出,要求吕氏把中国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教。李达知道后十分气愤,他要吕振羽回覆陶希圣,如果陶氏要把中国大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那你就叫他把在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來。李达的支持,对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起到很大的作用,多年以后,他仍经常想起这段难忘的历史。

吕振羽后来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初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体系。李达对中国哲学史涉足较少,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素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揭示它们之间的承继、发展关系,围绕着各时代各阶级的使命和政治态度,

①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版。

②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序》,黎明出版社,1937年版。

③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展现各哲学流派的演绎更替,这种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在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吕振羽 1935 年冬赴南京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与李达的联系中断,直到 1939 年 7 月在重庆才有了一次短暂的相聚,以后又各分东西。建国以后,他们各有任所,见面并不太多,但常有书信来往。在信中,他们谈事业,谈学术,在 1950 年 7 月 24 日给吕振羽的信中,李达说:

你如离开大连大学,就同我去创办湖南大学,何如!?

湖大现有文教、社会(科学)、财经、自然、工程、农业六院二十五系,学生二千余人(在中南六省大学中,学生最多)。校中现有进步教员十余人(多数是党员),党员三十余人(包括职员学生工友),团员五、六百人。只要你我去加强领导。稳可以把湖大办好,不难赶上北大和清华。<sup>①</sup>

李达有办好湖南大学的雄心,但又提醒自己与吕振羽不要因为行政、党务工作,荒疏了学术研究,他对吕振羽说:

你近来把历史的研究工作停顿了,是可惜的;同样,我把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停顿了,也是可惜的(特别是我来日苦少)。假若我你去办湖大,双方都可以抽出一半的时间来做研究工作,一定有一些成就。<sup>②</sup>

在学术上,李达与吕振羽谈得最多的还是历史研究,在 1960 年 12 月 28 日的信中,李达向吕振羽提议,对古代史分期问题进行更科学的研究:

七月间路过上海时,曾与吴泽、束世澂晤谈,我提议约集几位同志写一本《周代社会制度研究》,科学地解决古代史方面问题。我认为此书的写作,甚为重要(曾多次同你谈过)。许多史学家不懂或不知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当代史分期问题,

① ② 《李达给吕振羽的信》(1950 年 7 月 24 日)。

而只是主观地、武断地任意划分,这类著作大有市场,许多青年读了这些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人云亦云,难于纠正。<sup>①</sup>

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李达一贯倡导的,吕振羽自写第一部史学著作起,就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这一共识,是他们师生二人能长期保持浓厚情谊的思想前提。

李达与吕振羽最后在一起纵论学术,是1962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由李达主持,吕振羽作了总结性发言。李达在返回武汉前,约请吕振羽去武汉大学讲学,吕氏欣然答应。后吕振羽因急事提前返京,不能如约,只好在长沙写信向李达致歉,当北上列车途经武昌时,他又为老师写了一首情深意长的诗:<sup>②</sup>

今过武昌未停车 心事拳拳系珞珈  
立雪当年蒙解惑 担簦一帙走天涯

谁能料到,师生长沙一别,竟成永别,这首诗成了吕振羽和李达的诀别诗。1963年1月5日,吕振羽在返京途中横遭逮捕,从此幽禁十二载;李达因反对“顶峰论”,1968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

吕振羽与李达自1926年初识,到1962年永别,37年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朋友之谊。吕振羽成一代史学大师,多受李达的影响,吕氏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了斗争与创新精神,风骨嶙峋,在人格精神上也很像他的老师。对李达的人品、学术,吕氏钦佩有加,感怀不已。他1975年出狱以后,多次想写文章悼念先师,均因病重作罢。他曾因自己不能为李达作传而痛哭失声,热泪横流。

对先师,吕振羽曾作如下评价:

李达同志是我终身难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我认为他不仅是我们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

<sup>①</sup> <sup>②</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义启蒙大师,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著述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广的。他的品德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对我影响最深。他勤勤恳恳地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sup>①</sup>

史家之言,客观公允!

## 四 余 论

前面三节,我们分别论述了李达与毛泽东、邓初民、吕振羽的交往,以及他与三人之间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上的相互影响。李达与毛、邓、吕三氏的交往,代表了他交往的三种型式:与政治领袖的交往、与同辈学人的交往、与晚辈学生的交往。为进一步多层次地反映李达的学术生涯,这一节我们依上述三种类型,分别介绍李达与冯玉祥、杨献珍、侯外庐等人的交往。

### (一)李达与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幼年家贫,酷爱学习却不得。成名之后,想法弥补知识的不足,曾三次请李达为自己讲学。

第一次是1932年。当时冯玉祥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息影泰山,闭门读书。是年2月,李达被暨南大学解聘,应冯氏的邀请,6月上泰山为其讲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每天授课两小时,为时两个月。

---

<sup>①</sup>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对李达这次讲学,冯氏在《我的读书生活》中写道: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到泰山,住普照寺。乃请了许多专家、学者为我讲书。如陈豹隐先生讲新政治学,李达先生讲列宁主义。每到上课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想着自己是一个大兵出身的人,现在能有这样的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讲着世界最进步的革命理论,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sup>①</sup>

李达等人的讲学,对冯玉祥的思想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冯氏在给友人陈定民的信中提到,听了李达等人的讲课后,认识到“我们只能向前进,不能回顾;只有开新,不能复旧”。<sup>②</sup> 特别是通过李达等人的讲述,冯氏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1935年9月,他在泰山普照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亲笔写的十六个正楷大字:“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sup>③</sup> 这可以说是李达第一次为冯氏讲学的最大收获。

第二次是1933年。当时冯玉祥驻军张家口,请李达去讲辩证逻辑。这次讲学,李达受北平地下党委托,还负有劝冯玉祥联共抗日的使命,冯氏了解李达的历史和身份,也有借助李达与中共方面联系的目的。一次他宴请李达后,故意把一个日记本丢在李达房里,而且并不派人来取。李达打开日记本看,有几处都写着要联合前苏联,可惜没人介绍,意即通过C.P,给他介绍联合前苏联。李达明白了冯氏的意图,在冯氏再次宴请他时,说到联合前苏联,只有通过C.P,并表示愿意帮助冯氏与北平的C.P取得联系。不久,党组织派人与冯玉祥商谈,后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①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2),三户图书社1943年刊印。

② 李新生、韩尚义《记冯玉祥在泰山读书》,《人民日报》1982年10月5日。

③ 李新生、韩尚义《记冯玉祥在泰山读书》。

第三次是 1939 年。1938 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当时李达在广西大学任教,冯氏乃请李达同赴重庆,为他主持研究室。1939 年 1 月,他们到达重庆,住南温泉、陈家桥。那时为冯氏讲学的还有赖心治、武诤生、胡守愚等人,后李达又向冯氏推荐了黄松龄与邓初民,当时在陈家桥的还有吴组缃。李达讲辩证逻辑,邓初民讲政治学、黄松龄讲经济学,吴组缃帮助冯玉祥整理《我的生活》书稿。陈家桥一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他们在陈家桥,上午讲学,下午休息,生活得相当愉快。然而,到是年 9 月,李达还是决意离开重庆去桂林,冯氏挽留而不能。李达离开时,给冯玉祥留下了一封长信,对冯氏提出了许多建议,冯氏认真地看过此信,有的地方浓墨圈点,有的地方还加以顶批,他对身边的人说:“这真算得是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sup>①</sup>

冯玉祥钦佩李达的学术,也推崇他的为人,冯氏给李达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sup>②</sup>

## (二)李达与陈启修、杨献珍

陈启修,生于 1886 年,卒于 1960 年,字豹隐,四川中江人。

陈启修是中国最早的《资本论》文本的译者,陈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 1930 年由李达等人创办的昆仑书店出版,这可能是他们最早的交往。1932 年,陈、李二氏同在泰山为冯玉祥讲学,此后,又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北平期间,他们交往甚密,茜萍在《学人访问记——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一文中说到,在北平西城六部口和西长安街的球房里,常能看到陈、李二氏

①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

②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2)。

打台球消遣。<sup>①</sup>

陈启修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有影响的学者,曾加入过共产党,与李达志趣相近,当时在北平都是有名的进步学者。当时北平各大学的教授中,对于抗日救国有两派对立的观点,胡适、蒋梦麟为首的一派,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调查解决,实质上是拥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派反对不抵抗主义,李达、陈启修是这派学者的代表。

陈启修以研究经济学见长,在这方面他与李达常有交流。现北师大图书馆藏有李达赠给陈氏的李译《政治经济学教程》,扉页写有“豹隐兄指正 弟达赠”字样,这是他们学术上相互交流的一个佐证。

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中,都曾风云一时,后逐渐为社会所淡忘,建国后又露青年时代的锋芒,这是李达、陈启修人生历程大致相近的地方。

建国后,李达交友不多,杨献珍是其中之一。

杨献珍(1896—1992年),湖北郢县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959年后,杨献珍遭到批判,蒙冤二十年。杨氏蒙冤受害,皆因哲学而起,主要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为一”两个问题。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桓武、林青云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文章,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研究合二为一的事物。杨献珍在讲哲学课时,也讲到了“合二为一”的观点。杨氏认为,“合二为一”这个哲学命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成就之一,说明我国古代就已发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他还认为,在讲对立统一规律时,要既讲对立又讲统一,既讲“一分为二”,也

<sup>①</sup> 《世界日报》,1935年1月28日。

讲“合二而一”。艾桓武、杨献珍等人讨论的,本来是个学术问题,但康生、关锋等人,出于政治目的,却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一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断言“合二而一”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掀起了全国对杨献珍等人的批判。

对当年的那场批判,李达保持了沉默。当时前苏联的电台广播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沉默”了。李达的助手们建议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明态度,李达却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好写。”后又写信给陶德麟,要求他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在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中不要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sup>①</sup>

杨献珍对李达有极高的评价,称李达是“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杨二人私交并不太多,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热爱而心灵相通,彼此敬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益友。

### (三)李达与丁玲、侯外庐、吴泽

丁玲,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1922年丁玲入上海平民女学,对社会充满了困惑的丁玲,犹如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真正感觉到是到了自由世界,享受着学术自由的空气,这些老师们每天都给我们以新鲜的知识。<sup>②</sup>

李达当时是平民女学的校务长,丁玲因而成为李达最早的学生之一。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丁玲四处奔波之后,再次回到上海,当

---

<sup>①</sup> 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sup>②</sup> 丁玲《我景仰的邵力子先生》,《丁玲选集》第3卷,第3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时她在上海只同李达、施存统、陈望道、瞿秋白等有联系。1931年1月17日晚，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上海被捕，第二天下午，李达夫妇就把丁玲和孩子接到他们家里。胡也频被杀后，丁玲极度痛苦，经李达的劝慰开导，丁玲才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丁玲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深有感情地写道：

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李达先生说：“你明白么？这一切哭都没有用处！”我失神地望着他，“没有用处……？”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是没有什么用处！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sup>①</sup>

1936年3月，经地下党和鲁迅的营救，丁玲结束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逃离南京去了北平。到了北平，她去找李达，想通过李达找党。李达看她因为政治失去的太多，就劝告她：“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sup>②</sup>李达深知当时环境的险恶，但他自己并不因之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之所以如此劝告丁玲，完全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片苦心。在北平，李达还让丁玲去找冰心，以此让人们相信，丁玲已是一个无政治背景的人了。

丁玲对李达一直怀着崇敬之情，她回忆说：

李达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对他充满了信任和尊敬。

---

<sup>①</sup>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论胡也频》，《丁玲选集》第3卷，第216页。

<sup>②</sup> 王炯华《一代名流与李达》。载《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但我能始终被他照顾,始终保持和王会悟的友谊,能够和他经常来往,谈心,就在于我看到并且了解他这一点。我小心注意丝毫不去触犯他,我只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学生。<sup>①</sup>

侯外庐(1903—1987年),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大,1927年旅法求学,1930年回国,1932年被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

侯外庐在北平法商学院任教时,结识了李达,他以后回忆说:“我自得识李达同志,仅半年交往,便终身师事。”<sup>②</sup>

在北平法商学院,侯外庐经常向李达请教,李达也很愿意和他交换看法,一起讨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许多理论缺陷。李达对论战中的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这给侯外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达希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就鼓励侯外庐多做些工作,对他说:“我的目标大,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你年轻,可以多做些工作。”<sup>③</sup> 李达的鼓励,给侯外庐以精神力量,他说:

在他的鼓励下,我尽可能利用学校和社会的讲坛以及其他渠道开展宣传。即便后来敌人把我送进了监狱,自己仍坚持为继续翻译《资本论》作准备。<sup>④</sup>

侯外庐与李达在北平仅相处了半年,侯外庐被捕后,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但侯外庐仍经常从吕振羽那儿打听李达的消息。建国后,他们又在北京重逢,直到“文革”前夕,一直都有书信往还,结下

① 王炯华《一代名流与李达》。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6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③ ④ 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光明日报》1981年6月18日。

了很深的情谊。侯外庐得知李达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后,不觉怆然涕下。

侯外庐对李达十分钦敬,说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为人治学,堪称楷模”。<sup>①</sup>对李达的学术水平,侯外庐给予很高的评价:

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sup>②</sup>

侯外庐还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评价了李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他说: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李达同志是一位普罗米修士式的播火者。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孜孜不倦地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李达同志的著译曾经启迪过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引导青年追求真理的光辉,现在重温它也将使我们从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营养,澄清许多模糊的思想。诚如鲁迅先生论定李大钊同志那样,李达同志的著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sup>③</sup>

吴泽,1913年生,江苏武进人。吴泽1930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中,接触到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著作,李著对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演变的分析,深深吸引了青年吴泽,遂决心报考北平的大学。1933年夏,他如愿以偿,考入李达执教的中国大学,师从李达、吕振羽。

李达强调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应该研究“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

---

① ② 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6页。

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sup>④</sup> 李达的观点对吴泽有深刻的启示,他开始研究历史后,首先发表了《殷代经济研究》<sup>⑤</sup> 等文章,把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建国以后,李达曾与吴泽商谈过撰写《周代社会制度研究》一书,以求科学地解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在1962年长沙举行的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李达、吕振羽、吴泽,师生三代聚集一堂,畅叙师生之情、同志之情。这是他们师生三代人最后一次相聚。

吴泽早年仰慕李达,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师事李达,他曾对学生说:“李达先生、吕老和我是师生三代人。”<sup>⑥</sup>

以上我们根据有限的资料,谈了李达交往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不可能是李达交往的全貌。

正如李达所强调的,人是社会中人。社会中的人,交际自然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交际中,李达影响了别人,也影响了自己,从他的同辈友人中,从他的学生中,我们不难发现李达的智慧光芒在他的思想里闪烁;同样,在李达的思想里,也汲取了他各类朋友的思想精华。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发展。

---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⑤ 载《劳动季报》1935年第1卷第5期。

⑥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40页。

## 第六章 学术地位

### 一 各家对李达的评价

30年代,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辟李达专栏,说:

中国研究马克思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就教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至于今日,一死一囚,只有李达氏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sup>①</sup>

这一评论,说明了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地位。郭氏还从近五十年思想发展的角度,评述了李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他说:

总之,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贡献,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绍。介绍英国思想要以严幼陵氏之介绍赫胥黎、达尔文、斯宾斯影响为最大;介绍德国的思想要算王国维之介绍叔本华、尼采,陈仲甫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张君劢、张东荪之介绍法国柏克森,胡适之介绍杜威,张申府之介绍罗素;及近日李达之介绍辩证唯物论及俄国列宁、布哈林、朴列汉诺夫等的思想;……这些介绍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sup>②</sup>

---

<sup>①</sup>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380页、384页,北京人文书店1935年版。

<sup>②</sup>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385页。



郭氏显然认为,李达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从这种观点出发,往往容易忽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心得。这一重其介绍、轻其研究的评介模式,代表的不仅仅是郭氏一个人的观点,即使今日仍有影响。

关于李达及其理论造诣,知之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最具权威性。毛泽东对李达有过多次评价。一次是1939年,毛泽东看了李著《社会学大纲》以后,称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称李达是“真正的人”。这是对李达的学术创造及其努力的肯定。关于《社会学大纲》,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与李达的谈话中作了再一次肯定,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sup>①</sup>一次是1949年5月,毛泽东在表示愿意做李达重新入党的历史见证人时,说了一番话:

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sup>②</sup>

这里特别提到了两点,一是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二是李达在理论著述上的贡献。一次是50年代末,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交谈时说:

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

---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66页。

② 宋镜明《李达》第2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sup>①</sup>

在送走李达后,当时在场的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以中国民间的英雄人物李逵和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为参照系评价李达,突出了两个方面:其一,指出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旗帜;其二,指出李达的理论及其思想,富有斗争精神,他是一位战斗的理论家。关于李达学术理论的战斗性特征,人们是公认的,1939年在重庆时,他就被称为是“一位战斗的唯物论的老健将”。<sup>②</sup>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一特征十分重视,1959年,他与李达谈话时还提到:“你的文章不像以前那样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俱见于随意的谈话及信函中,指出了李达一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理论创造中的作用与贡献,指出了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地位及其理论特征。扼要,中肯。

作为一个革命家,李达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张静如认为,李达在创建中共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理论和思想的准备方面,尤其是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对此,他举出了以下四个方面:

1. 最早奋起迎战,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2. 打击主要论敌,在反击中起核心作用。
3. 划清理论界限,在战斗中起提高作用。
4. 重视思想教育,在革命中起团结作用。<sup>③</sup>

作为一个理论家,李达的成就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哲学方面。肖麓父以李达不同时期的代表著作评述了李达的哲学成就。他认

---

① 《毛泽东交往录》,第70页。

② 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2期编后记,1939年8月15日。

③ 张静如《张静如自选集》第184—186页,大连出版社1994年版。

李达强调“从经济里探求”“现代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这又可以说明，攻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似乎是为适应各种需要而放弃科学研究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sup>①</sup>

李其驹归纳了李达第一次思想转变过程的三个特点。第一，李达是从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的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面向中国革命实践是他理论活动的一个特点。第二，李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除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外，虽然也受过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未形成思想体系，更没有信奉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理论。因此，李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比较容易和其他思潮划清界线，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时，旗帜比较鲜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准确、纯正。第三，李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这对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有影响的。<sup>②</sup>

李其驹评述李达思想的转变，重点在 1949 年以前，至于 1949 年以后李达思想的变化，王炯华有精到的说明。王炯华认为，以 1958 年为界，李达 1949 年以后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李达“事业望隆亦有失”，一方面他进一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左”倾思想的烙印。后期李达“痛苦反思不赶潮”，对“左”倾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sup>③</sup>正如陶德麟、肖萐父所说：“莫道萧斋徒论道，逆风起处敢

---

<sup>①</sup> 参见胡绳《在李达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参见李其驹《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李达的早期活动》，《河南师大学报》1981 年第 1 期。

<sup>③</sup> 参见王炯华《李达》，收入《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 1991 年版。

横樱。”<sup>①</sup>

李、王二人的论述,基本描绘出了李达思想演变的大致线索,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具体深入地研究李达思想。

## 二 关于李达评价的几个问题

从以上各家对李达及其思想的评论,我们大体可以把握李达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李达思想的一些特色,如战斗的特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也能看出李达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然而,由于角度不同,人们对李达的评述都不够完整,而且多感慨与泛论,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纵观李达的一生,大致可以把李达作为政治宣传家、教育家和学问家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作为学问家,他又在多门学科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尤以他在哲学上的建树最为注目。所以,我们觉得,要评价李达,必须从政治宣传家、教育家和学问家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要评价李达的学术地位,必须首先把握学术活动在他全部生活中的地位。

### (一)作为政治宣传家的李达

李达首先是以政治活动家与宣传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早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怀着救国的抱负走上了求学之路,他在爱国运动的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作为“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的负责人,联络北京大学

---

<sup>①</sup> 陶德麟、肖麓父《怀鹤鸣师》,《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许德珩、邓中夏等，组织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五四”运动以后，李达已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与宣传家，在同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将，为党的创建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李达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曾主持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李达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而载入史册的。

李达脱党以后，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仍然力所能及地参与政治活动。他一直保持着与党组织的密切联系，并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大革命时期，李达曾受毛泽东之托，做过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李达曾受党组织的委托，三次给冯玉祥上课，促进了冯玉祥的思想转变；建国前夕，李达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做程潜的工作，为和平解放湖南做出了贡献。

李达的学术活动，本身就是他参与中国现实政治的最重要的方式。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在白色恐怖中，他顶住各种威胁利诱，以坚韧的意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译、出版和教学工作，为此，他曾被特务殴打致伤，相当一段时间还因此失业、生活无着，但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事业。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他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回答了革命的方向与道路问题；最全面地宣传阐述唯物辩证法，为革命者提供了理论武器。他的著译和教学，影响了大批中国青年的信念。例如作家杨沫曾回忆说：

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好像是李达写的）。这本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社会发展方向的小书，立刻使我这个正在寻觅人生的真谛、不知该怎样活下去的青年，好像久旱逢甘雨，苦闷、彷徨的心灵，如茅塞顿开，知道了人类社会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前进，我在阴霾中见到了光明。



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我不再为个人的生活、前途忧愁,我渴望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于是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来。<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即李达所著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杨沫的亲身感受,代表了当年一批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反映了李达著作给青年人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与宣传,还有力地揭穿了反动当局的御用学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嘴脸,因此具有极强的战斗性,被誉为“理论界的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建国以后,李达积极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释,对于人们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达的学术研究,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因此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论入手。以后,他研究哲学、社会、历史、经济、法律、教育、民族等问题,都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决不是纯学术的研究。研究经济问题、民族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研究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是为了给战斗着的革命者提供理论武器。因此,李达在艰苦的环境中,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独到的智慧,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直接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达被毛泽东称之为“真正的人”,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以后,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释,主要也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法论上指导。

总之,从革命者和政治家的角度评价李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首先,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尤其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党的创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二,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他不屈不挠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冲破了反动当局的“文化

---

<sup>①</sup> 杨沫《革命书籍给了我新的生命》,《书林》1979年第1期。

围剿”，影响了一大批要求进步的青年人；其三，李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成果为推动正在实践中的中国革命起着积极的作用。李达的学术活动，紧紧联系着他的政治理想，并直接为着中国的政治实践服务。鲁迅曾评价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以此来评价李达也是十分贴切的。而且，李达的学问，一刻也没有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程度，是评价其学术地位的重要尺度。

## （二）作为教育家的李达

李达早年曾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这一点与毛泽东极为相似。毛泽东早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深信“以教育为主脑”之说，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和挽救国家民族的首要工作。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礼记·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基础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必重教学。以后，虽然李达、毛泽东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教育救国”的空想，但是，李达的学术活动紧密地联系于他的教育工作，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也一直有着特殊的关怀。

李达最早的教学实践大约是1920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中教授日文。建党以后，1922年2月，李达担任了党所领导的平民女学的负责工作，并教授代数，还重点讲授妇女解放问题。1923年秋，李达脱党后，应毛泽东之邀，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此后，他的生涯就与教学有了不解之缘，先后在长沙、武昌、上海、北平、桂林、广东坪石等地大学任教，是著名的红色教授；在避难家乡时，还曾创办辅仁小学；建国以后，先后担任了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长。

李达是著名学者,又是著名教授。他擅长教学,这在听过他讲课的人中是有口皆碑的。他讲课,“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像一篇精彩的论文。”<sup>①</sup>有一次他带病上课,面戴大口罩,他在黑板上写了“哑子讲课,以笔代口”,然后边擦边写,两节课写个不停,显示出高度的思维能力和飞快的板书本领。李达是最叫座的教授,这固然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子中的崇高地位,但是,也与他的教学水平分不开的。作为红色教授,他培养了大批革命者,也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李达又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1922年,他主持平民女学,就尝试新的办学方法。他指出平民女学有三个特点:

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

三、为一般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sup>②</sup>

李达把平民女学看成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他主持平民女学,追求的是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与生活劳动的结合、改革机械的注入式教育而要求体现个性的自由教育。李达初期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毛泽东多有吻合之处。以后,毛泽东经过长期酝酿而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比较了现代学校与古代书院,指出了学校的弊端。他说: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

---

<sup>①</sup> 尹进《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武汉大学学报》第1981年第1期。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129页。

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sup>①</sup>

毛泽东认为,在“研究的形式”上,湖南自修大学要克服学校的弊端,而取古代书院之长,追求“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学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在“研究的内容”上,则要取现代学校之长,专用科学。而且,湖南自修大学与现代学校和旧式书院的根本区别,则是采取“平民主义”,“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目的则在于“改造社会”。上述内容是毛泽东早年教育改革思想的基本纲领。由于李达与毛泽东在这方面意气相投,因此,湖南自修大学一经创办,毛泽东即邀李达主持、任学长。李达也就此走上了教学的生涯。但是,湖南自修大学开办未及一年即被军阀赵恒惕封闭,毛泽东、李达的教育改革思想没有充分实施。以后,李达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由于主要的不是一个教育管理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也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

李达教育思想的体现与实践当在建国以后,在他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时期。建国以后,李达所以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反映了他热切地希望实践其教育改革思想

---

<sup>①</sup> 《新时代》第1卷第1号,1923年4月10日。



的夙愿,是他早年“教育救国”理想的延伸。所以,他在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他在致吕振羽的信中,邀吕与他一起来办湖大,要赶上北大和清华。<sup>①</sup>这样,1950年2月,李达作为校长来到了湖南大学,3年以后,又转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湖大的3年和武大的13年,这16年的教育管理实践,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旧学校改造,经历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启迪意义。这里集中讨论李达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校观、一个是教学法思想。

关于学校观。在平民女学和湖南自修大学时期,李达、毛泽东把学校直接作为走向新社会的第一步,要求学校与社会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使得“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这一理想,毛泽东始终不渝。1958年推动了“教育革命”,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学校办工厂、农场、厂矿企业办学校。但是,如果走向极端,过分注重实践而忽视理论知识、过分注重生产技术而忽视基础科学,将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相当的灾难,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科大学被停办,要求直接融入社会,理工科要走“七二一”大学模式,注重实用技术,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sup>②</sup>显然,毛泽东仍把学校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战场,以后他提出的“五七指示”所描述的新社会的图景是与学校紧密相联的。

李达吸取了湖南自修大学时期的一些思想,例如在湖大时,他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自然工程技术科学要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但是,根据建

<sup>①</sup> 1950年7月24日致吕振羽信,《文献》1980年第4辑。

<sup>②</sup> 参见丁晓强《毛泽东与传统教育思想》,《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第424—50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国后的实际,他并没有全盘固执于自修大学时期的理想,在湖大时,他就提出,人民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造就高级建设人才”;<sup>①</sup>到武大后,他又明确指出,综合性大学和其他专科性高等学校任务不同,重点不是培养技术方面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材,而要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材。<sup>②</sup>在总结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李达强调了大学是“最高学府”。<sup>③</sup>提出大学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教学要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sup>④</sup>“一个中心、两个结合”,首先是以教学为中心,生产劳动、社会活动都不能冲击教学秩序,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国语的教学;第二是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他认为重点大学既是教学机构又是科研机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是相辅相成的,他极重视抓学校的科研工作,并身体力行,他把能否多出学者看成是学校办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sup>⑤</sup>关于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他指出,从1960年以来,我们总结了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如何调整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教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sup>⑥</sup>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前提下,安排适当的劳动和社会活动,而最根本的是在于要使教学与科研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他对某些系热衷于办工厂、做生意提出了明确的批评。<sup>⑦</sup>

在教学法与师生关系等问题上,李达吸取了自修大学时期的一些思想。他在湖南大学时就提出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彻底革新,

① 李达《在学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摘要》,1951年4月23日《人民湖大》。

② 《李达在武汉大学国庆典礼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53年10月。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5页。

④ 《李达在武汉大学第二届党代会的开幕词》,1959年11月。

⑤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7页。

⑥ 李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1963年11月15日。

⑦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4页。

首先要做到自学、集体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并以自学为主;要师生互助、教学相长、加强教师与学生间的联系;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精简课程。上述原则,他在1963年做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报告中又做了重申。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他在同助手、教师乃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采取平易近人的态度,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对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发动学生、助教与专家、教授“打擂台”、“大编教材”等做法,李达始终是抵制的。他认为这种做法把师生关系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助教可以做系主任、做教研室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sup>①</sup> 他特别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武汉大学目前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是师资水平与教育水平的矛盾,<sup>②</sup> 他提出了要在十年以内“涌现出一批名教授”的任务,<sup>③</sup> 他经常讲,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因此,他特别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到处招贤纳士。

由此可见,李达是一个深有造诣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正与发展,他强调高校是教学与科研的中心,强调学术水平与师资力量是高校发展的生命力,强调高校建设要以国内外一流大学为目标、赶超先进水平,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建设仍具有启迪意义。中国传统的学者往往是学者与教育家一身二任,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也往往联系于他的教育成就——学术传人,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家,李达可说是“桃李满天下,人材遍域中”,所以,在评价李达的学术地位时,是不能不提到他作为教育家的成就的。

①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3页。

②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5页。

③ 《李达文集》第4卷,第728页。

### (三) 作为学问家的李达

李达是个学者,是个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的哲学不是远离社会的抽象的思辨的玄学,它要说明社会而且要改造社会,因此,在哲学的基础上,他还涉猎了人文社会科学多方面的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等等,且都有所建树。由于上述学科是李达哲学思想的具体延伸,所以,由此亦可见李达哲学研究的造诣。以下我们主要就经济学、史学与法学,评析李达的学术建树。

在30、40年代,李达又以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著称。他主要的经济学著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并发表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李达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最全面地阐述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大纲》是李达经济学著作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当时是一流的。在李达之前,已有一些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问世,例如,有陈启修的《经济学原理十讲》(1932年)、《经济学讲话》(1933年)和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等,但是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理解与把握,与李达的《经济学大纲》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例如,李达在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严谨地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体系,并且,由于李达哲学功底的深厚,他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经济学原理,从而构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该著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回忆说:

1948年下半年,我找到了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的两部讲义：《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我把这两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用心。从此，我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发蒙的一课，李达教授成了我这个领域的发蒙老师。<sup>①</sup>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把握，还使李达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能坚持正确的见解。按照李达的构想，《经济学大纲》不仅要完成先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两部分，还准备撰写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经济两部分，可惜因为战乱，后两部分没有完成。但显然，李达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做了思考的。1959年1月21日，李达针对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了《正确认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等文章和讲话，指出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的观点，是切中时弊的。

第二，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说：“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sup>②</sup>他指出，从来的中国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sup>③</sup>他认为，“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与去迹。”<sup>④</sup>虽然《经济学大纲》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的研究，但是，在此之前，李达根据大量的统计材

① 刘澌源《私淑老师与启蒙老师》，《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② 《李达文集》第3卷，第22页。

③ ④ 《李达文集》第3卷，第24页。



料所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及以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经济史概观》等论文,对中国经济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具体地论证了在《经济学大纲》中提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的联系、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三个互相交错的过程的结论。这在当时是极其突出的。

第三,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具体经济领域,开拓了中国的货币学理论。在30年代,李达所撰写的《货币学概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货币及货币资本与信用制度的理论,系统地分析了货币的本质、职能,批判了各派货币学说,并结合史实剖析了信用及信用货币与资本主义的货币体制,联系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危机的实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金融恐慌和金本位制的崩溃。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著作,就理论的深度而言在国内外都是十分卓越的。

关于李达的史学成就,人们的评述并不多。李达治学,重视史学是他的一大特点。早年,他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撰写了一些研究和介绍国际共运史的文章;在经济学、哲学和法学等研究中,都特别重视经济史、哲学史和法学史等史的研究,并作为各门学科研究的基础。李达主要的不是一个史学家,但是他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又具有重要的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系统地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前面谈到,1926年李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在运用唯物史观解剖社会历史的实践方面,也达到了崭新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努力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规律、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重大



理论问题上,阐述还不甚准确、全面,《现代社会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准确、全面的阐述。而且,《现代社会学》本着“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sup>①</sup>的目的,论证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为以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二,着重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给1929年至1935年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李达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著,也是这一时期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李达根据唯物史观,从中国经济发展出发,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为以后潘东周、吴黎平、王学文等“新思潮派”批判托陈取消派、“新生命派”和“动力派”等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论”等谬论做了先导。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出发,分析了大量史料,论证了中国社会自西周进入初期封建社会,由秦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sup>②</sup>批判了陶希圣等人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和“先资本主义论”的观点,对于吕振羽、邓拓、吴泽等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史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第三,李达的史学思想对于以后我国史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李达治史,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他立足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其研究途径是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例如,1941年,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长篇论文,该文力图“把一切障碍生产力的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6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608页。

发展及不能孕育新生产力的原因,都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sup>①</sup>作者首先从经济史的角度,概括地描述了从西周初年至清代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接着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八个原因:第一是战乱之频繁,封建时代领主的领土战争和农民战争,战乱相寻,造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大破坏;第二是封建的力役,使生产力在平时也要遭受大量的消耗;第三是封建的剥削,使得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单纯的再生产,而剥削者剥削所得则主要用于消费或兼并土地;第四是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使得生产关系狭隘封闭,不能孕育新的生产力;第五是封建的政治机构,集中经济的目的是搜刮“兵刑钱谷”,因而又特别采取重农抑商主义,以维护其经济基础,障碍了新生产力的孕育;第六是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的生产方法,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使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不能发育,农民始终停滞于狭隘的生产关系之中,农民暴动只是封建王朝更替的契机;第七是科学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由于封建社会政治的需要,独尊儒术,儒家只向心性方面下功夫,忽视科学知识;第八是地理环境的影响,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文化发达,与周边民族不存在竞争,也不重视国际通商,所以不能孕育出新的生产力。在上述八个原因中,关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一至五个原因是主要原因,文化与地理方面的五至六个原因是次一级原因。李达的上述分析,以生产力为核心层层推进,有相当的深度。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李达没有简单地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概念出发去赞美农民战争,而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农民的局限性及战乱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二是李达多次强调竞争与开放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他说:

我常有一个假想:假使中国与欧洲之地理的隔绝一直继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1卷,第704页。

续下去,中国社会再过数百年,也许还是停留在封建的阶段中。<sup>①</sup>

李达的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启迪意义。李达的治史思路,直接影响了吕振羽、吴泽等人,从而形成了我国史学界一个注重经济史、社会史的有特色的学派。

李达还在法学领域中有所建树。40年代后期,李达在湖南大学讲授法理学,为此他认真阅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法学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加以研究,撰写了《法理学大纲》。目前流传下来的虽然只有上册(占全书一半),但却是我国法学研究的珍贵遗产。李达的贡献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法理学的对象、任务及其研究方法,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这方面,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曾指出:

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sup>②</sup>

第二,以大量的篇幅,重点剖析了上至古代希腊、罗马,下至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法理学流派。李达以翔实材料论述了各派法理学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背景和基本内容,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各派法理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与各派法理学的界限。诚如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所说:

李达同志的《法理学大纲》是解放前写的,现在看来仍然是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特别是里面的“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703页。

② 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水平。<sup>①</sup>

综上所述,李达作为杰出的政治宣传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的学问基础。他的学术建树是多方面的,尤其在经济学、史学和法学中都有杰出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这些建树,又以他的哲学功底为基础,并且也可以看做是他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延伸,由此也可见李达作为一位哲学大家的风范。

### 三 李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李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前述肖蓬父、许全兴等已做了评述,但失之于简略。我们力求进一步地进行全面分析,使人们对李达的哲学成就有充分的了解,这对于我们当代的哲学发展仍具有意义。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是最重大的事件。在李达去世已30多年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与李达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李达的贡献有三个方面:最全面地总结了唯物史观的传播;最有力地推动了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在学理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第一,最全面地总结了唯物史观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内容而言,首先传播的是唯物史观,以后是唯物辩证法,在此基础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五四”运动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著名的学者是李大钊。1919年,李大钊首先在《新青年》第6卷第5、6两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首先阐明了经

<sup>①</sup> 《法理学大纲·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其次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三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意义。这是较早对唯物史观的较系统的介绍。到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课而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其中包括《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11篇文章,集中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史学和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到1924年,李大钊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史学要论》。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不仅注重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武装人们的头脑,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指导研究历史和改造中国社会,这是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特点。

另一个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代表是瞿秋白。1923年秋,瞿秋白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等课程,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sup>①</sup>也较集中地宣传了唯物史观。瞿秋白从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简要地论述了生产力是社会最后的根柢的原理,并根据这一原理,讨论了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等上层建筑,他还专门阐述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重视社会形态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社会的“过渡形式及复合形式”。瞿秋白论述唯物史观过程中,转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哲学史和当时思想界的斗争进行了发挥。在当时尚无《反杜林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中译本,瞿秋白的阐述是很有意义的。

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五四”运动以后,李大

---

<sup>①</sup>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钊、李达和李汉俊三李并称。如前所述,李达重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并在建党前后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论战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将。同时,他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也是重视的,他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原则之首。<sup>①</sup> 1918年至1920年他所译的三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就有《唯物史观解说》。该书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书中还附有《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一文,在扼要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同时还翻译辑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188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这使得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说比较精确。该书至1936年8月共印行14次,表明其影响之大。

李达自1923年至1927年间着重研究唯物史观,1926年出版了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学》一书。该书全面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述了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论述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与内容的深刻性上,《现代社会学》都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阶段的完成。1923年,李达曾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sup>②</sup>《现代社会学》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它所论述的一些理论直接与当时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相联系,这也是《现代社会学》高于其他论著的一个重要方面。曾听过李达讲学的史学家吕振羽认为:

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1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02页。

《现代社会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sup>①</sup>

邓初民在《忆老友李达先生》一文中也首先谈到该书,说该书在大革命时期很流行,“差不多人手一册”。<sup>②</sup>

第二,最有力地推动了唯物辩证法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虽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李达和李汉俊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但是,还没有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理解、研究和宣传。较早提到唯物辩证法的大约是李汉俊,1922年,他在《唯物史观不是甚么?》的长文中说:

辩证法绝不是甚么诡辩,只是进化的思索法,或历史的思索法。换句话说,就是不认世界是静在的死物,认世界是无间断流动的活物。更正确地说,就是认存在是变化或发达底不断的过程。世界本来不是静在的,是无间断、流动的;我们只观察一般的自然,人类底历史,我们自身底智的活动,就可以明白了。没有一件事物是永久深其同形,停在同处,存其同质;没有一件事物不是时常运动,时常变化,时常出现,时常消灭,一切世界没有不是各种关系与各种反动互相错综互相连结的无始无终的大混乱的画面。我们要理解事物,非理解其生死现灭不可。辩证法就是在事物底根本的关系、连系、运

---

①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② 《人物杂志》,1946年第9期。

动、起原、及终结上,理解事物及其表现(即观念)的思索法。<sup>①</sup>他说明了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联系,认为“唯物论者把这种辩证的思索法应用到人类社会底历史底研究,就是‘唯物史观’”,上述论述是较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就唯物辩证法的各项内容展开论述,并且认为唯物史观已不是哲学。

最早较系统地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是瞿秋白。1923年1月,他在批评考茨基时曾指出:

他以“争取政权”与“因贫乏而起的斗争”相对立,实在已经全失马克思主义之“辩证法的唯物论”。这两种斗争只有在动象中流转而互相变成,绝不可分立对待。<sup>②</sup>

这一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概论》,翌年又讲授《现代社会学》,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问题。他指出:“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发展之过程”,运动的动力就在于内在的矛盾,“假使我们研究事物于他们的变易及互动之中,我们就能在事物的属性以外,发现许多重要的原理。第一便是事物之矛盾属性的概念——这是现实的宇宙及社会的‘根本属性’”,“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运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并把矛盾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sup>③</sup>他还解说了“原因论与目的论”、“有定论与无定论”等,<sup>④</sup>对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等范畴进行了介绍。1926年,他还翻译了郭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一书,其中也宣传了唯物辩证法。

---

① 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甚么?》,1922年1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 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1期。

③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上海书店1924年印行。

④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上海书店1924年印行。

可以说,瞿秋白是在中国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思想家。但是,他的介绍还较为简略,大革命失败后,这项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大革命失败以后,怎样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复杂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就显得越来越迫切。1929年以后,李达较集中地进行了唯物辩证法的翻译介绍工作。其中有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又名《辩证唯物论入门》,1929年)、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1930年)、德国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年)、前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雷仲坚合译,1932年)等。上述四部著作的问世,尤其是最后一部著作,是前苏联当时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最新成果,并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因而最全面、最权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李达等人的推动下,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渐成澎湃之势。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张东荪也不得不承认:

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或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sup>①</sup>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介绍,最有力地推动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郭湛波在当时评论说:

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sup>②</sup>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从唯物史观到唯物辩证法,得到了全面的介绍和宣传,同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也就是说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得到了深入。在此过程中,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对

---

①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34页,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版。

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34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的整理与消化,力求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及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适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从列宁阶段向中国化深入,这项工作又是从李达开始的。

第三,在学理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1935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也在学理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全面总结,首先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在30年代以前,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尚没有充分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历史观“具有亲切的不可分离的关联”,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普遍概括,而这种概括必须以辩证自然观与唯物史观为中介环节,所以唯物辩证法在自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就成为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就成为历史唯物论。他说:“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法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sup>①</sup>在《社会学大纲》中,唯物辩证法写了一篇,但占了全书一半的分量;历史唯物论写了四篇,但唯物辩证法贯穿于全书的始终。这样,在《社会学大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次作为完整的有机整体进行全面的阐述,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

其次表现在理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全部认识史的批判继承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是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论争的问题。李达的《社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282页。



《社会学大纲》从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出发,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全部认识史的批判继承关系,尤其强调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批判继承关系,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历史辩证法到自然辩证法,统一于社会实践而创造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学大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首次得到了系统的说明,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再次表现在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在30年代以前,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很少被论及,30年代以后,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李达将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地位,把它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关键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统一基础。在《社会学大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原理首次得到了充分的强调,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

由上可见,《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结性著作,“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sup>①</sup>李达所构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意义深远,在我国哲学界,直至建国以后相当一个时期,仍具有很大的影响。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全面总结,而且在学理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李达的总结,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理解、再阐述,因此也必然带有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作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正是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的风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富有特色的表述。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社会学大纲》的写作,

<sup>①</sup>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6页。

就是为了给战士们提供“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sup>①</sup>因此,密切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全书原拟写六篇,第六篇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内容,虽因故没有完成,但研究大纲和材料等已有了准备。上述因素,促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李达在序言中说:

本书内容,虽没有新的创见,但基于数年的研究,自信还有一些新的收获。<sup>②</sup>

李达结合中国的实际,通过对列宁哲学的说明与发挥,其收获是多方面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阐述。

李达认为,马克思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就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sup>③</sup>在此基础上,李达对认识论予以特别的重视,作了系统的阐发。说明了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提出了感性认识和论理认识的“互相渗透”的见解,论述了思维形式的发展及其和思维方法的关系,并提出了认识论的公式。关于认识论的公式,李达概括为“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他认为认识就是采取这样的圆的运动而发展的。在这个圆的发展过程中,他指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动因。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和依据认识的真理性和积极的变革客观世界。<sup>④</sup>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7页。

<sup>②</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2—5页。

<sup>③</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

<sup>④</sup>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6页。

李达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系统阐述,在学理上初步揭示了实践论的重要理论。

其二,关于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阐述。

李达依据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规律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他规律,是理解其他一切规律的关键。他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又在阐述其他规律和范畴过程中,把对立统一规律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从而构成了辩证法的严谨体系。

李达指出:

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面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sup>①</sup>

从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出发,他阐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和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并指出只有在事物的相互联结上,才能认识事物的矛盾两极。李达说:

偶然性是必然性的显现形态,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秩序而实现;一般内包着个别的特质,个别内包着一般的特质。<sup>②</sup>

唯物辩证法要在相对的东西中认识绝对的东西。<sup>③</sup>

他认为要研究事物的具体矛盾,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他说:

唯物辩证法要求理解一切对象及其一切发展阶段所固有的一般特征,并要求理解特定对象的特定发展阶段上充满矛盾的发展的固有特征。唯物辩证法的任何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谓超越时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决的实例是决不能有的。<sup>④</sup>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5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7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29页。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1页。

这一观点提示了关于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思想。

李达提出了关于“本质矛盾”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要认识事物对象,就要把这个对象分解为许多互相渗透的对立物,在这许多对立物之中会发现一种最单纯最根本的对立物,或最单纯最根本的关系,即本质的矛盾。他说:

这本质的矛盾,必须是对象发展过程中的其他一切矛盾的萌芽。即是说,其他一切矛盾都是从这个本质的矛盾分化出来,并表现这个本质的矛盾的。<sup>①</sup>

这一观点,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要重视主要的矛盾方面的思想。

李达还提出了关于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的观点。他认为:

一切拮抗(或敌对)都是矛盾的发展阶段,而一切矛盾,不必都发展到拮抗的阶段。<sup>②</sup>

这一观点,提示了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思想。

总之,以上观点,初步构成了关于矛盾体系的论述,初步提示了关于矛盾论的重要理论。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阐述。

李达用唯物辩证法贯穿于社会历史领域,在《社会学大纲》中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具有鲜明的特色。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矛盾系统,他说:

社会是包摄生产诸关系的总体,国家形态、法律制度以及一定意识形态的系统,而生产诸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础。同时,基础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内部,又有着极复杂的相互

---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3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0页。

作用。<sup>①</sup>

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李达认为:

一切社会现象的发展,都是内在的对立物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sup>②</sup>

李达把它看作是历史唯物论的主要方法之一。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认为:

这种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敌对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带有颀颀的性质,而在非敌对的社会中,矛盾不至发展为颀颀。<sup>③</sup>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李达设想:

在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虽都是平等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例如制造生产物的工场,一旦获得了新的生产手段,或发见了使用生产手段的新方法之时,原来的劳动组织当然不能与它相适合而非随着改编不可。并且,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一旦被人们所意识之时,要加以改编并不会发生什么阻力,即是说,并不会含有一部分人去反对而另一部分人去拥护的事情。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没有矛盾,那就没有发展了。<sup>④</sup>

李达的这一观点,在1952年发表的《〈矛盾论〉解说》中作了更明确的阐述。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但是这一矛盾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

①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303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397页。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397—398页。



力的性质”，所以，不会发展为对抗。<sup>①</sup> 这一观点揭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理论。

其四，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的阐述。

李达在论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法的时候，论述了这些范畴内涵的技术性与社会性。所谓生产力的技术性，指的是人类与生产手段之物质的内容，社会性指的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的社会的形式；生产关系的技术性指的是各种劳动按技能或组织进行的结合与分割，是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配列以及两者之自然的物理的相互作用，其社会性是指生产过程中人类间因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生产方法的技术性指的是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其社会性指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结合方法。李达认为，技术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而前者是基础，后者决定着前者的发挥程度。就生产力而言，它只有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才有发挥的可能，所以它主要是社会范畴，不是抽象的技术范畴。在此前提下，李达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依存于技术的，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动因，技术依存于科学，科学又称为一般的生产力。而且，如前所述，李达在论述未来新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指出了由于对立的社会关系的消失，新的生产手段和使用生产手段的新方法就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着社会发展。李达的这一观点，通过建国以后的社会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1958年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文中，讨论了生产力的发展根源问题，其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在推动生产力中的作用，指出“科学的本身是一般生产力”，在生产的过程中得到技术的应用就成为“新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

---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4卷，第369—370页。

展的“一个主要原因”。<sup>①</sup>此外,李达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的技术性的说明,实际上强调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去理解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仍具有重要的启迪。

显然,李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总结者,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李达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中介,是列宁阶段走向毛泽东阶段的中介,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作了学理上的准备。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正是他们的理论创造,给在实践中探索的毛泽东等提供了学理上的工具,从而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换言之,倘若没有李达等在学理上的支持,仅仅靠实践中的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创造、并且上升到哲学层次的抽象概括,是难以想像的。事实上,毛泽东等革命实践,一刻也没有离开理论的指导,而毛泽东为了总结实践的经验,又特别重视哲学的学习。由此可见理论思维的重要和学者们勤奋治学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以说,李达在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指出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以往,我们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注重政治领袖们的作用,而忽视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其实,这反映了轻视学术、理论研究的思维定势,把理论研究看作是对政治领袖的意志、观点和思想的诠释,这是极具有害的。现代社会的政治运行,将越来越倚重于学者及其学术理论,忽视学者及其理论创造的政治领袖,无论其个人学识多高,毕竟是有限度的,若一意孤行,其政治实践将十分危险。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

---

① 《李达文集》第4卷,第590—591页。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创造者,李达在建国以后又自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阐述者。1962年他写了《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文,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要有“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然后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点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他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唯物史观,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有所批评。他是反对“顶峰论”的。他在晚年雄心勃勃,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研究,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作出新的建树,毕竟由于年老体弱,又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创造的高峰。

纵观李达的一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所作为。但是,战士本色是学者。他笃志嗜学、卷帙浩繁,在经济学、史学与法学等领域都有开拓性的建树,当然,尤以他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最为显赫。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泰斗,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创造者。由于他的学问紧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其学术影响是其他领域学者所难以企及的。他对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密切联系社会实践的学风,铸就了20世纪的大家风范。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哲人,李达英名永存!

## 附 录

### 李达著述年表

#### 凡 例

一、本编年以年月日为序：凡能确定著译时间者，按著译时间编次；凡已发表、出版者按最初发表、出版的时间编次。

二、目录中著译时间凡属当年者，仅注月日，后来发表、出版的注明年份。

三、李达著译、初版后再版者，在初版条目中注明。

四、新中国建立前，李达著文、署名各异，能确定者，均在各条目中注明。

#### 一九一八年

##### 社会问题总览

1918 年秋至 1920 年夏译。

原著：(日)高畠素之 译者署名：李达

中华书局 1921 年 4 月出版，488 页，至 1932 年 8 月印行 11 版。

##### 唯物史观解说

内有附录两篇：《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和《译者附言》。

1918 年秋至 1920 年夏译。

原著：(荷)郭泰 译者署名：李达

中华书局 1921 年 5 月出版，134 页，新文化丛书之一，至 1936 年 8 月印行 14 版。

#### 马克思经济学说

1918 年秋至 1920 年夏译。

原著：(德)柯祖基(考茨基) 译者署名：李达

中华书局 1921 年出版。

### 一九一九年

#### 什么叫社会主义

载 6 月 18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出版，下同)。

#### 社会主义的目的

载 6 月 19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之情形

载 6 月 20—23、26、30 日，7 月 1—3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

#### 陈独秀与新思想

载 6 月 24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女子解放论

载 10 月《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3 号，署名：李鹤鸣。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张东荪现原形

11 月 6 日作，载 11 月 7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



名:江春。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一九二〇年

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

载11月7日《共产党》第1号,署名:胡贤。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劳动者与社会主义

载11月28日《劳动界》第16号,署名:立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劳工神圣颂

载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署名:H.M.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社会革命底商榷

载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署名:江春。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马克思还原

12月26日作,载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5号,署名:  
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一九二一年

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

原著:(日)山川菊荣 译者署名:李达

载4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

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

原著:(日)佐野学 译者署名:李达

载4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

“全欧共产党及独立社会党之联席会议”等 30 则世界消息

载 4 月 7 日《共产党》第 3 号,署名:江春。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4 月 8 日作,载 5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日本文坛之研究

原著:(日)宫岛新三 译者署名:李达

载 4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4 号。

“五一”运动

载 5 月 1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节纪念号,署名:  
江春。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原著:(日)山川均 译者署名:李达

载 5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文学小辞典(《神秘》、《古典主义》等)

载 5 月 1、13 日,6 月 6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  
鹤。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载 5 月 7 日《共产党》第 4 号,署名:江春。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唯物史的宗教观

原著:(荷)Hermann Gorter 译者署名:李达

载 5 月 15 日《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11 期。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6 月 2 日作,载 6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2 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列宁的妇人解放论

译自列宁《劳农俄罗斯中劳动的研究》，附译者注、译者署名：  
李达。

载6月《新青年》第9卷第2号。

### 现代的斯干底那维亚文学

原著：(日)生回春月 译者署名：李达。

载6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

### 女性中心说

原著：(日)堺利彦 译者署名：李达。

商务印书馆7月出版，1923年3月再版，112页，1937年6月  
国难后第1版，1942年11月3版。

译者序言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

原著：(日)山川菊荣 译者署名：李达。

载7月《新青年》第9卷第3号。

### 德国文学研究

原著：(日)片山孤村 译者署名：李达。

载8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

### 人民出版社通告

载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

### 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

载9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7期，署名：  
鹤鸣。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社会主义的妇女观

原著：(日)山川菊荣 译者署名：鹤鸣。

载10月5、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10、11  
期。

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

载10月12、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11、12期,署名:鹤鸣。

本文前半部分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马克思经济学说

原著:(德)柯祖基(考茨基) 译者署名:李达。

中华书局1921年出版。

## 一九二二年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载1—2月《先驱》第1、2期,署名:李特。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李卜克内西传

载1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李特。

收入《李卜克内西纪念》(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和《李达文集》第1卷。

平民女学是到社会的第一步

3月5日作,载上海《妇女声》3月第6期,署名:鹤鸣。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说明本校工作部之内容

载上海《妇女声》3月第6期,署名:鹤。

绅士军阀与妇女解放

载3月《妇女杂志》第7卷第6号,署名:鹤鸣。

评第四国际

4月22日作,载7月《新青年》第9卷第6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

载5月《先驱》五一纪念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劳农俄国研究(编译)

商务印书馆8月出版,377页,至1926年12月印行4版。署名:李达。

劳动立法运动

载9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李达。

日本政党改造之趋势

载9月13日《向导》第1卷第1期,署名:李鹤鸣。

女权运动史

载9月20日,10月4、18、25日,11月1、8、15、22日,12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59、61、63—68、70期,署名:李鹤鸣。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产儿制限论

原著:(日)安部矶雄 译者署名:李达。

商务印书馆10月出版,141页,1928年8月再版。

译者绪言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一九二三年

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

原著:(德)马克思 译者署名:李达。

载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1号。

何谓帝国主义

载刊同上,署名:李达。《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2期转载。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

载刊同上,署名:李达。《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五七特刊”,《救国》第2期“五七特刊”转载。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5月13日作,载5月15日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1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旧国会不死 大盗不止

载7月15日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4号,署名: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脱了牙的狼(评述小说)

载7月15日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4号,译述者署名:李达。

社会主义与江亢虎

载8月14—19、21日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

载11月5日《湘报》,署名:李达。

### 一九二四年

中国关税制度论

原著:(日)高柳松一郎 译者署名:李达。

商务印书馆1924年10月出版,296页,至1927年印行3版,1933年作为“经济丛书社丛书”之五,再次出版。

### 一九二五年

致友人人社会学系事

载5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鸣。

## 一九二六年

现代社会学

署名：李达。

湖南现代丛书社 1926 年 6 月出版，328 页。上海昆仑书店 1928 年 11 月出版修订版，1929 年出版改正 3 版，至 1933 年共印行 14 版。

《李达文集》第 1 卷收入部分：序，第二章，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至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二、三节，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十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十七、十八章。

## 一九二八年

中国所需要的革命

载 7 月 16 日《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2 号，署名：李达。

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

载 9 月《双十月刊》第 4 期，署名：李达。

法理学大纲

原著：(日)穗积重远 译者署名：李鹤鸣。

商务印书馆 11 月出版，161 页，1933 年 4 月新 1 版，1935 年 1 月新 2 版。

## 一九二九年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署名：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 1 月出版，216 页。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

原著:(日)山川菊荣 译者署名:李鹤鸣。

上海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月出版,180页。

### 社会科学概论

原著:杉山荣 译者:李达 钱铁如

上海昆仑书店3月出版,240页,1932年6月第6版,至1935年印行8版。

### 社会之基础知识

署名:李鹤鸣。

上海新生命书局4月出版,122页,为该书局“社会科学常识丛刊”第四种,1932年10月再版。

《李达文集》第1卷收入部分:小引,第一篇,第二篇第一章,第五篇。

### 民族问题

署名:李达。

上海南强书局9月出版,82页,为该书局“新社会科学丛书”第二编。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 现代世界观

原书名为《辩证唯物论入门》。

原著:(德)塔尔海玛 译者署名: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9月出版,254页,12月3版,1934年9月7版,1942年2月新版重印。

## 一九三〇年

### 农业问题之理论

原著:(日)河西太一郎 译者署名: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1月出版,274页。

### 经济学批评

原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原著:(德)马克思 译者署名:李达。

上海昆仑书店1月出版。

### 经济学入门

原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据日译本改名。

原著:(俄)米哈列夫斯基 译者署名:李达。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4月出版,438页,1932年再版。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又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

原著:(日)河上肇 译者:李达等。

译者:李达 王静 张栗原 钱铁如 熊得山 宁敦午

上海昆仑书店6月出版,402页,11月第2版,1938年重印。

### 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原著:(德)卢波尔 译者署名:李达。

上海心弦书社10月出版,390页,1938年4月再版。

### 上地经济论

原著:(日)河田嗣郎

译者:李达 陈家瓚

商务印书馆10月出版,516页,“大学丛书”之一,1933年8月再版。

## 一九三二年

### 政治经济学教程

原著:(苏)拉比托斯 渥斯特罗维查诺夫

译者:李达 熊得山

上海笔耕堂书店4月出版,595页,1933年9月再版,1936年4月第3版。

###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著：(苏)西洛可夫 爱森堡等

译者：李达 雷仲坚

上海笔耕堂书店 9 月出版，586 页，1935 年 6 月第 3 版，1936 年 12 月第 4 版。

### 一九三四年

####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序

4 月 10 日作，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一九三五年

#### 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

载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5 月《法学专刊》第 3、4 期合刊，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序

7 月作，署名：李达。

#### 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

载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9 月《法学专刊》第 5 期，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 1 卷。

####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

载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9 月《法学专刊》第 5 期，署名：李达。

#### 社会进化史

署名：李达。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892 页。

《李达文集》第 1 卷收入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社会学大纲

署名：李达。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544页。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854页，至1939年4月共印行4版，1948年、1949年新华书店翻印出版。

编入《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

### 一九三六年

唯物辩证法对象

载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学专刊》第6期，署名：李达。

辩证法的几个法则

载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学专刊》第7期，署名：李达。

逻辑的根本原理

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1期，署名：李达。

逻辑大意

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3期，署名：李达。

经济学大纲

署名：李达。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71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510页。

编入《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 一九三七年

文化运动在北平

本文为记者的采访录。

载2月《读书月报》第2号。

经济问题之处理方法

收入《政治经济问题之处理方法》（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7年

3月刊印)。

辩证法的唯物论问答

上海进化书店7月出版,1938年1月再版。

署名:李达

一九三八年

世界史教程

李达与人合译,笔耕堂书店4月出版,分五册装订。

一九三九年

形式逻辑扬弃问题

载8月《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2期,署名:李达。

一九四一年

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

载9月6日《文化杂志》第2号,署名:李达。

收入《李达文集》第1卷。

一九四四年

8月,湖南零陵沦陷,为躲避日军追捕,李达被迫背井离乡。逃难途中,李达遭土匪洗劫,所撰手稿全部失落。

一九四七年

法理学大纲

署名:李达。

湖南大学分上、下两册刊印,后书稿散失。法律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残存的上册。

《李达文集》第1卷收入部分;第二篇第五章,第三篇第一章,

第三篇第二章(部分)。

### 一九四八年

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署名:李达。

本书为李著《经济学大纲》第1分册。

香港生活书店1月出版,196页。

新社会学大纲

署名:李达。

本书为李著《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论部分(第二篇至第五篇)。

香港生活书店2月出版,476页,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

### 一九四九年

唯物辩证法(《社会学大纲》第一篇)

新华书店5月翻印发行,386页。

历史唯物论序说(《社会学大纲》第二篇)

新华书店5月翻印发行,80页。

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学大纲》第三篇)

新华书店5月翻印发行,155页。

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学大纲》第四篇)

新华书店5月翻印发行,128页。

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学大纲》第五篇)

新华书店5月翻印发行,67页。

货币学概论

30年代完成书稿大部。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7月出版,452页。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再版。“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

编入《李达文集》第3卷。

#### 李达自传

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前所撰。

1980年第5期《新时期》以《党的一大前后》为题首次公开发表其部分内容,该部分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下同),《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刊登自传节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 从共同纲领推测新宪法的轮廓

11月在中央政法大学所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

#### 人民“湖大”的工作方向

载3月《人民湖大》创刊号。

#### 做一个光荣的劳动知识分子

载3月19日《人民湖大》第2期。

#### 自然科学与政治

载3月26日《人民湖大》第3期。

#### 社会发展史

又名《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

湖南大学1951年刊印,173页。

该书《绪论》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 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

载5月10日《人民湖大》第5期。

####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

载5月17日《人民湖大》第6期。

#### 为保卫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奋斗

载7月27日《人民湖大》第17期。

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

载 10 月 1 日《人民湖大》第 25 期。

办好毛泽东故乡的大学这是我们最光荣的任务

载 10 月 12 日《人民湖大》第 27 期。

在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演词

载 10 月 19 日《人民湖大》第 28 期。

拥护伍修权在安理会上的发言

载 12 月 5 日《新湖南报》。

### 一九五一年

在现有的学习基础上胜利前进

载 1 月 1 日《人民湖大》第 38 期。

关于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

载 1 月 16 日《学习》第 5 卷第 2 期。

《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

载 2 月 1 日《人民日报》，《新建设》第 3 卷第 5 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实践论》解说

载 3—6 月《新建设》第 3 卷第 6 期，第 4 卷第 1—3 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协助政府贯彻实施《惩治反革命条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载 3 月 19 日《人民湖大》第 49 期。

新民主主义的——五四运动

5 月 4 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纪念“五四”与订立爱国条约

载 5 月 9 日《人民湖大》第 56 期。

怎样学习《实践论》

载 6 月 5、19 日《人民湖大》第 59、61 期。



武训是个反动派

载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

怎样学习《实践论》

载 7 月《新建设》第 4 卷第 4 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二周年而作

载 7 月 2 日《长江日报》。

《实践论》解说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月出版,181 页,1952 年重排第 4 版,至 1978 年 4 月,印行 6 版。1979 年 4 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哈萨克文本。

《实践论》学习提纲

载 8 月 14 日《人民湖大》。

读毛泽东同志 1926—1929 年的四篇文章

载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人民周报》第 36 期,9 月 3 日《长江日报》(题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光辉范例》)。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怎样学习党史

载 9 月《新建设》第 4 卷第 6 期,9 月 12 日《长江日报》全文转载。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

载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关于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

载 11 月《学习》第 5 卷第 2 期。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载 11 月 9 日《人民湖大》第 74 期。

努力思想改造 积极参加上改

12月7日在湖大校务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摘要刊登在12月17日《人民湖大》第78期上。

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载武汉《新青年报》第127、128期,《人民湖大》第81期全文转载。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 一九五二年

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必须结合思想改造

载3月24日《长江日报》。

关于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

载4月13日《人民湖大》第87期。

从湖大“三反”运动的进展说到思想改造

载5月23日《人民湖大》第98期。

纪念“六·二五”两周年

载6月18日《人民湖大》第103期。

《矛盾论》解说

载《新建设》7月—12月号,1953年1月号。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纪念“七一”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载7月1日《人民湖大》第104期。

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载《新建设》8月号。

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写于湖南大学。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湖南自修大学是训练干部的学校

是年冬李达与苏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的谈话稿。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改造思想要展开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读了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张东荪《读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后

1952年作(未刊稿)。

### 一九五三年

高举斯大林的旗帜前进

载3月16日《长江日报》。

在武大教师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动员会上的报告

载5月9日《光明日报》。

关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问题

4月作。

《矛盾论》解说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7月出版,328页,至1978年4月印行六版。

《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收入《新建设》杂志社1953年出版的《学习〈矛盾论〉》第二辑。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怎样学习《矛盾论》

载11月4日《新武大》第99期。

《矛盾论》——中国革命的辩证法

1953年作。

### 一九五四年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高等学校工作的灯塔

载1月1日《长江日报》。

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封信

2月23日作。

部分内容以《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为题收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谈宪法

载《新建设》6月号。

中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单行本,25页。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拥护宪法 学习宪法

6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载6月28日《新武大》第123期。

热烈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

载7月2日《长江日报》。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学习《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及有关的几个文件的体会

载7月26日《长江日报》。

我国宪法是人民革命胜利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

载8月2日《人民日报》。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载《新建设》10月号。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里程碑——出席第一届人大的感想和体会

载11月15日《长江日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真理论

为武汉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编写的讲义。

武汉大学 11 月刊印。

胡适政治思想批判

载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

联共的伟大成就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意义

1954 年作。

谈谈翻译

1954 年作。

武汉地区高校马列主义基础教学经验讨论会开幕词、闭幕词。

1954 年作。

## 一九五五年

胡适思想批判

载《新建设》1 月号。

胡适反动思想批判

湖北人民出版社 1 月出版,73 页,同年 3 月再版。

胡适学术思想批判

载 1 月 3 日《长江日报》。

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载《长江文艺》2 月号。

列宁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缔造者——庆祝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

载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论共产主义道德

载 4 月 16 日《新武大》。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

6 月发表。

提高警惕 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载 6 月 30 日《长江日报》。



提高警惕 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

载《长江文艺》第7期。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8月2日作。

收入《“一大”前后》(二)。

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

载12月《哲学研究》第4期。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出版单行本,36页。

### 一九五六年

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的总结

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期,并转载于前苏联《东方杂志》5月号。

谈“百家争鸣”

载6月13日《长江日报》。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

湖北人民出版社7月出版,29页。

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

载9月3日《长江日报》。

唯物主义与唯心论的斗争

物质第一性与意识第二性

唯物辩证法是彻底的物质一元论

唯物辩证法是共产党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反映论

以上为李达给武汉大学哲学系所撰讲稿。

9月作。

纪念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载 11 月 19 日《新武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

人民出版社 11 月出版,245 页。

《李达文集》第 4 卷收入部分:第一章,第二章。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问题的讨论

载 12 月 12 日《长江日报》。

### 一九五七年

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6 页。

怎样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2 月作。

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给应届高中毕业同学的一封信

载 5 月 6 日《新湖南报》。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

载《学习》第 21 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 一九五八年

开辟哲学社会科学的战场——《理论战线》发刊词

载 1 月《理论战线》第 1 期。

历史唯物主义序论(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一章)

载刊同上。

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

载刊同上。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

载3月《理论战线》第2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二章)

载刊同上。

部分内容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题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徐懋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载刊同上。

整风运动的辩证法

载5月《理论战线》第3期。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四章)

载5、8月《理论战线》第3、5期。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载8月《理论战线》第5期。

我国现阶段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载6月18日《学习》第12期。

收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七一回忆

载7月《七一》创刊号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论(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五章)

载9、10月《理论战线》第6、7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 改正学风、教风和文风

载11月《哲学研究》第7期。

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三章)

载11、12月《理论战线》第8、9期。

## 一九五九年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六章)

载1、2月《理论战线》1—2期合刊。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正确认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载1月29日《光明日报》。

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1月21日在中共武汉大学第二届党代  
会上的讲话)

载2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期。

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载《七一》1959年第3号,3月15日《长江日报》。

建设新的师生关系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而共同奋斗

载2月10日《新武大》第296期。

由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七章)

载3、4、6月《理论战线》第3、4、6期。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问题

载4月2日《人民日报》。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从分离必然走向结合

载4月3日《人民日报》。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在全国二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

4月作。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为纪念“五四”运动四  
十周年而作

载5月《理论战线》第5期。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五四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载 5 月《中国青年》第 9 期。  
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  
载 7 月《七一》第 7 期。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八章)  
载 8 月《理论战线》第 8 期。  
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  
9 月作。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前进  
载 11 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 9 期。  
在湖北省哲学教科书编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2 月 19 日作。

#### 一九六〇年

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  
载 1 月 1 日《新武大》。  
努力学习、学以致用  
载 1 月 4 日《人民日报》。  
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载 1 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 1 期。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1960 年作。

#### 一九六一年

谈办好高等学校问题  
本文为 1961 年至 1963 年李达在几次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  
收入《李达文集》第 4 卷。



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载7月《中国青年》第13—14期合刊。

给余志宏同志的信

8月26日作,《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1年第1期公开发表。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载《江汉学报》第4期。

### 一九六二年

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载2月2日《光明日报》。

收入《李达文集》第4卷。

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载《江汉学报》第12期。

### 一九六三年

团结一致,增强信心,鼓足干劲,迎接新的胜利

载1月1日《新武大》。

在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

12月11日作。

### 一九六五年

唯物辩证法大纲

为计划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下半年脱稿,并铅印了少量稿本。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出版。

## 一九六六年

8月24日,李达逝世。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3月出版。

李达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80年7月出版。

李达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2月出版。

李达文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84年9月出版。

李达文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出版。

## 李达研究参考文献目录

### (一)有关论著、文集

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

郭湛波著 北平人文书店 1935 年 11 月出版。

李 达(附李达著译目录)

《李达文集》编集组撰。

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 6 月出版。

李 达

宋镜明、熊崇善著

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出版。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

武汉大学出版社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

该书是纪念李达诞辰九十五周年的论文集,共收入文章 48 篇,具体篇目见目录第二部分。

李达传记

宋镜明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4 月出版。

李 达

王炯华撰

载《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略》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3 月出版。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王炯华著

华中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

李 达

陶德麟、洁人撰

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李 达

段启咸撰

载《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李 达

王炯华撰

载《当代中国十哲》,华夏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续集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等编。

湖南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该书为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收录论文的具体篇目  
参见目录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哲学史

许全兴、陈战难、宋一秀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

丁晓强撰

载《20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青岛出版社1992年出版。

李达研究

何继良撰

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二)文章

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

茜萍 1935年1月28—30日《世界日报》。

忆老友李达先生

邓初民 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9期。

李达教授访问记

影农 1947年3月23日《湖大学生旬刊》第2号。

李达同志遗著《〈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再版

1978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系统解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本好著作——介绍李达同志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

武汉大学哲学系 1978年10月3日《湖北日报》。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教材——评介李达同志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1978年11月1日《湖北日报》。

珍贵的文献 亲切的教导——重温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石曼华 陶德麟 1978年《哲学研究》第12期。

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

陈力新、李梅彬 1978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197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1979年1月《红旗》第1期。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冯契 1978年12月28日《文汇报》。

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

李其驹、陶德麟等 1979年《中国哲学》第1辑。

《学人访问记》的回忆

逸文 1979年《新闻研究资料》第1辑。

两种根本对立的真理标准

徐少锦 1979年3月13日《陕西日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重温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其驹、陶德麟等 1979年《江汉论坛》第1期。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侯外庐 1979年《哲学研究》第1期。

忆李达同志

尹世杰 1979年《新湘评论》第3期。

《共产党》月刊与李达同志

李其驹等 1979年7月2日《光明日报》。

李达传略

《李达文集》编辑组 《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

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同志

宋镜明 1980年7月9日《长江日报》。

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李达同志

段启咸 1980年《新湘评论》第11期。

不屈的理论战士——李达

宋镜明 1980年12月22日《长江日报》。

中共建党前后的李达

唐之人 1980年《南北报》116期。

李达和毛泽东

唐之人 1980年《南北报》117期。

也说李达

吴闻 1980年《南北报》118期。

纪念和怀念李达同志——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

海波、王鲁 1981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纪念李达老校长”专栏)。

李达著作历险记

武达功 1981年1月7日《湖北日报》。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同志——为《李达文集》第2卷出版而作

《李达文集》编辑组 1981年《红旗》第1期。

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熊崇善 1981年《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期。

李达年表

宋镜明 刘捷 1981年《江汉论坛》第3期。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

曹瑛 198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李金奎等 1981年《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李达与湖南的和平解放

陈力新等 1981年5月13日《湖南日报》。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李达

陈纪鸾 1981年5月15日《新疆日报》。

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革命老人王会悟谈李达同志

李梅彬等 1981年6月17日《湖南日报》。

李 达

宋镜明 1981年6月19日《长江日报》。

李达早期的爱国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宋镜明 1981年《楚晖》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重读李达的《社会革命底商榷》

李其驹 熊崇善 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增刊。

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李达的早期活动

李其驹 1981年《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第1期。

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李达的建党活动

李其驹 载刊同上 1981年第2期。

迈出可贵的步伐——李达在1922至1927年期间的理论活动

李其驹 载刊同上 1981年第3期。

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

李其驹 载刊同上 1981年第4期。

李达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山鱼 1982年《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李达在建党时期传播唯物史观的贡献和特点

熊崇善 1982年《华中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期。

我国早期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优秀著作——读李达同志《现代社会学》

王炯华 载刊同上 1982年第1期。

关于李达同志情况的更正

胡华 198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发现

《李达文集》编辑组 1982年《哲学研究》第3期。

### 《李达年表》史实辨证

唐春元 1984年《江汉论坛》第4期。

### “五四”前后李达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贡献

唐春元 1984年《零陵师专学报》(社科版)第2期。

### 从一个侧面看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若干历史特点——李达同志在1918年至1926年期间的理论贡献

熊崇善 收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献珍 1984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

### 李达传略

陶德麟 《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

### 李达在湖南大学的学术成就及革命功绩

宋镜明 1985年《岳麓书院通讯》第1期。

### 李达主要著译目录

宋镜明 1985年《图书情报知识》第4期。

### 李达早期在湖南的理论宣传活动

宋镜明 1985年《江汉论坛》第9期。

### “一大”情景回顾——王会悟谈筹备“一大”的有关情况

蒋曙晨 1985年《瞭望》第26期。

### 继前贤革命风范——纪念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

刘道玉 1985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

###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重要著作——纪念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印行五十周年

王炯华 1985年《江汉论坛》第9期。

### “忠实于真理”——李达同志的最高准则

宋镜明 1985年10月3日《湖北日报》。

李达在零陵活动片断

蒋良金 1985年《湖南党史通讯》第11期。

开辟草莱的人

吉少甫 1985年《出版工作》第12期。

李达著作、生平研究参考文献

宋镜明 1986年《图书情报知识》第1期。

李达与出版工作

熊崇善 1986年《出版史料》第6辑。

武大召开李达学术思想讨论会

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建国后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唐春元 1986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期。

李达学术讨论会综述

段启咸 1986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

略论李达在近代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

师宗哲 1987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第2期。

李达录冯玉祥诗墨迹

于志恭 1987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李达与五四时期思想大论战

宋镜明 1987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赵德志 1987年《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序

杨献珍 1987年《社会科学评论》第11期。

光辉业绩 永垂青史——评宋镜明著《李达传论》

姜平 1988年《史学月刊》第3期。

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论战

吴元钊 1988年《史学史研究》第4期。



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

王元慎 1989年《中华英烈》第1期。

李达与程潜起义

欧阳敏讷 1989年《人物》第5期。

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桂遵义 1990年《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第3期。

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

赖相恒 1990年《现代哲学》第3期。

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

叶汝贤 1990年《现代哲学》第3期。

孜孜不倦探真理: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光辉的一生

金英豪 1990年《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

略论李达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李少白 1991年《高等教育研究》第1期。

北京等地理论界集会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

1991年《哲学动态》第1期。

在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胡绳 1991年《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

本文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李达》为题,收入胡绳著《先贤和故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略论建党前后李达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李振纲 1991年《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李达在早期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贡献

曾庆意 1991年《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第2期。

李达早期社会主义观:为纪念诞辰100周年而作

谭双泉 1991年《湖南师大学报》第3期。

论李达的学风和信念

胡敏中 1991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第3期。

论李达对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张喜阳 1991年《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第3期。

试论李达的道德论

刘伏海 1991年《湖南师大学报》第4期。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历史作用

杨印国 1991年《南开学报》第4期。

李达论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

谭献民 1991年《湖南社会科学》第4期。

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及伟大意义：纪念李达诞辰一〇一周  
周年

尹进 1991年《经济评论》(武昌)第5期。

青春的脚步：记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宋镜明 1991年《名人传记》第11期。

李达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徐晓林 1992年《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李达的功绩将永载史册——读《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

王玄武 1992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

毛泽东与李达

宋镜明 1993年《党史天地》第1、2、3期。

李达三次入党始末

许瑞凤 1995年《党史文汇》第3期。

李达回乡轶事

唐孝曾 1995年《名人传记》第5期。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收入以下文章：**

推荐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李达同志主编的《唯物辩证法  
大纲》评介

金春峰 汤群英 原载1978年8月25日《光明日报》

“两论解说”重印发行有感

艾军 原载 1978 年 11 月 1 日《湖北日报》

缅怀李达老师

东方既白 原载 1978 年 11 月 5 日《光明日报》

反对“顶峰论”遭了大灾难——李达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真相

石曼华 原载 1978 年 12 月 12 日《光明日报》

此身莫向沟中殒 犹上文坛作老军——追念我的父亲李达同志

李心天 原载同上

发扬民主 繁荣科学——重温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涂西畴 原载 1979 年《新湘评论》第 3 期

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

陶德麟 原载 1979 年《书林》第 1 期

怀念李达同志

曾勉之 原载 1979 年《学术月刊》第 4 期

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

《李达文集》编辑组 原载《历史研究》1979 年第 8 期

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江明 原载 1980 年《文献》第 4 期（《文献》同期刊登《李达给吕振羽的四封信》）

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读李达《社会学大纲》

黄逸峰 原载 1980 年《书林》第 4 期

《新时代》月刊与李达

熊崇善 原载 1980 年《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我所知道的李达老师

紫虹 原载 1980 年 10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

忆李达同志

黄焯 原载 1981 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1 期“纪念李

“达老校长”专栏

铭刻心里的怀念

钟兴厚 原载同上

深有启示的几次讲话

孙祥钟 原载同上

回忆李达同志的一件事

高尚荫 原载同上

怀李达校长

吴于廑 原载同上

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韩德培 原载同上

难忘李达校长对我的教诲

姚薇元 原载同上

纪念喑鸣校长

周大璞 原载同上

私淑老师兼启蒙老师

刘涤源 原载同上

《社会学大纲》给我的启示和鼓舞

刘绪贻 原载同上

怀李达校长

胡国瑞 原载同上

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

尹进 原载同上

百感交集怀李老

陈修斋 原载同上

应当实现老校长办好武大的遗愿

齐民支 原载同上

怀鹤鸣师

- 陶德麟 肖萑父 原载同上
- 终身难忘的言传身教
- 李其驹 原载同上
- 感人的关怀
- 王兆星 原载同上
- 《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
- 段启咸 原载 1981 年《江汉论坛》第 1 期
- 评李达早期的唯物史观著作——读《李达文集》第一卷
- 韩树英 原载 1981 年《哲学研究》第 2 期
- 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前进——读《李达文集》第一卷
- 张腾霄 原载 1981 年《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读《李达文集》第一卷
- 肖前 李秀林 汪永祥 原载 1981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
- 从一个侧面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读《李达文集》第一卷
- 彭展 原载 1981 年《江汉论坛》第 3 期
-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 张静如 原载 1981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本文收入《张静如自选集》,大连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
- 侯外庐 原载 1981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
-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
- 曹瑛 原载 1981 年《新湘评论》第 7 期
- 李达与辅仁小学
- 唐春元 原载 1982 年《零陵师专学报》第 2 期
- 李达同志早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
- 邹永贤 原载 1982 年《学术月刊》第 3 期
- 我国最早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读《李达文集》第二卷



章绍武 原载 1982 年《哲学研究》第 4 期

李达的教育实践与办学思想

宋镜明 原载 1984 年《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3 期

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

袁锦翔 原载 1985 年《翻译通讯》第 6 期

立德立言 垂范后世——纪念老校长李达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

何华辉

一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作过重大贡献的著作——读

李达同志《经济学大纲》的一些体会

李守庸

坚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回忆李达同志片断

尹世杰

缅怀马克思主义老教育家李达同志

何定华

重读“两论解说”有感——纪念李达同志 95 周年诞辰

雍涛

**《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收入以下文章：**

肖蓬父：《序》

杨献珍：《李达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王向天：《缅怀李达 学习李达》

原载 1990 年 10 月 30 日《湖南日报》

颜若义：《我们为有这样的家乡人而骄傲》

石曼华：《怀念李达》

原载 1990 年《湖南党史月刊》第 12 期

李锐等：《无任感慨话李达——李锐等同志访谈录》

王身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代宗师》

许全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

徐晓林:《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段启威:《论李达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定性》  
荣开明 李步楼:《学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不渝的精神》  
夏远生 李仲凡:《学习李达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  
李维武 何萍:《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曾乐山:《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崔永和:《李达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方法论启示》  
张方勋:《简论李达唯物史观研究的基本特点》  
吕希晨:《现代社会学》述评  
孙琰:《论〈现代社会学〉哲学思想及其代表意义》  
张新年:《从〈社会学大纲〉看李达的哲学思想》  
李光华:《论〈社会学大纲〉对矛盾学说的阐述》  
曹仁杰 俞礼祥:《李达的法律哲学初探》  
刘伏海:《李达的道德理论初探》  
尹明新:《从毛泽东三封信看建国初期李达的哲学成就》  
余克尧:《重读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体会》  
柯宗瑞:《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播种者和耕耘者》  
水延凯:《〈中国产业革命概观〉述评》  
郭忠义:《论李达对国情的研究》  
李彦明:《李达早期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贡献》  
李振纲:《建党前后李达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贡献》  
阮青:《建党前后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李少白:《李达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陈竹虚:《殚精竭虑改造与建设湖南大学》  
赖恭谦:《李达和毛泽东》  
王炯华:《一代名流与李达》  
王建宇:《李达与湖南自修大学》

文竹月：《李达青少年时代轶事》

杨邦国：《李达在家乡二三事》

湘人：《李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综述》

## 后 记

我的朋友郑大华约请我撰写《李达学术思想评传》，我欣然应允了。我涉及李达这个人物，是在9年前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论文题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我感到他在毛泽东思想创造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是以往人们所忽略的。研究李达的学术思想，有助于理清楚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中国化的基本过程，有助于理清楚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对于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92年，我在大华主编的《20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小册子中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一文，文章不长，但进一步收集了有关材料，又为李达的人品、学术风格、晚年的悲剧所感动。上述原因促使我去撰写《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由于其他课题的缠身，我又请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博士生李立志来共同研究，他对此亦具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经过多次共同的探讨，取得了一致的共识。他功底好，又勤奋，是在极忙的情况下参与这项工作的，并很快完成了本书第二、三、五章和附录部分的内容，史料翔实，且很有见地，为本书增色不少。

书写完了，我想，我们大致达到了目的。较充分地肯定了李达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坐标上所应有的地位，基本说清楚了他作为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

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希望这本书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李达,并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创造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关系有新的启迪,尤其对于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新的体会。本书吸取了前辈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意!

丁晓强

1998年6月于杭州



